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邮发代号：82-507

刊号：CN11-2817

炎黄春秋



年轻时的孙立人



孙立人寂寞的晚年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
煽风点火见闻录

轰动台湾的“孙
立人案”今破解

引起轩然大波的“迎春晚会”真相



孙立人在江西省余江县城的笔后台雕塑

7
94

第 11 卷 第 7 期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15年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热烈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同志在组织、开展、贯彻和促进真理标准讨论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此社论而掀起狂飚，肆虐十年；《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此评论而爆发炮轰，震动全国。这都是陈伯达一手炮制的。如今“灾星”坠灭，警世可鉴。

轰动台湾的“孙立人案”今破解

身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要职的孙立人，竟因“匪谍案”、“政变案”而解职，终身软禁达33年之久。此案扑朔迷离，背景复杂，直到美国机密档案解密，才真相大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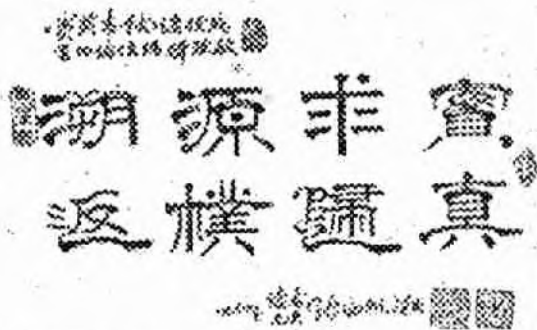
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今年是邹韬奋同志逝世50周年。半个世纪之前，毕生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的邹韬奋，为传播真理，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死而后已。他在生前以抱病之躯秘访新四军，所见所闻，感奋不已，使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电视片《毛泽东》诞生记

当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从电视中看到《毛泽东》这部纪实巨作时，可曾知道编导和摄制人员是怎样呕心沥血，含辛茹苦，沿着毛泽东的足迹，再现历史的辉煌和伟人的丰采？

扉·页·导·读



编者寄语

“溯源求实，返朴归真”这八个字，是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张西帆老将军长期阅读本刊后，亲笔所题的读后感。5月4日，张西帆同志把装裱好的八字条幅亲自送到编辑部。

这言简意深、热诚感人的八个字，既是对本刊的鼓励，又是对本刊的期望。《炎黄春秋》以发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实文章为主，自然真实性、准确性为第一要素。唯有如此，才能取信读者，起到以史为鉴、启迪后人的作用。

要做到真实、准确，需要作者、编者、读者三方面共同努力。本刊撰稿人，多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历史资料的研究者，他们忠于史实，严于思辨，写出了不少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众多的读者关心本刊，常常从不同角度，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实施监督；本刊编者则力求严格把关，认真审校，杜绝以假乱真，以臆代史。尽管如此，疏漏难免。所以我们经常召开读者、作者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宝贵意见，藉此不断改进编辑工作和提高刊物质量。我们深信做到“溯源求实，返朴归真”不易，但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朝着这方面努力。

顾问:
 伍修权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楔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石福生
责任校对: 张凯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 码: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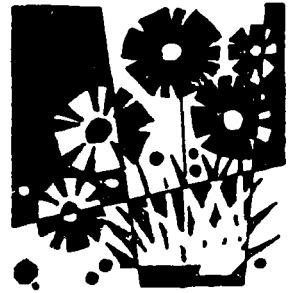
<p>求 实 篇</p>	<p>春 秋 笔</p>	<p>英 杰 谱</p>	<p>陨 星 篇</p>
<p>④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张江明</p>	<p>⑦ 引起轩然大波的「迎春晚会」真相 余 思</p>	<p>⑪ 一本大书的小插曲 李冰封</p> <p>⑬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 朱悦鹏</p> <p>⑲ 轰动台湾的「孙立人案」今破解 杨毅周</p> <p>③⑩ 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分分合合 连若雪</p>	<p>③⑦ 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俞润生</p> <p>④④ 忆周扬同志二三事 露 菲</p>

目 录

时代风	同根结	赤子心	人海浪	古今谈	古镜台	九州景				
49 电视片《毛泽东》诞生记 吴晓梅	56 中国是她感情寄托的所在——记韩素音 叶君健	59 魂系故土的旅法画家吕霞光 殷翔云	64 下海弄潮的科学骄子——机译专家陈肇雄 王初阳	70 驯服命运的强者——一个知青的奋斗历程 高岩	75 掌上悬壶济众生——掌纹医学专家王晨霞 王克明	62 毛泽东反批「失街亭」 陈雄	48 中国何以并存两个「世界第八奇迹」 刘永国	81 从奴隶到宰相 徐崇寿	84 武则天与酷吏政治 胡戟	86 西秦古文化名胜掠影 郑国铨

炎黄春秋第8期
(1994年)

要 目



- △凌云：
我随邓小平访问美国
- △李立三为刘少奇说公道话
- △李立三的绝命书
- △民谣：“要吃米找万里”的来龙去脉
- △关露——一个三十年代女作家的坎坷一生
- △江姐托孤
- △民初五大总统后裔今何在
- △毕昇墓碑发现记

胡耀邦 与真理标准讨论

○张江明



——纪念“理论工作务虚会”15周年

《同舟共进》编者按 今年是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15周年。此次会议是叶剑英同志提议，胡耀邦同志主持，邓小平同志作重要讲话的会议。本文作者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文章虽是对15年前“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的回顾，却很有现实意义。

1979年1月18日至3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作两段进行。这是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和为了进一步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会议。

自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与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多数人都赞成和拥护这个观点，但有的人反对，而且有一份理论刊物写了不同意见的文

章,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求发表和“争鸣”。叶剑英同志看了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党中央接受这个建议,提出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我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研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思想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次会议,是“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有各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界人士参加,包括赞成和不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同志,进行探讨、商榷。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发言同志把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背景、争论焦点、实质和意义,和盘托出。从大量的事实和材料中,我深切地体会到:理论界在具体进行真理标准讨论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赞扬、高度评价和领导真理标准讨论。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0页)

胡耀邦同志在贯彻、组织、开展和促进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真理标准讨论前,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5月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经受实践检验的。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积极支持和确定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1978年3月,中央党校讨论编写党史教材问题,向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汇报,他指出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实践为检验真理(包括路线是非、处理人的是非等)的唯一标准;二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以偏概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个人迷信还是盛行之时,用实践来检验路线,当然包括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这是要有很大魄力和理论勇气,才敢于提出来的。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

胡耀邦同志大力支持、亲自审阅修改,并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发表的。1978年1月,《光明日报》收到一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经过五次修改,还不够理想,这时了解到中央党校正在组织写作同一题目的文章,经商定合起来撰写,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接着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定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很快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恢复和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第三,胡耀邦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仅抓得紧、抓得认真,而且一抓到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个又一个地解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反映很强烈。绝大多数同志热烈赞成,但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更大,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针对这些问题,胡耀邦同志下决心组织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迫于当时形势,《原则》已不可能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胡耀邦同志也无法参与,只能用曲折方式处理。他在1981年9月25日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讲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作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原则》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然后各报纸转载,文章指出,理论指导实践的



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真理,使真理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因为它是科学,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文章又指出,一个正确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都要经过实践的多次检验,加以修改和发展。能够为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为了进一步提高认识,排除思想障碍,胡耀邦同志又组织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把他多次讲过的观点作题目,写成此文。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于197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对生产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等等。这几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和深入。

第四,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全国理论务虚会议,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把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取得很大成果。

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同志就阐明理论务虚会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提倡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倡对理论文章的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民主学风。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一定要解放思想。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这次务虚会,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把被颠倒了理论颠倒过来,进行拨乱反正;也清理和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影响,克服个人迷信和现代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阶段、按劳分配和所有制等加以正确认识,初步清除附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外来成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会议一致热烈拥护邓小平同志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工作,揭露了康生是个阴谋家的面目。这次会议是开成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胡耀邦同志在与第四组同志谈话时指出:小平这次讲话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提出了我党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承认实践第一,敢于打破框框想问题;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能动摇。今天我们的工作要讲究这种全面性。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里,出在这方面的片面性上。要写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根据胡耀邦同志这个谈话精神,写成《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署名特约评论员,发表于《光明日报》。

第五,胡耀邦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的任务。理论务虚会后不久,又出现了一股思潮,主要内容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真理标准讨论和解放思想分割开来,甚至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有的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认为批判“两个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等等。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突然停下来,而“两个凡是”思潮又泛起。邓小平同志及时察觉这个问题,在1979年7月29日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但是,“这个争论还没完。”“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他同意要“补课”,而且认为“这很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7页)这个任务也落到胡耀邦同志身上,主要是解决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这是个关键所在。胡耀邦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去完成。这次“补课”直到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才告一段落。

应该指出的是:真理标准讨论所以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是得力于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倡导和领导,才能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取得胜利。如果没有他的支持、高度评价和重视,就不可能进行到底。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责任编辑:杜导正

(本文转载自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1994年第3期。本刊发表时征得作者同意有所删节。)

编者按 1964年中国剧协举办迎春晚会，招致一场政治风波和文艺灾难。本刊1993年第11期发表《“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始末》后，《中国戏剧》杂志记者就此事件访问了当年晚会主持人、原中国剧协负责人之一李超同志，并在该刊1994年第2期刊载了《引起轩然大波的“迎春晚会”真相》一文。

本刊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实报道为主要内容，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我们的编撰准则。对于各方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我们十分注意听取。为此，我们特将《中国戏剧》杂志《引起轩然大波的“迎春晚会”真相》一文转载，供读者参阅。



李超近影

●《中国戏剧》记者 余思

引起轩然大波的 “迎春晚会”真相

记者 李超同志，今日登门非为别事。前几天路过书摊，大型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封面要目上《“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始末》几个字赫然入目。就为这篇文章，我买了一本刊物。读过之后，给我的印象是当年“揭发”“迎春晚会”，给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带来大灾难，而自己因此红过一时的刘天鸣和顾工，到了今天还为洗清自身，继续给“迎春晚会”涂黑。1964年中国剧协举办的“迎春晚会”，遭至天威震怒，从此文艺界深渊难返。这桩沉冤至今未见正式平反，可是如今因为个人的需要，依然在“披露真相”的名义下继续歪曲真相，这是不正当的，不公正的。我当年是参加晚会的年轻人，您是“迎春晚会”的主持人，也是第一受害人，今天我把文章带来，请您谈谈读后印象和说说当年的真正的真相，以正视听，不知意下如何？

（李超同志刚从外地回来，行装甫解，便坐读199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上原《解放军报》编辑顾工、刘天鸣与该刊记者的笔谈录《“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始末》，一面读，一面不时叹息。）

李超 文章我读完了，顾、刘两位当年揭发“迎春晚会”所告的“御状”，曾经刊登于北京市委内部的一本刊物上，我全文读过。当年他们因此举而成楷模，是大写的正面人物，我是“罪魁祸首”，不管怎么上纲上线检讨也过不了关，而且累及一千多人都作检查。而今有人旧事重提，他们有压力，或者想申明什么，出来表白或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迎春晚会事件”的确使文艺界深受其害，但今天应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认识，不必过于追究个人责任，我作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并无抱怨怀恨之心。往事如烟，过去的都过去了，作为历史教训记取，今后不让此等事件再发生，便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不过，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对追究顾、刘两位当时所谓告御状的动机不感兴趣，但是他们（特别是刘天鸣）至今在文章中描述的迎春晚会的情景，却不是历史的真面目。我以为大可不必为了开脱自己而继续给迎春晚会抹黑，当年参加晚会的有一千几百人，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你能蒙蔽一时不明真相者，能瞒得过这一千好几百人吗？

记者 事情发生在30年前,而今中年以下的人对此茫然无知,您能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迎春晚会”的情景吗?

李超 好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在春节之后举办一次迎春晚会,1964年是第8次。迎春晚会是联谊活动,只邀请在京剧协会会员参加,对文艺工作一贯给以大力支持的党政领导,也会欣然应邀前来与大家共庆新春。这项活动内容丰富,每次各剧院都派人共同筹办,成为戏剧界一年一度很有意义很受欢迎的游乐活动。到了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声日高一日,在这年春节之前毛主席已经对文艺界有过严厉的批评。在一个著名的指示中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我感到这一年气氛紧张,本不想再搞“迎春晚会”。我当时是剧协秘书长,当办公室主任师力坤同志来请示我的时候,我说今年别搞了,别闹个别人偷牛我们拔桩子,再招来个通报,咱们就受不了啦。师力坤说年年都搞今年也还是不要停为好。当时别的工作人员也主张照办迎春晚会,理由是毛主席“不下去不开饭”的指示之后,剧院(团)都下去了,好不容易过春节回到北京,大家借这个机会聚聚多好。他们这样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师力坤同志最后说,既然你心里打鼓,办迎春晚会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们来管,不过你要给我们做两件事:一是召开个动员会。往年搞这项活动,各剧院都派人共同筹备。比如青艺已经作古的著名演员邵华以及中国评剧院的冯霞都是中坚分子,师力坤要我召集他们进行动员。第二件事就是要我给这届迎春晚会出些主意。这两件事我都答应了。戏剧界的人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每年迎春晚会,都要出些新花样。笔谈录中引用香港出版物上的文章,不仅把1964年迎春晚会与过去搞过的化装舞会混为一谈,而且在胡说八道地把那次化装舞会描绘得一塌糊涂。50年代搞的那次化装舞会,我以为是迎春晚会中搞得最好的一次。那是迎春化装舞会,是在北京饭店西厅里举办的,规定参加者都要化装。最低限度要戴假面,若有不化装而来者,不得入内,先请到旁边化妆室,由专人帮助化装。我记得清楚,当时北京人艺的于是之化装成高尔基。他刚一进入会场,就整个儿生活在角色中,行动举止,与人谈话,完全找的是高尔基的感觉。虽然是一项联谊娱乐活动,也显示这些老艺术家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艺术创造精神,至今想来,依然感人至深。欧阳山尊化了个彩旦装,后脑勺还拖了条大辫子,他老大大个子,化这么个装,谁见了都忍不住大笑。另外,北京人艺刘华女士装成个小巧的果戈理,谢添化装成卓别林,都令人叹为观止。一会

儿,郭沫若郭老也来了,他刚出访亚非拉回来,穿着日常衣服,披了一袭缅甸朋友送给他的袈裟,这化装也别有一番风味。后来,有人通报,周恩来总理来了,我忙迎出去。总理一进门便问:“化妆室在哪里?”我说:“您就免了吧。”他说:“大家都化装,我也得化呀!”我想总理事多,真给化了装,要是一会儿有重要事要找他回去,还得卸装,岂不误事,还是不化好,就说:“大家都化了,最后要评比谁化得最好,请您来检查、评判,所以您不化装也可以。”总理说:“你这么说,我可以不化装还有道理。”所以,总理没化装,和大家欢聚了一阵。化装晚会的中间,只见郁风、黄苗子扶着齐白石老先生进来了。齐老人因年事已高,平时出门,常由他的关门弟子郁风夫妇搀扶。老人的帽子、眼镜、衣服悉如平时,大家见老先生也雅兴勃勃赶来参加,便全场鼓掌,热烈欢迎,周总理也迎上前去和老人握手。过了一阵,有人悄悄对我说:“李超,这不是真齐白石。”我惊问:“你怎么知道。”那人说:“一进门后齐白石便没开过口,有人同他说话,都是郁风、黄苗子代答,情况有异。”听他这么一说,我便走过去与齐白石寒暄,他果然只微笑点头而不开口。我这才仔细打量,仿佛这个齐白石比我平时见的齐白石略略胖一些,但须发等都逼真,实在看不出是谁“冒充”。我说:“您老总不能老化着装,得露个真相呀!”他的须发是用松香沾的,一时拿不下来,只得通报真名实姓,原来是大画家叶浅予。我向大家通报真情,并请他巡行一周,大家一片惊讶与赞美。这次晚会化装比赛的头名,当然非叶公莫属了。我以为这次化装晚会搞得生动活泼,而且趣味不俗,且很有意义。可是文章中引用的港台某些出版物不仅把化装晚会张冠李戴,而且形容成“个人模狗样,男男女女,人人戴着假面具,妖魔成群,相互搂着、扭着,放浪形骸……”于是,顾工出于一个战士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首都文艺界存在着糜烂风气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问题”。但是顾工对这些无耻谰言的校正和驳斥仅止于“我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以及其他一些与晚会无关的事情。那么被诬蔑、捏造的这个化装晚会,究竟有无,真相如何,竟连一句批驳之辞都没有,这岂不等于认同这样的造谣吗?

记者 那么1964年的迎春晚会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李超 还是得从筹备说起。我答应做师力坤同志要我做的两件事。在动员会上,我讲筹办这一届“迎春晚会”的宗旨有4点:(1)团聚迎春;(2)大家响应号召,下乡深入生活,自觉改造,欢迎回来过春节,向大家表示慰问;(3)庆祝戏剧丰收。当时仅北京就有各剧种的

11台《千万不要忘记》在演出，全国更是遍地开花，这也是一种丰收；(4)迎来送往。过完春节大家还得下去，这次晚会既是迎来，同时也意味着欢送再度下乡。我强调说，今年情况不比往年，即便搞迎春晚会，也得有些政治内容。想来想去决定这届晚会除传统的内容如下棋、灯谜、书画、照相、交换礼物、电影、舞会外，特意在政协礼堂东厅召集一个座谈会，有七、八张桌子，每桌由在《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中扮演同一人物的11个演员交流表演经验，研讨如何更加演好这出戏。这出戏原本叫《祝君健康》，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改名为《千万不要忘记》。在迎春联欢会上开这个大型座谈会，以求增加点严肃性和政治色彩。这在当时，也算用心良苦了。

记者 《“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始末》中引用顾工的话说：“军报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很紧很紧的。编辑们的斗争嗅觉也极灵敏。大家一听这种轻歌曼舞和庸俗节目，便立时激起‘革命义愤’。纷纷说应该上书中央……”那么晚会上什么事使刘天鸣、顾工两位如此深恶痛绝，回去一说，引得别人也“义愤”填膺，以至于另一位根本没参加晚会，仅凭他们所说，也“气”得向上写了揭发信呢？从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对“献花”“舞会”和舞曲间歇穿插的小节目深为反感，并且上纲上线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么真实情景如何呢，请您略作回顾。先说“献花”，顾工说：“进那金碧辉煌的大门（政协礼堂）时，有几位浓妆艳抹的妙龄女郎，为人场的佳宾在胸前插上一支迎春花……”，刘天鸣说得更邪乎，他这样描述：“一进门就有两位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孩走过来，殷勤地笑着在我们胸前别上一朵绢花……感到有些新奇，觉得那献花的女孩有点做作，没有引起什么好感。”

李超 我记不得门口献花的事了，每人献上一支迎春花，那得多少鲜花多少钱呀……

记者 不是鲜花，是最便宜的绢花，角把来钱一朵，论盒买来的。来宾进门先签名留念，然后多数人自动从盒里取一朵绢花别上，贵宾、长者、领导光临，或许有人递花甚至帮着别上。顾、刘两位入场时，或许看到穿军装的来宾光临，以示特别尊重，才有人递花插花。这只是出于来者都是客的礼貌和工作人员的职责，并非对什么人特别的“殷勤”，更不会去考虑赢得什么人的好感。至于顾工说的“花枝招展”和刘天鸣说的“献花女孩”“有点做作”，其实接待人员都是剧协办公室、组联部、外联部的干部，多数已经是孩子他妈级的了，女孩确实有一个，是一位工作人员的女儿，才10多岁，还在读中学。至于“花枝招展”，别忘了那是在60年代，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的1964年，而且是在2月3日的寒天冻地，人们都是穿着棉猴（讲究一点的有件呢

子大衣），要想美化，充其量是在毛衣和围中的颜色上鲜亮一些，至于发式、脸部化妆根本谈不上，哪里来的“花枝”又如何“招展”得起来。当然刘、顾两位是军人，穿惯看惯了军装，对色彩、服装式样敏感到十分，但是终不能大家都穿军装吧？说白了，主要是太过分地以“阶级斗争”眼光看事物，于是真相就走了形。

李超 他们说最严重的还是舞会上的事情，而且刘天鸣3次往“解放前”拉，大有“革命”与“反革命”难分的意思，这在政治上可是会致人于死地的呀！你看刘天鸣是这样写的：“我和顾工进的主会场是舞会。李超的开场白不是按老惯例叫同志们，而是称女士们，先生们！解放以来我是第一次在‘公家’组织的会场上听到这样的称呼。感到主持人是有意效法解放前的那些做法。舞会开始后，我看到不少人在跳‘水手舞’和‘伦巴’一类的舞。50年代初期我也组织过舞会，但是从来没有跳这样的舞，我还是解放以前在上海和南京看到过这些东西，那主要是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美国大兵、外国妞‘吉普女郎’等跳的，互相挑逗，舞姿淫荡，当时我们作为正派的大学生是不跳这种玩意的。所以在晚会上一见这些舞蹈，就感到有人有意在搞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心里有点反感。”

主持舞会的本不是我，因主持人临时缺席，有人把我从《千万不要忘记》演员座谈会上拉出来，临时充当舞会主持人。我想这是让大家乐和乐的场所，不必一本正经，所以一开场，先称呼声“同志们”，接着说了声“女士们，先生们”，并行了个法国式的致敬鞠躬礼，原是开开玩笑，轻松轻松，谁想到会被人一下拉到“解放前”去，我的“阶级斗争”观念实在够不到这水平。至于舞会，完全是正常的，根本没有刘天鸣所形容的那么邪性。乐队请的是某企业文工团的乐队，乐曲无非是当时舞会流行的那些，如民乐《金蛇狂舞》，“二呀么二郎山”，外国乐曲止于《红莓花儿开》等苏联乐曲，跳的舞也与当时北京节假日机关团体开的舞会一样。由于跳舞的人中有些是文艺团体的演员，他们跳得更标准、漂亮、生动，有个别人稍为步法花哨一些那倒是可能的，但决没有刘天鸣所形容的那样恶劣的东西。

刘天鸣自己内心深处对舞会的看法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表示怀疑。你看，顾工是这样说的：“刘天鸣舞跳得轻盈、潇洒。跳完一曲，就介绍个舞伴向我邀舞。”由此可见，刘天鸣当场自己是在舞场上很潇洒了一回的，怎么他自己跳就是健康的，人家跳就扯到解放前，与国民党党政官员和美国大兵捏到一起了呢？

记者 刘天鸣这段话于理不通，逻辑混乱，漫天上纲，至今还如此搬舌，连一句澄清事实和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实在太使人遗憾了。我当时也在舞场，并没有

见到“不少人在跳‘水手舞’和‘伦巴’”，只不过个人在跳三步四步时步法有些花哨。这原本不成其为问题，再说如正正规规地跳这两种舞又怎么样。华尔兹、狐步舞、伦巴、探戈等等都不是国粹，都是外来货，是国际通行的群众性舞蹈。当年中南海紫光阁里也常举办舞会，中央领导人也不时参加。水手舞和伦巴并非解放前国民党军政要员及美国大兵的专利。凭什么说跳华尔兹（三步）狐步舞（四步）就是解放后，一跳“水手舞”“伦巴”就到解放前去了呢？你刘天鸣那天跳的是什么？不外乎华尔兹、狐步舞吧，总不会是秧歌舞吧，那么解放前国民党官员和美国大兵就不跳华尔兹和狐步舞了吗？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也扯到解放前去。这些都是强词夺理，真正的心理动机恐怕不是对舞会“有点反感”，而是别的什么吧！

李超 舞曲间歇时，的确有些小节目，他们两位说的节目都有，但并不如他们所形容的那样。顾工说：“舞与舞的间隔中，有各种轻松、逗趣的节目插入，如男女反串的《兄妹开荒》；一位毛胳膊毛腿戴两假乳房的男性‘小天鹅’；人扮的木偶《梁祝哀史》，‘楼台会’时提线断了，梁、祝长抱一起难分难解。”一到刘天鸣那里“批判性”就猛然高涨，他说的是：“舞会中间穿插的小节目，就更使我看得不舒服了。有个男演员穿上《天鹅湖》中女角的乳罩和短裙，大跳天鹅舞，主持人还在一旁肉麻地加以赞赏。我觉得这是在追求解放前歌台舞榭中那些庸俗的东西。”刘天鸣在短短二、三百字中，这是第三次把这晚会拉到“解放前”。

舞曲间歇中的小节目是各剧团一些爱热闹爱玩的青年演员自己凑的，无非是自娱自乐，出出洋相，逗逗乐子。这并不是公演，这些长期下乡、艰苦备尝的小伙子回来过年，借这个机会大家乐和乐和，这又何罪之有，值得那么大施挞伐？所谓反串《兄妹开荒》，是空政文工团一位小伙子以麒派发声方法一人扮两角色唱《兄妹开荒》，“天鹅舞”是哈尔滨话剧院4个小伙子反串演芭蕾舞《天鹅湖》中四小天鹅片断，当然是个滑稽节目，谈不上“大跳”，倒是努力想踮起脚尖而未成，穿的并非刘天鸣所说的什么乳罩和短裙，事实是从芭蕾舞团借来的地道的芭蕾舞裙。这些节目，正如现在电视中“开心一刻”的节目那样，逗乐开怀而已，虽无多大意义，却也并没有什么庸俗不堪。如果与解放前歌台舞榭中的庸俗混为一谈，倒是抬举了那些低级下流的真庸俗。到那些地方去寻求刺激的阔佬洋少要看的是真的女人的大腿和肉体，以满足感官的刺激，他们决不会垂青于几个小伙子的自娱自乐，何况不管怎么说，唱的和演的毕竟是革命的《兄妹开荒》和民族的《梁祝哀史》

以及雅艺术的《天鹅湖》。

刘天鸣、顾工揭发迎春晚会的内容，还不止这些，例如还说迎春晚会上一条政治标语都没有。这便是实情，问题是联欢会上大贴政治标语还叫联欢会吗？那次晚会标语虽然没有，却有郭沫若手书大对联一幅！内容是喜迎新春、歌颂文艺丰收，对晚会来说这就足矣。

记者 刘天鸣、顾工的揭发材料导致上级对迎春晚会的严厉批评，参加者人人都要作检查，您是首当其冲。

李超 剧协首先奉命开展整风运动，继而扩大到文联各协会。终于招致毛主席在文联各协整风报告上作了严厉批示，说文联所属各协“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虽然当初师力坤说这次迎春晚会不用我管，但我是秘书长，而且亲自作了动员，出了问题，我仍然首当其冲。主要批判我两点，一是举办这次迎春晚会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二是与毛主席对着干，因为在迎春晚会之前，毛主席就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收效甚微，而我说要欢庆文艺丰收；毛主席要文艺团体下去，我却说迎春晚会是欢迎他们回来。仅就这两条，是什么分量就不言而喻了。反正我是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最后是撤职下放，还未成行，四清开始，我就作为普通四清工作人员下去了，接着文化大革命风雷滚滚而起，我更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些，现在再讲没意思了。

我还是持前面讲过的那种态度，这些都是历史，大的方面中央已经作过宏观的历史结论，具体的事情多如牛毛，不要一一算老账。迎春晚会事件在文艺史上是件大事情，历史自有公论，我对顾工、刘天鸣两位并无个人的记恨。现在提起这件事，他们有压力，想作些申辩，这可以理解。但是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若为了开脱自己，今天还有意、无意地向“迎春晚会”泼脏水，这就不好了，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记者 您的姿态很高。我找您谈此事，也是这个意思，别无他意。谢谢！

（原载1994年第2期《中国戏剧》）

（责任编辑 王恂）

一本大书的小插曲

李锐著《早年毛泽东》一书的我闻我见

○李冰封

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李锐著《早年毛泽东》一书，大32开本，正文575页，加上前言、目录、插页等，近600页，算是一本大书了。此书初版原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曾于195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当时，曾洛阳纸贵，风靡全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产生过很大影响。

以后，作者忠而获咎，长期遭难，因人废言，此书遂停止发行。1977年，纽约出版此书英译本，国际上著名的现代中国研究专家、英国伦敦大学美籍教授施拉姆曾为英译本作一长篇导言，详细介绍此书。导言在结尾中说：“李锐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提供了最优秀的经验和思想的轮廓，因而，它不仅对于研究‘五四’时期及二十年代的学者，而且对每一个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感兴趣的人，都是一部必不可少的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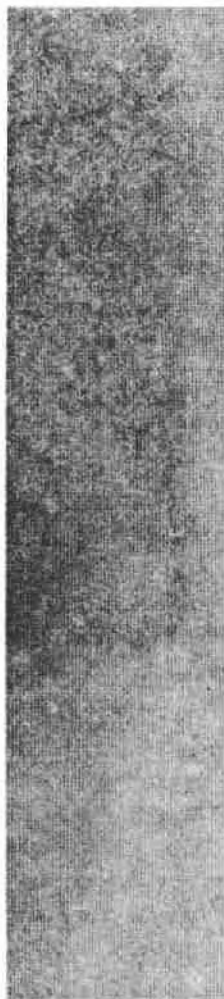
虽然如此，初版仍带有颇大的局限性，这主要不是由于作者的认识水平或研究疏忽，而在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局限性可用四个字概括，即：“为尊者讳”。试想，在五十年代初，作者因要研究传主青少年时期的思想，而搜寻、辑录传主此一时期部分文章，印50本小册子，在内部传阅，却受到严厉批评，且认为此事“有害无益”。这本名为《毛主席旧作辑录》的小册子，本文笔者在五十年代初曾有幸得到一册。封面题目后尚有副题，为：“刊于1919—1922年长沙大公报”，右上角并印有“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八字，其中25篇文章，署名皆系“毛泽东”、“泽东”或“润之”，文章全是公开发表的（见附图）。连这样的文章，也要“掩其少作”，也要彻底回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然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也就不可能酣畅且又有分析地写出传主思想、

性格形成的各个方面了。而这各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传主中晚年的丰功伟绩和巨大失误，无疑都是紧密相关的。但在个人崇拜盛行的那些年代，“天才论”却有着天然的合法性。

此书的第二次修订本，系1980年在湖南出版。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近20年，作者“北徙乌苏，南迁大别”，且囹圄秦城8年，但仍念念不忘要修改、增补此书。作者在安徽磨子潭劳动时，先后曾用两年时间，增订、改写。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到改写的原稿后，本文笔者适在该社工作，有幸通读全稿。读后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突破了“为尊者讳”的框框，能更深入地分析传主思想、性格的各个方面。如“独服曾文正”一说，即在此次修订本加入。其他修订的各方面，也能看出传主中晚期性格、思想的某些脉络。

现在，辽宁新版，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跨出了一大步，增加了约50000字，特别是全部改写了结束语。这篇长约12000余言的结束语，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性格在青少年时期的形成，以及对中晚年的影响，作了透彻的剖析，并给当代和后代人提出了“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借毛泽东”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我想，如能这样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无疑，对于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界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一代巨人，认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必然性和偶然性，将大有裨益。可惜，在某些地方，去年12月的一些纪念活动，没能这样做，仍然留有“为尊者讳”的深刻烙印。

从中国现代革命史、世界共运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军事学、文学、教育学等多种角度来研究毛泽东，研究他的功绩和失误，以及由此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重点无疑须放在中年和晚年。但无论哪一项研究，都不能离开早年。



毛主席舊作輯錄

—— 輯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長沙大公報

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編

注意
不在此列

目 錄

一九一九年

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二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三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四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五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六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七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八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一、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二、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三、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四、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五、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七、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八、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九九、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一〇〇、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論說

表同情於師範學生

胡之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師範學校在長沙，其地位極重要，其前途極光明，其責任極重大，其影響極深遠，其關係極密切，其作用極顯著，其地位極重要，其前途極光明，其責任極重大，其影響極深遠，其關係極密切，其作用極顯著。

其实，他在中年和晚年的许多思想性格特征，早年即已显现端倪。辽宁新版结束语中提到，他在早年即“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屈服；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对

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所有这些思想和性格的特征，在中年特别是在晚年，不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么？就是使中国人民吃了大苦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实也是他早年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农民平均主义社会理想的实践而已。（晚年为《张鲁传》作注，其实也是早年思想的复萌）。人无完人。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吸收人类文化中的各种有价值的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掌

握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思想家和革命者，在早年吸收、融会过各种思想，恐怕谁都很少例外。问题在于，要有一种完备的体制，要能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要有人民和党员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得力规范。这样，才可能避免一些不成熟的预想、做法等付诸“实验”，以至于祸及苍生；并从而使付诸“实验”的一些作法，能力求成熟，不成熟立即就改弦易张，力求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和民族。从这本近600页的大书中，我认为，能够给人以这样的思想启发。（责任编辑 凌辰）

“文革”虽然早已结束，历史却不会也不应被遗忘。

劫难起始，中共中央机关报怎么忽然被陈伯达“接管”？他怎么炮制出搞乱全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臭名昭著的社论？毛泽东讨嫌的“四个伟大”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毛泽东手迹《满江红——和郭沫若》中有一个字并非真迹……

本文首次披露作者亲历的这些历史内幕。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 煽风点火见闻录

○朱悦鹏



陈伯达的一条死罪

在审判“四人帮”庄严的人民法庭上，审判员问陈伯达：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

接着法庭出示的陈伯达亲自修改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初稿和清样。

陈伯达供认上面的字是他改的，标题是他定的。审判员又宣读了钱抵千和朱悦鹏于1980年7月25日、8月12日分别写的证言。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一严重罪行。

陈伯达听后说：“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又主动“认罪”道：“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是陈伯达篡夺《人民日报》领导权后，抛出的第一篇煽动在全国燃起“文革”大火的动员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伙同林彪和“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为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大造舆论，把全党全国推入灾难之中。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把陈伯达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列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载入史册。书中写道：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我既有幸又不幸地作为“中央工作组”一个成员，“进驻”《人民日报》半年多。现在将当时直接参与和亲眼看到的一些事写出来，为“文革”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真实史料。

陈伯达、康生亲授重要任务

1966年5月30日，《解放军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唐平铸，将我和李久胜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说：“给你

们一个重要任务。什么任务，今天下午3点，你们到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家里去，由刘副主任当面交代。”在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刘副主任被中央任命为副组长。当时，我和李久胜都是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他是通联处长，我是记者处长。要我们俩人同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时间这么紧，又是总政刘副主任当面交代，我和李久胜同志一时猜不透是干什么。那天，我午饭未吃好，更睡不着午觉。

下午3点，我们准时到达刘副主任家里。这是东四一条巷子里的一个四合院，正厅是他的办公室。刘副主任是分管《解放军报》的，对军报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都比较熟悉。他要我们坐下来等等总政宣传部长钱抵千来了再谈。

不一会儿，钱抵千到了。刘副主任立即正式交代了任务：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工作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军队派三个同志参加，地方派三人参加。你们三人就是军队派去的，要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抓宣传，抓版面。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见陈伯达。谈完正式任务后，刘副主任还谈了当前全国形势。他说：现在报纸宣传十分重要，军队在这方面也需要人。中央要军队抽三个同志，所以挑选你们三个去，希望你们能愉快接受任务，完成任务。

在返回《解放军报》社住地——平安里三号途中，李久胜对我说：“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全力抓版面，抓宣传，我在军报长期做通联工作，对版面不熟悉，恐怕得换个同志去。”回到军报，我们把刘副主任交代的任务向唐平铸、胡痴作了汇报。李久胜讲了他不适合去的理由，提出换一个人。唐、胡二人同意李久胜的意见，对我说：“党委委员就那么几个人，再抽不出了，你在副处长、副主编中选一个人。”我先提出记者处副处长和谷岩。我说，他业务能力强，团结同志好，比较合适。唐平铸表示，和谷岩不能去。你这个处长走了，他还要主持记者处的工作，再选一个。我想了想，提议让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去。我讲了尚力科同志的办报优势。唐平铸、胡痴同意了，并要秘书立即报告给总政刘副主任。

从唐平铸办公室出来，我想，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总编辑不出来，布置了也应该向总编辑报告一下。我就便来到办公楼大院里的华楠总编辑家，向他报告了这事。华楠说他身体不大好，他们布置就行了。我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华楠奉命调出军报，已被任命为战士出版社社长，只是命令还没有宣布。

5月的最后一天，上午10时稍过，钱抵千、尚力科和我，来到钓鱼台八楼。这是我第三次进钓鱼台。前两次，我带几个记者来钓鱼台警卫部队听罗瑞卿总长宣

讲社会主义教育课。这时候的钓鱼台，门卫十分森严。进到院内也不能随便走动。我们径直走到八楼，那里已有人接待了。

八楼楼下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只有陈伯达、康生和不多的几个人。除钱抵千、尚力科和我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红旗》杂志社的杨丁。这是我自1938年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听陈伯达、康生面示。此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影响是十分大的，我也认为他们是党内有数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何况，当时更是他们红得发紫的时候。

陈伯达讲了很多，先讲了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重大意义。他说：今天下午3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接着，他主要讲了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等。快中午12点了，康生没讲什么，只是表示同意陈伯达讲的内容。谈话将要结束时，陈伯达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并要钱抵千、尚力科和我起草。钱抵千说：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伯达刚才讲的内容来写。陈伯达同意。

5月31日下午3时半，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厅里，参加会议的首都主要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部主任以上干部陆续到齐（只有《解放军报》报社是社领导参加）。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此时陈已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就坐了。邓小平同志穿的那件短袖白色上衣，陪衬出他那稍带古铜色的脸庞，显得庄重健康。他严肃地宣布开会。他说，今天召集北京各个主要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的中层以上领导开会，宣布中央一个重要决定：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接着，邓小平同志解释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个极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最后，邓小平同志正式宣布了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杨丁，上海两位同志还未定下来。邓小平讲完后说：老夫子（这是邓小平对陈伯达的称呼），你讲讲。陈伯达不讲。康生倒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

主要是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当时，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陈伯达在这个场合一句话不讲，而康生要大发议论？但我没有任何怀疑，以为大概需要这样做吧。下午5点多，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另有穆欣同志），驱车赴《人民日报》。

看来秘书早已通知了《人民日报》。我们来到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直上办公楼3楼会议室。报社部门以上负责人，早已集合在会议室等候了。陈伯达开门见山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明天开始，各部部长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会上，总编辑吴冷西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后来听说吴冷西给邓小平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横扫”社论这样出笼

陈伯达要钱抵千、尚力科和我，赶快回去吃晚饭，晚10点以前把社论稿子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修改。

我们三人如果各自回家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时间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要我们到他家（东四演乐胡同，距王府井不太远）吃点便饭，边吃边商量，丢下饭碗就可以动笔。

万事开头难，何况这是明天将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钱抵千在中苏两党论战时，曾参加过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所以他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他对我们俩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是三人分段写，再统一修饰，还是一人执笔，二人补充？钱抵千说这样太费时间，提议由他按他的记录口述，我二人各记一段，然后统改一遍。这样，奋笔疾书到夜10点，社论草稿虽两千多字，但颇费周折。有时一句话，一个字，要捱半天。起草过程中，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他一定要把讲话中关于政权那一段话加进去。我说，写上这段话是否妥当？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钱抵千似乎知道底细，他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4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人民日报》总编辑办公室很大，外间是秘书办公，里间足有三四十平方米，还有一个长会议桌，可供十几个人开会。不知为什么，陈伯达不愿在这里办公，偏要挤到副总编辑胡绩伟那间小办公室。当晚10点以后，我们三人拿着社论草稿到胡绩伟办公室，等待陈伯达。

陈伯达来了。跟他来的还有王力、关锋、穆欣。不一会儿，《解放军报》的唐平铸、胡痴也来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下子挤了十多个人。陈伯达坐在办公桌前，其他人按各自地位依次就坐——王力、关锋等人围在桌子旁边，其他人离桌子有远有近。陈伯达叫把社论用大字排出小样，然后统改。排字工人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写的，所以改动不大，念到第四个自然段时，钱抵千稍作解释，为什么要把林彪这段话用上去。陈伯达同意了。关于社论题目，抠了半天。我们原定的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本来想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为早在4月18日，《解放军报》把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社论发表时，题目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大家一时想不出更确切、更有号召力的题目了。这时，陈伯达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划了半天，拟好几个题目，最后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定稿后，陈伯达规定：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当晚，我们将第二天要见报的小样，一一审查，确定6个版的版面。一版社论，这是旗帜，鲜明的旗帜，向中国、向世界宣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正式打响了。二版社论：《用毛泽东思想哺育革命后代——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三、四版，五、六版都有热爱毛主席、歌颂毛主席的文章。不难看出，工作组掌握《人民日报》领导权之后，旗帜是多么“鲜明”了。

6月1日晨，人民日报开印后，我们都松了口气，带着兴奋的情绪，拖着疲倦的身子，穿过王府井大街，路经故宫、北海，回到平安里三号宿舍。我们绝没有想到：一篇社论竟像一颗祸害无穷的毒气弹，弥漫了神州大地，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聂元梓大字报评论文章的抛出

从6月1日到6月8日，陈伯达基本上每晚坐镇《人民日报》，修改、审核社论、评论和看版面。社论大都是白天在钓鱼台写好，当晚到《人民日报》审改小样，作最后的润色。我们中央工作组几个成员，从每天下午3时起

上班，到第二天早上报纸开印。

6月1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陈伯达说，他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

已是上灯时分，北京大学校园内人山人海，校门口人群川流不息。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好在陈伯达个头不高，不引人注目，那时认识他的还不多，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亲临北大。自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贴出后，震动了北大校园，在首都社会各界引起不同反响。当时，北大校园的大字报比比皆是，矛头大都指向党委、北京市委、国家教育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陈伯达只是默默地看着，有时偶尔给我们说句这张写得好，那张是什么意思之类的话。他的福建话，尤其重，我只能听明白一半。同时，我第一次和这样一个“大人物”（虽然陈伯达自己到处说他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出行，还有点胆怯，什么话也不便说。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人民日报》。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

“秀才”们已拟好了评论初稿，小样也打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为本报评论员。6月2日清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发表后，人们都明白这是党中央机关报对聂元梓等一批造反派的强大支持。首都各高等院校，像洪水决口，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矛头纷纷指向各院校党委、北京市委，并影响更高一层领导人。不久，毛主席公开表态，肯定这篇评论，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的何等好啊！”这是“最高指示”，不言而喻，全国都在效仿北大的行动。

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后，陈伯达全力抓旗帜——社论、评论。从6月1日到6月8日陈伯达去上海开会时止，经他授意草拟、修改、定稿的社论、评论就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盖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等。这位“小小老百姓”就这样运用舆论导向，在

全国煽起了“文革”的熊熊大火。

陈伯达成了中央各大舆论阵地的“总管”

本来，邓小平总书记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决定时明确指出：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然而，工作组的权限已不限于《人民日报》的宣传，陈伯达把中央几个大的舆论阵地全都包揽了。他规定，每天晚上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必须到《人民日报》开碰头会，研究布置第二天的宣传，确定要发表的重要稿件。其他各报也都按照这个精神，向《人民日报》“对表”。这个碰头会延续了很多时日。实际上由陈伯达影响甚至控制了全国舆论。

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接到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条批驳这篇社论，称社论才真正是一株大毒草。据说，此信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陈伯达可能深感舆论阵地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为了掌握三大新闻单位的运动情况，钱抵千提出向总政干部部要了20名军队干部，以记者名义分到各大新闻单位，了解掌握运动情况，供陈伯达决策参考。不过运动起来以后，当年9月，钱抵千也被响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的总政宣传部造反派揪回去批斗了。

工作组几个人的任务很繁重，上海派来参加工作组的同志也到了。但看了这两位同志的简历，唐平铸有些发愁：这么重要的任务，上海怎么派一个《解放军报》地方部主任、行政15级的鲁瑛呢？我们当时还有点论资排辈，总觉得他很难挑起重担。经过考虑，让鲁瑛去管一个部的宣传，另一个叫邵以华的同志，分工管行政出版部门。后来，我们才知道，鲁瑛和姚文元关系密切。难怪后来他竟当了《人民日报》的核心小组组长和宣传小组组长。

陈伯达明确说，吴冷西、胡绩伟不得插手工作。那么其他几位副总编呢？我们让安岗回记者部管采访，让王楫、李庄协助夜班同志工作。这样，每天下午和晚上，王楫和李庄两位副总编辑，按时来到办公室协助我们。我们虽然是工作组成员，掌大权的，但对他们十分尊重，让他们修改稿件，提出版面安排意见。开始，重要新闻太多，一版容纳不下，李庄说，重要新闻都可以

安排在一版，办法是标题放大，特别重要的，全文放一版，其他依次将本文转二、三、四版。这个办法周总理很赞赏。以后我们就按李庄介绍的经验办。几个月的相处，我们和王楫、李庄相互比较了解了，也建立了同志友情。

毛泽东问唐平铸“你听不听话”

大约是6月8日晚，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召集中央工作组同志开会，宣布他明天去上海向毛主席汇报，他走后，由唐平铸代理他的工作。一会儿，他又说：唐平铸代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为什么陈伯达要唐平铸代理他的工作？别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了解唐平铸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早年留学日本，解放战争时期当过第二野战军某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全国解放以后，调来总政治部宣传部任新闻处长，1955年《解放军报》成立，调军报任副总编辑。11年来，在办报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央军委特别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正如军报党委十年总结中所说，做到了“坚信、紧跟、合拍”。唐平铸虽然最初没有参加中央工作组，但从6月1日晚上开始，他便和胡痴一起，每天主动协助工作组的工作，直到第二天清晨。所以，陈伯达宣布由唐平铸代理他的工作，我丝毫不感到意外，而且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因为我们在军报共事了11年，彼此还比较了解。

自从唐平铸负责《人民日报》工作后，陈伯达来的比较少了。上边布置什么，《人民日报》需请示什么，都是唐平铸跑钓鱼台。当然，《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的宣传基调，陈伯达等人已定好了，那就是对中央文革要“坚信、紧跟、合拍”。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唐平铸。毛主席说：吴冷西不听话，不知你唐平铸听不听话？唐平铸回到《人民日报》说，他当时很紧张，连“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也忘说了。

给毛泽东诗词手迹中掺假和第四个“伟大”

一天下午，唐平铸说要发表毛主席草书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的书法潇洒、豪放，自成一格，能给人以激励和美的享受。但诗词中“蚂蚁

缘槐夸大国”句中的“缘”字，是涂改后另加的。本来这样发表，更能完整保持和表达出毛主席手书真迹。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大人物”的指示，唐平铸告诉，要把涂改处抹掉，重写一个“缘”字。他打电话叫来《解放军报》秘书处副处长高寄语。高寄语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自幼酷爱书法，写得一手“仿毛体”。唐平铸要高寄语按照毛主席书写《满江红》的笔迹和结构，认真真补上一个“缘”字。高寄语肩负这样一个“光荣使命”，仔细地仿照毛主席的笔迹，写了好多个“缘”字，唐平铸选中了一个，询问了在场的人，经过制版加工后补了进去。以后，各处都照样印制的毛主席手书《满江红》词中的“缘”字，其实并非真迹，而是这样造出来的。这个谜，早就应当揭开了。

林彪经常说，他谈问题时，常用自己的语言。林彪爱拼凑数字词语。在东北解放战场，他提出“三三制”、“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这样好记，也曾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建国以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又搞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文革”开始，他又提出四个“念念不忘”。大概是七、八月间，林彪在一次大会上称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消息拿到唐平铸手中，他思考了一会，说：三个“伟大”不完整，中国讲求对应，凑四个“伟大”才好。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应该再加上一个“伟大统帅”。唐平铸打电话给“林办”报告给林彪，林彪很满意，以后又亲自手书了“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很快传遍全国，多得连毛泽东本人也讨嫌了。

一分为三·在劫难逃

陈伯达住在301医院治病时，曾口述一篇社论，要胡痴记下来修改。当时，他对胡痴是很器重的。一次，他一时兴起，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8个字：“伯达不达，胡痴不痴。”送给了胡痴。陈伯达此举是何居心，不得而知，但他写下的这几个字，至少也算一件“名人手迹”。所以，当时胡痴曾将它装裱起来，一度挂在自己办公室里。这是一段题外轶事了，但也可以看出陈伯达拉拢人的手腕。

一天夜间，在《人民日报》吃晚餐时，陈伯达对在场的唐平铸、胡痴说：我看你们《解放军报》的干部可以一分为三，一部分人留下办《解放军报》，一部分人来《人民日报》，一部分人去新华社。陈伯达并要胡痴去新华社任代社长。不久，胡痴就去新华社走马上任了。唐

平铸则从《解放军报》又调来几位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

6月下旬，《解放军报》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势很凶猛。由于当时军报的唐平铸、胡痴很受“中央文革”的信任重用，所以绝大部分大字报都说以唐平铸、胡痴为代表的军报党委是“高举红旗”的。斗争的矛头指向原总编辑华楠和几个党委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有的大字报说华楠是总政梁必业副主任的党羽，曾参与为彭德怀翻案。我的罪状是紧跟华楠和梁必业，在军报推行“三家村”一套黑货。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上班。造反派怕我看不到办公室贴的大字报，专门写了贴到我的宿舍里，要我交代问题。对于这种突如其来来的攻击，我没有在意，照样每天去《人民日报》上班，坚持工作。我对唐平铸说：我12岁到延安参加革命，一直在军队做宣传工作，来军报已11年。1963年以前，我管了一段文艺宣传。1963年10月就到记者处任处长了。无论是管文艺宣传，还是参加由叶剑英元帅领导的军事反修写作组，都是遵照领导的指示干的。何况重要的稿件都要经分管文艺宣传的唐平铸审阅。我说，有问题也不能把帐算到我一个人头上。对我的意见，唐平铸不置可否，只说你是中央工作组成员，还要继续在《人民日报》工作下去。当然，唐平铸对我的分工做了调整，不要我再管夜班，分配我专管理论部、文艺部。为了表示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我全力抓两个部门的工作，并要文艺部大力推广毛主席语录歌，亲自写按语。

“文化大革命”像决了堤的洪水，在全国泛滥成灾。1966年底，军队领导机关也受到冲击。我终于被军报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四类干部”，也成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终于在1967年1月4日，被要回《解放军报》接受批斗。自此，结束了我的历史一瞬间的中央工作组成员的使命。

1967年1月13日，肖力（即李讷）领导的军报革命造反派突击队，彻底摧垮了《解放军报》党委，一大批老干部（包括唐平铸、胡痴）被打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自己参加写出的“横扫”社论中的“牛鬼蛇神”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最后再罗嗦几句：今天我把自己亲历的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一点资料。作为一个正直的、光明磊落的革命者、共产党人，好心总归会办好事。然而也会不知不觉干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再伟大的人物，恐怕也逃不出这个历史的辩证的逻辑。问题是好心人知错要改，也能改。

（责任编辑 卢弘）

○杨毅周

档案解密泄天机
扑朔迷离数十载

轰动台湾的「孙立人案」今破解





孙立人(左二)
是美方属意取代蒋
介石的人选。

第一章 蒋介石检阅出蹊跷 孙立人涉嫌搞兵变

1955年6月6日，万里晴空，丽日高悬。南区国民党军队的数万名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列，聚集在台湾南部的屏東机场的跑道上，准备接受台湾三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检阅。

奉命前来接受检阅的部队，包括通信兵、运输兵、工兵、炮兵、装甲兵和步兵等兵种，当时台湾空军最新式的雷达式喷射机群，也奉命接受空中分列式检阅。

为了准备这次大检阅，各兵种各部队已先在基地操

练了数星期之久。有些部队更是提前好几天来到屏東机场，多次进行“彩排”。各部队长官一再接到上级指示，阐明此次大阅兵的重要意义，强调不能有任何差错。

但是，此次阅兵却有许多异常：检阅原本应在5月底举行，因为台湾北区国民党军队的检阅已于5月27日结束，何况南区各部队已接到过月底检阅的通知，后来却临时决定延期到6月6日了；今天检阅现场的气氛也紧张得异常。一大早，就出现大批军警及情治部门的特务，对机场实施全面封锁，并做彻底搜查。扫雷器反复探测检阅台四周不必说，炮兵部队连一个个炮管都查到了；更为异常的是原定下午两点整检阅开始，谁知时钟鸣过两响，蒋介石却还没有出现。数万名士兵在炎炎的烈日下等候着，阅兵总指挥官罗恕人少将，恭立在司令台前焦急地等候着，难耐的15分钟过去了，仍不见蒋介石的影子。整个

机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数万名官兵的心火在剧烈燃烧。焦急，焦急，焦急，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又过了15分钟，蒋介石仍无踪影。待大汗淋漓的官兵熬到2点40分时，大阅兵才算露面了。3点整，蒋介石穿着米黄色特级上将戎装，襟佩勋章，严肃得毫无表情，偕夫人宋美龄下车后，迅即登上阅兵台，尔后在南部某军团司令石觉中将的陪同下，在军乐声中乘敞篷汽车开始阅兵。到场陪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元老人物何应钦、“国防部长”俞大维、“参军长”孙立人、“国防部副部长”黄镇球、“代参谋总长”彭孟缉、“副总参谋长”余伯泉、“总政战主任”张彝鼎、“陆军总司令”黄杰、“海军总司令”梁序昭、“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联勤代总司令”黄仁霖等，美方陪阅官有泰勒上将、蔡斯团长（美军驻台顾问团）、美驻台“大使”兰金等。

45分钟后阅兵完毕。蒋介石回到阅兵台，训话短短5分钟，便带领受阅部队朗读军人读训，检阅大典匆匆结束。

下午4时40分，蒋介石召见受阅高级军官多人，晚8时，在高雄澄清湖畔官邸，宴请泰勒将军等美国高级将领和官员。出席作陪的有俞大维、孙立人、彭孟缉、黄杰、王叔铭、梁序昭、黄仁霖、余伯泉、马纪壮等，大都是参加过下午阅兵的人士。晚10点，才结束了这紧张、繁忙的一天。

“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



如此隆重的一年一度的检阅大典，何以发生临时改变检阅日期，检阅人迟到40分钟之久的诸多蹊跷？原来这次大检阅的背后，酝酿着一场事变，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当天也参加了阅兵仪式的台湾“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这一场事变，被称为“屏东机场兵变”。事后，人们才被告知，孙立人的一部属郭廷亮，准备借用此次阅兵，发动一场危及蒋介石的“兵谏”，进而引发兵变，只是在阅兵前几天，郭廷亮已被制服，而阅兵后几天，孙立人也因此下台了。

第二章 欲探事件因与果 须知斯人前半生

孙立人何许人也？这里需要先作个交代。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1898年11月27日生。父亲是前清举人，当过教书先生，在山东登州府做过官。家境不错，孙父对子女管教甚严，使孙立人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

1914年，孙立人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孙立人在这里一读就是九年，各科成绩平平，并无惊人之处。但他生得身材高大，是一名篮

郭廷亮在被捕前





孙立人和他的夫人张晶英女士(左)及堂妹孙璧人。(摄于孙立人台中住宅)

球好手，任清华篮球代表队队长，外出比赛屡获冠军。

1923年从清华毕业后，孙立人被保送留学美国。孙立人的志愿是学军事，但他父亲却要他学土木建筑。为不违抗父亲的意愿，孙立人先到美国的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毕业后才考入维吉尔亚军校，投笔从戎。

维吉尔亚军校(VMI)是美国名校之一。著名将领如

马歇尔、巴顿，都是在这里毕业的，与孙立人是前后期同学。

1927年，孙立人学成回国，抱着万丈雄心，想在国民党军队中觅得一官半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然而事与愿违，当时的留美人才，由于派系原因，在军队中并不受欢迎。后经朋友介绍到了中央党务学校，任学生军训

总队的总队附和教官,并教桥梁学。大约教了一年,又投到了宋子文的门下。

1928年,宋子文编练护盐税的税警总团。由美国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任总团长。正好宋子文是个美国迷,编练税警,不但装备要美式,中上级军官也非美国留学的军事人才不用。孙立人的一切条件都合乎宋子文的要求。

仪表堂堂、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孙立人,初入税警总团被派为警长,不久升任特种兵(后改称第四团)团长。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时,税警总团奉命调沪增援。孙立人率第四团扼守上海丁家桥和温藻的阵地。由于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冲锋时被炸弹的碎片击伤,身上创伤13处。宋子文得知,即刻派人将他送到上海法租界的教会医院。在宋子文特别关照下孙立人很快痊愈。孙立人视宋子文为救命恩人。

据说,孙立人治军极严,且能以身作则。他的部属大都知道他的四句话:“经济公开、用人公开、训练严格、管理严格”。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的治军之道。

1941年,为配合盟军作战,国民党当局决定派一个适合与盟军作战的师开赴缅甸。想来想去,没有比孙立人更适当的人选。于是把税警总团改编为正式陆军,番号定为新编陆军第三十八师,孙立人为师长。

1942年4月5日,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到达缅甸,17日孙立人便奉命率领一个团到仁安恙油田解救被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围困的英国军队。骁勇多谋的孙立人虽然只率1000余人,却击溃了数十倍之敌。日军千余被击毙,克复油田,将被围困了三天三夜的7000多名英军及若干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解救出来。创下了“以少胜多,以寡敌众”的战例。孙立人一夜之间成为“扬名国际”的英雄。为此,英国女皇特颁 C. B. E 勋章(大英帝国的“司令勋章”,为军官卓有战功的最高荣誉象征)给孙立人;美国总统罗斯福,也颁发一枚“丰功勋章”给孙立人以资褒奖。

1942年5月27日,新三十八师由缅甸转入印度。1943年春,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合编成一个军,为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在印度整训半年后,于1943年冬率军重返缅北,开始进入反攻。新一军从史迪威公路的北端列多不断向南挺进。历经数百次战斗,攻城掠地,所向披靡。

到1945年4月3日战役结束止,孙立人的远征军打了整整三个年头,解放土地13万平方公里,打通包括史迪威公路在内的国际性质公路2000多公里,打死打伤日军10余万,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孙立人战功赫赫,载誉而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孙立人率新一军从缅甸回国,到广州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即被运往东北,投入反共



宋子文(左一)当时亦支持孙立人担任国府陆军总司令。

的战场。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副司令兼长春警备司令。但在国内战场上,这位“常胜将军”却连吃败仗。四平、长春战役后,孙立人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意见不合而起争执,被杜聿明撤职。孙立人只身一人离开东北南下,所部新一军由黄埔系出身的潘裕昆掌握。孙立人对此十分不满,耿耿于怀,认为蒋介石对他不公。孙立人曾向吴国桢说过:“在东北时期,蒋先生对我不起。”

后来,在美国人的斡旋之下,孙立人被调往台湾任编练司令,负责新兵训练。1949年,孙立人又被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1年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至此孙立人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在连任一届陆军总司令期满后,交卸权柄,转任有职无权的总统府参军长。此任也仅仅一年多,便因“郭廷亮匪谍案”于1955年8月20日引咎辞职。

第三章 郭廷亮“通匪”惊海岛 孙立人下台被软禁

屏东机场大阅兵后,孙立人便从公开场合消失了,报上也没了他的消息。敏感的外国通讯社率先报道孙立人宋子文当时亦支持孙立人担任国府陆军总司令被捕的消息后,台湾当局依然闷声不吭,直到8月3日,即消息封锁了近两

个月,台湾当局才公布了孙立人的“辞职书”。“辞职书”中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局,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30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竟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过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

孙立人“辞职书”中自责的主要内容有二:“一,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竟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二,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现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海导无方,竟致变质,该江云锦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孙立人最后表示:“上述二事,均应按接受钧座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发布“总统令”,批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责令组织以陈诚为主任的九人调查委员会,“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10月20日,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报告,为台湾官方对“郭廷亮匪谍案”的公开说法:主犯郭廷亮,云南河西人,现年34岁,1939年考入税警总团干部训练所,次年3月毕业,留所任教育班长、区队附、区队长等职,从此与当时任税警总团团长孙立人建立长官与部署关系。1948年1月,郭廷亮在孙立人任军长的新一军任榴弹炮营少校连长,驻守沈阳,连部就设在沈阳市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内,与店主白经武日渐熟识,常有过从。郭廷亮经白经武介绍,与一女子李玉竹结婚。白经武还借此常以“匪党”言论煽惑并争取郭廷亮。11月2日共军占领沈阳,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以便离开“匪区”。白经武介绍郭廷亮与他的哥哥白经文会面。白经文当时任共军“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要郭廷亮到台湾长期潜伏,从事兵运,完成两项任务:一,制造台湾国民党军队大规模之变乱;二,等共军攻占时实行内应。郭廷亮表示同意,并与白经文约好联络方式、到台后进行兵运工作的方法及手段原则,拿了黄金十两及路条一张,与妻子一道到达天津,转往上海,同年年底与原属新一军溃散下

来的官兵一起来到台湾。

郭廷亮到台湾后,由孙立人指派,先后出任少校营长、少校队长、少校教官等职,但在1954年8月之前,“郭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直到1954年9月间某日晚7时,忽有一身穿白香港衫、年约37、8岁、操北方口音的人,来到凤山的郭廷亮家中,告诉郭廷亮“白先生要我来看看你”,这是郭在沈阳时与“匪方”约定好的联络暗号。来人自称姓李,对郭廷亮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廷亮最后告诉李姓者说:“请白先生放心好了。”

另在1953年11月下旬,孙立人曾指示陆军总司令部第5署督训组中校组长江云锦,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的高阶学生,与其他同学联络。1954年6月,孙立人卸下“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的职务,改任“总统府参军长”时,又曾令江云锦将已指定的各联络负责人造具名册,7月通知副组长于新民将该名册送交孙立人。8月,孙立人认为江云锦“没有把这事办好”,便命令郭廷亮担负联络责任。

郭廷亮对于孙立人交代的任务“极感兴趣”,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完成“匪谍”任务。于是,郭廷亮在田祥鸿、刘凯英协助下,积极联络100余人,并在各部队中形成组织。

1955年即这次的屏东机场检阅前,郭廷亮认为时机已到,想借助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对孙立人未能当上参谋总长产生的不满,发动“兵谏”,并激发“兵变”,以制造更大的变乱,实行颠覆政府的阴谋。5月15日,郭廷亮到台北晋见孙立人,报告联络工作进展情形,并趁机劝请孙立人采取行动。据郭廷亮后来的“自白书”说,孙立人当时吩咐郭廷亮转告其他同学,不能轻举妄动,如有意见,可以等孙立人5月25日左右到了屏东再说。但是,郭廷亮却在事后转告各同学说,孙立人将军已经同意,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请各同学做好准备。

但是,郭廷亮阴谋叛乱的事,却被他所联络的同学向国防部告发,1955年5月25日,郭廷亮被逮捕。5月27日晚,刘凯英到台北报告孙立人,孙立人送钱资助他逃脱,并派随从副官陈良坝于5月28日晚上,坐车南下通知了很多人。“兵变”遂告流产。随后案内的其他人员也相继被捕。

这就是6月6日屏东机场阅兵前后所以出现诸多异常的理由。

这份长达16000余言的调查报告,10月31日正式公布。同时公布的蒋介石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坦诚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即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

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孙立人随即被移到台中软禁,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默默度日,了此残生。

自事件发生,台湾岛内,特别是香港、海外,一时间“舆论沸腾,人心激愤”。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公布,并没有解除人们心中的疑虑,许多新闻媒体更是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质疑。香港的《祖国》杂志,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一,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谁能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二,“失察”不能成立,以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为由去孙之职,似也欠妥。“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三,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无法服人。四,关于郭廷亮案件,实无确凿证据。“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台湾的“监察院”也觉得此事重大,提案要求调查孙立人案。后经蒋介石同意,于10月21日成立了由陶百川、曹启文、肖一山、王枕华和余俊贤等5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对此案进行调查。全部调查工作于1955年11月中旬完毕。但当调查报告定稿之后,台湾当局却不让该报告公诸于众,而是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陶百川曾坦言:五人小组调查结果“与其他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

1956年9月29日,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判处郭廷亮死刑。同一天蒋介石下令,将之减为无期徒刑。据说,这是五人小组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孙立人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才使郭廷亮免于死。

因此,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言行,更使人们相信:此案的背景复杂,内幕极深,非同寻常。只是在当时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之下,又有谁敢直言陈谏呢?孙立人明摆着是政治的牺牲品,可又有谁敢为他鸣冤叫屈呢?

第四章 孙立人呼吁“还我清白” 郭廷亮抖露“兵变”真相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

蒋家王朝统治台湾的历史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台湾

政治气氛的宽松。过去许多被视为“禁忌”“限制”的案件,如“二·二八事件”、“江南案”、“张学良案”、“孙立人案”纷纷要求翻案。而其中“孙立人案”极富戏剧性,特别引人注目。

经过孙立人的子女、亲属及老部属的日夜奔波,并获得台湾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台湾当局终于有所回应。1988年3月20日,孙立人的老部下、“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自到台中市向上路的孙立人家,向孙立人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孙立人虽然对此表示感谢,但仍要求台湾当局为他恢复名誉,“还我清白”。在接受记者谈到“平反”之事时,孙立人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

孙立人在台湾当局“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软禁长达33年。当年55岁的孙立人,此时已成耄耋老人。不管舆论界,还是“立法院”,都异口同声,要求台湾当局重新调查此案,至少应公布1955年“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

在各方压力之下,台湾“监察院”终于在1988年3月30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份调查报告。然而这个报告书并不如大众所预期的那样,多少有点令人失望。报告书上说,五人小组只是调阅了有关部门的相关档案,并单独询问了孙立人本人,但对此案的关键人物如郭廷亮等,却无法约谈,更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因此,报告书的基调是维持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最终并没有、也不可能推翻郭廷亮“阴谋举事”这个事实,也还是认为孙立人应负“行政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尽管如此,“监察院”报告所做的解释,与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仍有大相径庭之处。如:一,认为郭廷亮不是匪谍,屏东机场兵谏事件的企图仅为向总统呈递改革部队行政之建议书,并无叛乱之意图,且未实行,不能以叛乱罪相绳;二,说孙立人派人侦察阳明山、西子湾的总统官邸地形,意图以兵力包围后实现其苦谏计划,实际只是孙立人派人到阳明山找地建屋而已;三,孙立人联络下级军官之动机,出于爱惜其苦心经营多年培育之成果,并没有发展秘密组织。

孙立人看完这份报告后,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谁能给我清白,谁能还我公道”。再次呼吁“应该还给我们应得的荣誉”。

与此同时,另一更具有爆炸性的文件被披露出来。“兵变”的主角郭廷亮之子郭志忠,向台湾新闻界公开了1983年3月16日(蒋经国第六任总统任期内)郭廷亮向“本案前调查委员会委员张群先生和蒋总统经国先生”递交的“陈情书”,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抖露出“兵变”的真相:

1955年5月25日下午6时,郭廷亮忽遭逮捕,受到严酷刑术和无休止的侦讯,7月14日下午8时,郭廷亮由国防部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少将陪同,会见了情报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对郭廷亮说:

“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主席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处理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

毛人凤还说,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军人,要遵循上级的指示去做。“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影响。等到案情结束后,我就给你调更好的军职。”并不无威胁地说:“你的家眷现在保安处,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我就立即派人送他们回家。你必须多为你的妻室儿女着想。”

在毛人凤的威逼利诱之下,郭廷亮无可奈何地按照情报局的指示去做。所有自白书和口供笔录,都是根据案情发展需要,由毛惕园杜撰的。

在法庭审判前,毛人凤又两度召见郭廷亮,一再保证审判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并且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执行上级的决策”,要郭廷亮站在“党国”的立场上将此案件承担下来,并答应把详细情形向“领袖”提出详尽的报告。

但在审判后半个月,毛人凤就因病去世,未能完全实践诺言,使得郭廷亮在狱中度过20年之久,直到1975年7月14日才被释放。

除了这个“陈情书”之外,郭廷亮及其妻子、儿女等还向外界披露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说,郭廷亮入狱后,每月领月薪300元(郭廷亮当时任少校,月薪只有90元),家属另外领有500元,以后又增至800元。全家迁往中和市,住进国安局的房屋,逢年过节还由专车接送,与郭廷亮团聚。1975年郭廷亮出狱后,又被送往绿岛管理图书馆,每月支领薪水5000元。1980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还出钱为郭廷亮一家购买房子。1982年7月底,郭廷亮从绿岛获释返家,向警总支领了60万元生活补助费。1983年9月,郭廷亮又与绿指部签约5年,为其雇用到绿岛养鹿,月薪2万元。总之,国民党情治部门为郭廷亮一家花了不少的金钱和心血。一个“匪谍”竟然受到如此厚待,可见国民党当局居心叵测。

至此,情治机关为国民党当局排除异己,而精心炮制的“郭廷亮匪谍案”,终归真相大白。

但“孙立人事件”的内幕并没有揭开。为什么台湾当局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整肃孙立人,使这位赫赫有名、功勋卓著的战将遭此灭顶之灾?自从“孙立人事件”发生以来,隐藏在幕后的动机,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人们的评说,主要集中于三个因素:

一是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倾轧。蒋介石任命孙立人

为陆军总司令后,孙立人同黄埔系将领的矛盾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因此有人断言,“孙立人事件”是陈诚等黄埔将领为排除异己而蓄意制造的。

二是孙立人抵制在军队中推行“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的政工(即特工)制度。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报道“孙立人事件”时,就曾这样评价:“孙立人虽然在军中居于高位,但他在台湾的处境一直很微妙,他对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在军中的政工制度一向不放在眼里。”使孙立人与蒋经国之间矛盾加深。因此有人说,这次事件是“政工帮打败了常胜将军”。

三是孙立人与美国关系过从甚密。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美国采取了弃蒋而去的“袖手政策”。蒋介石万般无奈,不得不重新启用倍受美国青睐的孙立人,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作为向美国示好的手段,以拖住美国,争取美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台关系逐渐稳固,美国便直接与蒋打交道,把孙立人这张装点门面的“王牌”闲置不用。“兔死狗烹”。蒋介石先是收拾掉原台湾省主席吴国楨,然后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的职务,让孙立人任了个参军长的闲职,最后再罗织罪名将孙立人贬入冷宫。

真可谓:“成也美国,败也美国”。

第五章 数十年谜案今破解 美国人插手是主因

1990年11月19日,92岁的孙立人在台中病逝。喧嚷一时的孙立人平反案也告平息。过去的事难道就这样过去了么?

终于从新近公开的美国秘密档案中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孙立人事件”的关键史料,就静静地躺在美国政府部门的保险柜里

从1988年起,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开始解密部分早期的中美关系档案。其中包括1950年前美国对华(海峡两岸)政策的有关文件。1992年,美国又解密了1950年对华政策的档案。在这批档案中,有美国曾经一度找孙立人,试图在台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蒋介石的计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文件第一次透露:孙立人对美国的策划有正面的回应。从而为“孙立人事件”提供了新的注脚和佐证。

以下即为美国特务策划孙立人发动政变之前因后果:

一、美国对台湾觊觎已久

早在19世纪,美国对台湾就垂涎三尺。当时的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伯里(Matthew C. Perry)就建议美国应占领



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向国安局提报处理台湾问题报告书。



一九五〇年，国务院官员尼兹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的方案。



美国当时对台政策，完全由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鲁斯克主导。

台湾为殖民地。二次大战期间，《被出卖的台湾》一书的作者、美国特务柯尔(G. H. Kerr)更是露骨地表示，为了美国的利益，“难道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主张台湾“独立”。

但是，战后美国远东的基本策略之一是扶植中国的亲美政权，遏制苏联对亚洲的扩张。基于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没有采纳柯尔的意见，而是先后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表明战后台湾与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并由中国政府直接收回。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抗战之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不到四年，国民党的政权土崩瓦解，被赶出了大陆。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心重新考虑其对台政策。1948年，美国总统军事顾问李海上将提出《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性，主张美国无论如何必须确保台湾长期属于对美友好的政权。

根据军方意见，美国国务院拟定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明确规定“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台湾)和佩斯卡多尔群岛(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我们不公开承担单方面义务和施加单方面的压力的条件下，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来”。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分离主义”政策。

1948年秋，美国开始设定多种分离台湾的方案。其中的第一选择方案就是“弃蒋保台”策略。把腐化无能的蒋介石甩掉，物色一位既杰出能干，又是反共亲美的政客

作为其代理人。山姆大叔看中了留美的将领孙立人。

二、阻蒋入台

在蒋介石尚未到达台湾时，美国就希望孙立人能主持台湾省政，阻止蒋介石进入台湾。以免将战火引向岛内。

最早在秘密外交电报中提出此想法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参事默践特(L. T. Merchant)。他于1949年2月由南京抵达台湾后，向国务卿艾奇逊发电说：“当前局势之关键在于省主席人选，陈诚身为蒋氏亲信，不能靠他制止较不受欢迎之大陆人涌入台湾，由代总统李宗仁派孙立人取代陈诚，似乎最符合吾人利益之举……”

艾奇逊即指示默践特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议，由司徒雷登向李宗仁提出以孙代陈的建议。李宗仁向美国表示，他可以任命孙立人，但他虽然名为总统，人事权却仍在蒋介石的手中，需先征得蒋的同意，李宗仁希望由美方向蒋介石提出。

此事不知为何被陈诚得知。陈诚以攻为守，主动向美方表示，美国如有意由孙立人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愿意让位，但要美方向蒋介石打招呼，只要蒋不予阻挠即可。蒋介石随后在溪口召见孙立人。据孙立人本人说，双方“相谈甚欢”，蒋要孙回台湾后，继续训练新军。“当孙起立告辞，蒋氏还殷殷出户相送”。

但是，蒋介石对此的实际回答是：将台湾军政大权都集中在陈诚身上，大大加强陈诚的地位，根本无意让孙立人插手台湾事务，却有意将孙“冷冻”起来。以至到1949

年6月,孙立人见到美国人时,“情绪低落”,怪李宗仁 and 美国人未及早行事。

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到达台湾,美国阻蒋入台的企图遂告破产。部分美国政客又想新对策,开始考虑利用孙立人在台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三、游说孙立人反蒋

1949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凯南(G. F. Kennan)向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新的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其要点是:“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各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立人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中国驻台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人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旨在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

1949年秋天,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 Rusk)和他服役时代的老长官默里尔准将(Frank Merrill)密商,由后者前往台湾,直接找孙立人,探询孙立人有无“救”台湾的“一些计划”。

默里尔的台湾之行,是美国官方首次当面向孙立人试探反蒋的可能性。但孙立人除了发牢骚之外,并未对默里尔的试探作正面回应。

与此同时,美国韦利斯汽车公司老板卡纳德(W. Canaday)也为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L. Johnson)草拟一项计划,建议孙立人担任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并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分子,在胡适的领导下组成内阁。据说,宋子文也支持这项建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K. Krentz)抵达台北,与孙立人接触,告诉孙立人“如果他同意控制”国民政府,则美国“将会彻底支持他”。这是美国政客第二次当面试探孙立人反蒋的可能性,孙立人还是拒绝了克伦兹的游说。

四、干预人事安排

在秘密游说孙立人反蒋的同时,美国还以停止经济援助、撤销军事保护为筹码,公开要挟蒋介石,干预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安排,以达到扶持亲美代理人的目的。

1949年底,国民党情报头子郑介民到华盛顿,商谈军事援助之事。美国海军部远东事务特别顾问巴乔上将(D. C. Badger)对郑介民说,国民党如要求美援,则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取代“不能适应局势”的陈诚。并建议拔擢吴国桢出任省政府主席。巴乔还说,国民党必须与美国顾问“诚心诚意”地合作,否则他们就撤出。处在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2月中旬,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9年12月28日,巴乔又分别向国民党驻美武官皮宗敢、蒋介石的秘密特使董显光责问:为什么身为台湾防

卫司令的孙立人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等等,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践给吴国桢和孙立人充分权力的许诺。

麦克阿瑟对台湾问题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野心,并为“反共、保台、撤蒋”而“不遗余力”。1950年1月,麦克阿瑟派得力助手、麦帅总部情报处处长威洛比将军(C. A. Willongby)访台,劝蒋介石将治台权力交给吴国桢,并离开台湾;威洛比又说,蒋介石如要留在台湾,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麦克阿瑟无知而坦率的建议,理所当然地被蒋介石一概拒绝。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又派专机到台湾,把孙立人接到日本,面授机宜。

五、策划政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解放军已基本控制大陆全境,并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攻台。12月8日,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无美国军事占领或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

鉴于如此紧迫的情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对台政策。一方面,做好抽身脱离的舆论准备,一旦台湾为中共解放时,可为自己对华政策的失败提供辩护和宣传。另一方面,在不能直接派兵对台实施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加紧策划亲美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蒋介石政权,为“挽救沉船”作最后的努力。

在195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万般焦急的美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政变的方案,并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了孙立人的身上。

1950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中国科拟定了一份“台湾政变草案”(Draft Coup defet in Formosa),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将褫旗”的政变指挥官,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主旨,推倒蒋介石政权。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呈报上级的《台湾可能的发展》的机密报告中指出: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有关政变的谣言已实为传闻,蒋周围的人也知道”,“孙立人的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对军政领导人的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果未获得美国实质上的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1950年4月27日,美国驻台武官巴雷特(David Barrett)与孙立人接触。巴雷特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及绝望的状态,并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

助理国务卿腊斯克5月1日看到了巴雷特发回的电报,5月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Paul H. Nitze),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提出由孙立人发动政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

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召开对台政策会议,并拟定一项“极机密”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如果美国要防卫台湾,则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民事与军事交由美国所指定的中国人(即大陆人)和台湾人领袖;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将驻防台湾水域,以避免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如蒋介石抵制上述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六、孙立人回应

1950年6月下旬,孙立人有了回应,通过美国密使、前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向腊斯克递送了一份密笈,提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他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并要求美国支持,至少予以默许。

为防止机密外泄,以免蒋介石杀害孙立人,腊斯克当场毁掉密笈,并告诉了艾奇逊。艾奇逊答应呈报杜鲁门。

七、朝鲜战争救蒋介石一命

据解密的美利坚国务院中国科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拟议的台湾政变“预定日期”(target date)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也就是6月24日或6月25日。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就爆发了。美国对台政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军事政变”的方案宣告取消。当晚,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同时监督“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攻击”。

腊斯克说,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但据解密的档案和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腊斯克等人仍未放弃迫蒋下台的念头。凯南在6月2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会议中表示,蒋介石“随时”都将会被推翻。

1953年3月20日,被艾森豪威尔击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前伊利诺州长史蒂文生访问台湾。当天,蒋介石与他会谈。21日晚10点30分,史蒂文生回到台北宾馆后,孙立人即到宾馆与史蒂文生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据史蒂文生的档案称:孙立人显得不太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然担心房间装有窃听器。孙立人称赞史迪威将军二次大战时在华的表现,并认为马歇尔将军于1946年调处国共纠纷时,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没有效率和未获全民支持的批评,乃是“绝对正确”。孙立人还说,秘密警察仍在台湾严厉控制思想,蒋介石父子不择手段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

八、清除孙立人势力

事实上,蒋介石对美国人的阴谋以及与孙立人所做的一系列联络、接触,均了如指掌。据文献指出,孙立人在抗战期间即因与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之

前身)关系颇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到台湾后,孙的一举一动,蒋介石都悉数在握。何况在美国政府中,还有一批政客与蒋家关系异常密切,经常向国民党驻美大使馆通风报信。正当美国策划在台发动政变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时,在华盛顿即已盛传蒋介石将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的风闻。

蒋介石面临着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残局,对于美国的绝情、孙立人的“叛逆”行为,只好隐忍再三,甚至还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让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台湾保安总司令等职。

朝鲜战争的爆发,解除了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美国重新回到扶蒋保台的立场上,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到台湾,中美关系日趋密切、稳固。1954年,美国与台湾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蒋介石更是有恃无恐,彻底清除孙立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3年春天,蒋介石首先罢黜“挟美自重”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把他放逐到国外去。1954年6月24日,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改任有职无权的总统府参军长,解除了孙立人的兵权。1955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孙立人事件”正式开场。

1955年5月28日上午10时,蒋介石将孙立人召到总统府,第一句话就问他:“近来看什么书?”孙回答:“南宋史”。蒋说:“那很好!很好!”紧接着又说:“你没有什么,你以后少跟政客们来往。”孙回答:“是的,我一生最讨厌玩政治和与政客打交道。”蒋随即说:“这次我要把你给孤立起来。”同时面色变得很气愤,但马上又转为微笑地说:“你对于训练部队很好,不过打仗不行。”孙立人迷惑不解,辩解道:“不然,将不知兵,何以为战?盖兵战实为一体两面,而不可分离。窃职总发从军,追随钧座三十余年,转战国内外大小几百余战,从来不屑钧命,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守无寸土之失,殊不知钧座所言‘打仗不行’何所指也?若言争权夺利、欺世盗名,则职不屑也。”说完,转身就走,从此两人再未相见。

6月6日,“屏东机场兵谏事件”出现。8月20日,孙立人被迫辞职,接受调查。随后不久即被送往台中,终身软禁。

显然,所谓“郭廷亮匪谍案”、“屏东机场兵谏事件”,都是蒋介石父子为清除孙立人而制造出来的借口。而孙立人也确实曾经在美国的策动下试图谋反。此时,美国对蒋已无可奈何,孙立人竟成了美国妄图分离台湾、霸占台湾策略下的牺牲品。

说到底,还是美国机密档案的曝光,才使得沸沸扬扬、扑朔迷离的“孙立人事件”完全破解。

(责任编辑 洛松)



宋庆龄、蒋介石、宋子文等在孙中山国葬仪式的送葬行列中。

宋庆龄

姐弟的分分合合

宋子文

○连若雪

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自1927年武汉分手后，一个是为寻求新的革命道路而继续奋斗，一个则是为蒋介石也为宋家而“奔波劳碌”。虽然在孙中山安葬典礼之日，姐弟俩再次重逢，之后又在宋母去世的日子里，姐弟俩共同守灵发丧，但是，政治上的分歧却无法弥合。一个是要“宋家为中国而存在”；一个是要“中国为宋家而存在”。这个裂痕太大、太深。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民族大敌冰释了姐弟俩的积怨，他们又携手合作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遭到国人反对，连为蒋介石效劳的宋子文也反对。此时，宋庆龄正在进行着营救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的工作。宋子文对二姐所为非但不埋怨，反而表示理解和同情。他认为，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作法太过分了。对于在抗战问题上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和，宋庆龄也深为知晓，她对弟弟没有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感到些许欣慰。

当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庆龄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行为深表钦佩，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慰劳十九路军广大将士，鼓励他们奋勇杀敌。宋子文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调出自己组建的缉私卫队3万人，参加十九路军的抗战；当蒋介石要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以示惩罚时，宋子文成为国民党政府诸多官员中反对最烈的一个。

1934年8月，上海发现了《为对日作战宣言》的印刷宣传品，主张国民党对日作战，署名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处”。在发起人中，有宋庆龄的签名。8月5日，日文报纸《日日新闻》为此致函宋庆龄询问此事，宋回信说：“余不但列名宣言，且对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团诸同志的观点，亦予以完全赞同……吾人并未忘记1932年……日阀在沪肆行屠杀之事……”当这一消息传到南京政府时，宋子文猜想这个“自卫委员会”肯定与中共有关，可他却装聋作哑，默不作声。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这段时间里，宋氏姐弟虽然没有过多地接触，然而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却心照不宣。宋子文深信二姐的人品，她绝不会在恶势力面前低头。而宋庆龄则了解她的弟弟所崇拜的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文明与民主，不喜欢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宋氏姐弟相信在反对日本侵略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可以重新站在一起的。

对于宋庆龄与中共的往来，宋子文心里明镜一般。所以，当蒋介石在“剿共”不得手才迫于国人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时，正是宋子文向蒋介石提议，“派出几路人马”去“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还主动承担了请宋庆龄帮助与中共联系的任务。这时，姐弟二人频繁接触，宋子文有求于二姐，宋庆龄则为宋子文终于走出这一步，主动来找她而高兴。她仍然像当初那样和蔼可亲地对待宋子文，想方设法帮助他完成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

随之而来的是“西安事变”。姐弟俩都主张和平解决，不容许亲日派插足其间。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宋庆龄把对蒋介石的种种怨恨置于次要地位，准备亲赴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一点力量，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她得知宋子文在南京政府内力排亲日派的阻拦，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宋庆龄再次为他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正确解决办法而感到满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问题上尽管还三心二意，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不得不履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所承担的

诺言。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抗战的态度逐步坚决起来，全国终于有了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全民族的抗战气氛。宋庆龄以她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积极进行抗战的宣传、组织和救济等一系列工作。宋子文为了牢牢拉住蒋介石一心一意抗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1937年12月上海沦陷后，宋庆龄转移到香港。在这里，她同宋子文接触更加频繁，姐弟俩似乎忘记了一切歧见，沉浸于抗日工作的忙碌之中。

国内的团结抗战局面基本实现，但是国际上的反战气氛却不能尽如人意。“九·一八”事变后，从“国联调查团”调查报告公布之日起，宋子文就对英、美等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上所持的态度极为不满。“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这些国家对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行为只进行了不疼不痒的指责，或者干脆装聋作哑。德国和意大利就是如此。而英、美等国采取了“中立”立场；法国则表示“无能为力”。更有甚者，这些国家不仅仍然同日本进行贸易来往，而且还供应其战时军用物资。宋子文面对他一贯仰慕的英、美国家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如此态度和作法，十分气愤。可想而知，这样的国际环境如何能拉住蒋介石抗日呢？

1938年2月，世界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宋庆龄与宋子文都曾准备前去参加，因时间紧迫未能成行，只好请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代表出席会议。宋子文当时是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邵力子是副会长。他们联合致电大会：“巩固世界和平力量，反对国际侵略与无人道之残暴行为。”宋子文为了表明他对这次大会的支持，还特意写了一篇对大会的致辞，这篇致辞道出了宋子文自“九·一八”后，对英、美、德、意、法等一系列国家的不满，同时也提出了对这些国家的希望。宋子文在致辞中说，大家在电影和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残暴行为不过是万分之一小部分，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一些国家“助纣为虐”之结果。宋子文还对一些国家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提出抗议。最后提醒这些国家，如果继续纵容日本的侵略行为，那么总有一天，战争也会祸及到他们的头上。宋子文的话后来果真言中，英、美、法等国都被拖进了战争的旋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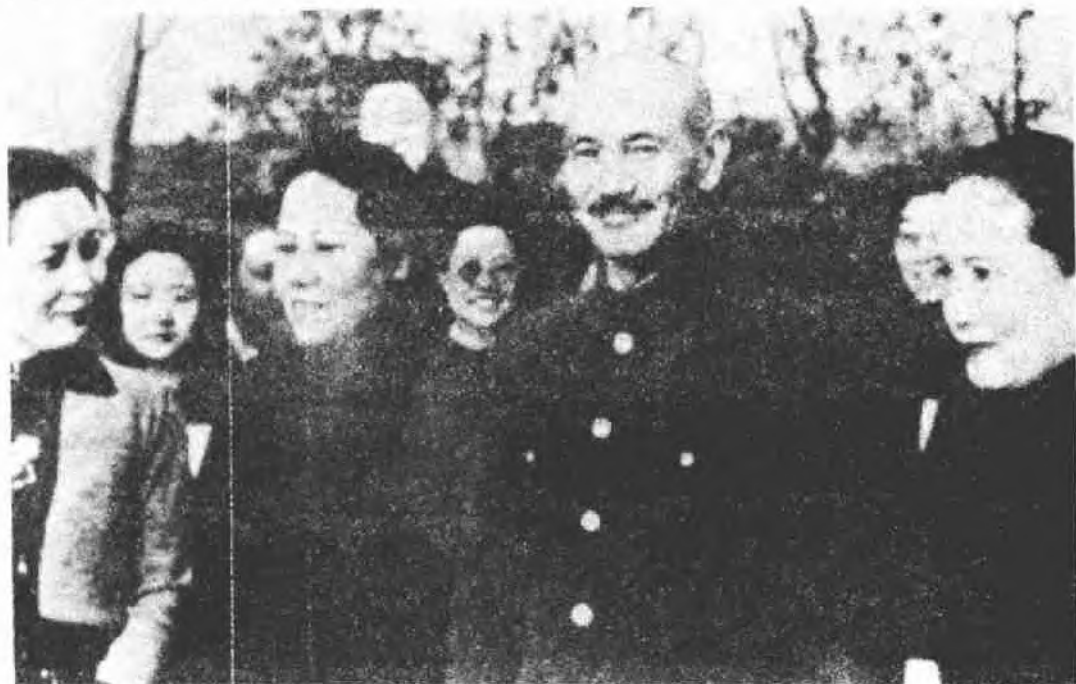
宋子文在国际上为反战而呼吁，宋庆龄在国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人士，如贾·尼赫鲁、保罗·罗伯逊、冯玉祥等，并团结在政治上长期分道扬镳的宋子文、孙科等，作为发起人，成立

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宋庆龄任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克拉克任书记、法朗士任司库、艾培(爱泼斯坦)任宣传。“保盟”支持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揭露各种降日活动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保盟”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广泛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援助,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整个抗战期间,“保盟”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它援助物资,运送给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它还介绍颇多的国际主义战士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木克华、仇克华等大夫。从1938年6月到1939年6月,国际友人通过“保盟”捐款共约港币25万元,合美元8万元,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运往内地,还发动了募捐20万条毛毯运动。“保盟”在争取国外援助抗日战争方面,无论是道义上还是物质上的援助,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子文在“保盟”成立初期,就极其重视“保盟”的工作,认为它是向国际上传递中国抗日战争信息的一个重要组织,这与宋积极寻求英、美援助的步调是合拍的。所以,当1939年1月,宋庆龄倡导组织“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合”),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宋子文时,宋子文欣然替“工合”筹到了初建时的资金。国际友人艾黎和艾德加·斯诺等人,都是“工合”的筹办人。他们提起此事都说宋子

文帮了不少忙。

宋子文在香港期间,常出面参加由宋庆龄以“保盟”名义组织的救亡活动。譬如1940年2月,宋庆龄为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募捐典礼,宋子文、孙科夫人以及香港总督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募捐仪式完毕后,大家一起观看了墨西哥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电影。

香港沦陷以前,宋庆龄因工作需要偶尔到重庆去,宋美龄则经常由重庆到香港来。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宋氏兄弟姐妹大团聚的日子,也是政治上分道以后首次出现的彼此之间和睦融洽的日子。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一同从香港到重庆考察妇女工作。当时大姐宋霭龄是“伤兵之友”总会会长,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组织一般抗日救亡工作,宋美龄也协助蒋介石进行抗日工作,宋氏三姐妹都有引导更多的中国妇女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愿望。她们一到重庆,宋美龄就兴奋地告诉记者:“我三姐妹此次回来,知否?”4月7日,在蒋介石为宋庆龄、宋霭龄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宋氏三姐妹都很高兴,作了热情的讲话。宋美龄更是兴奋异常。她对与会者说:“今天大家不是来听我演说的,而是来欢迎我两位姐姐,我以小妹妹的资格作个介绍人,心里非常愉快,由我脸上你们也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快活。孙夫人自抗战后做的工作是极重要的,她写文章向国外宣传,使友邦知道我们为什么抵抗敌人。



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右起:宋庆龄、蒋介石、宋霭龄、宋美龄



右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在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

孔夫人也曾在上海抗战时做了不少伤兵工作，她曾捐助四十辆卡车运送伤员，现在她是香港“伤兵之友”总会会长。这次到重庆来，想必大家都盼望她们领导妇女工作的，是吗？”接下来，宋庆龄说道：“孔夫人和我来重庆后，视察过敌人轰炸的灾区以及同胞的哀吟情形，心里十分难过。可是看到复兴建设工作，又十分高兴。我们妇女不要只从事书面文章的工作，要切实实地去教育一般妇女，民主政治是和妇女非常有关系的，国民代表大会妇女一定要参加，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实现民主政治和坚持抗战的工作。”宋霭龄在讲话中说：“……来重庆，见些旧友，认识些新知。其实我们的精神和心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要合作，因为合作才能团结，团结才能使工作进行顺利……。”

面对此情此景，宋子文感叹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自从他的二姐离开宋氏姐妹另辟革命新途后，今日还会回到他们当中来！凝视着三姐妹亲密和谐的笑貌，宋子文双眼湿润了。那么坐在一旁的蒋介石此

时是何种滋味？多年来，他一直想控制住宋庆龄，为其政治服务。今天，宋庆龄欣然参加了他的茶会，并且同他一起照了相。这是蒋介石企望已久的。当初宋庆龄拒绝同他一起拍照的情景，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但是宋庆龄今后会被利用吗？从宋庆龄口口声声讲民主政治的话语中，蒋介石心中预感到：他是无法驾驭宋庆龄的。

在重庆的那些日子里，宋庆龄同她的大姐和小妹一起视察了伤兵医院、难民区、保育院、学校等等，还参加了各界妇女的集会。4月18日，她们姐妹三人一同对美国发表广播演说。她们所作的“中国强大乃是世界之福，民主国朋友勿助纣为虐”的演说，使宋子文非常满意。

宋氏兄弟姐妹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携手合作，使她们之间又恢复了一母同胞的情谊，尤其是宋庆龄与宋子文之间。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合作是比较和谐顺利的，而且工作颇具成效，从“保盟”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成果就可略见一斑。宋庆龄一直是中国共产

党的亲密而忠实的朋友，无论是在十年内战时期的白色恐怖中，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宋庆龄力所能及地给了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宋子文在抗战初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精神多次表示钦佩。1937年10月，宋子文与外国访问人员谈话时，提到了八路军的抗战。“宋氏述及八路军在晋北抵抗武器精备之敌军已叠获胜利。继谓往日共党在华南维持长期之抵抗，足为中国人民有以弱胜强以寡胜多能力之明证。共党仅以江西半省为根据地，能与政府军五十万周旋，此足征全国动员，共赴一的，其能力为何如矣……。”宋子文说此番话正值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之后。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全国军民都为之欢欣鼓舞，宋子文自然也不例外。

从宋子文的上述谈话中不难看出，他虽然与中共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十年内战时期又处于敌对位置。但是，他对中共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却实为叹服，他说倘若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都有了中共这种意志和精神，就不怕战胜不了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宋子文怕的也正是中共这种为理想和主义而奋斗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因为他是不能与之共存的。这也就是宋子文在抗日战争后期乃至胜利以后，为什么支持和帮助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

宋子文的这种“怕”已经在他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中有所流露，突出表现在他与宋庆龄的分歧上。宋子文担心中共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认为宋庆龄给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太大太多。因此，他想限制宋庆龄的言论和行动，企图把“保盟”变成单一的寻求国际支援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如何客观、公正地为国内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军民提供援助，宋子文则带上了极大的主观随意性，他站在一群一党的私利上来看待“保盟”，以便让“保盟”按照他的意图行事，却反过来指责宋庆龄等人是在为个别党派服务。

宋庆龄主张，既然寻求国际援助，那么就on应该把援助之所得公平合理地交到任何进行抗战的党派和军队手里。同时“保盟”应该主持公道，对有利于抗日的言论和行为应该予以支持和拥护，否则应予反对和抵制。不这样做，就会使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破裂和倒退的危险。

应该说，宋子文与宋庆龄的上述分歧，在抗日战争之初并不十分明显。宋庆龄也说：“宋氏与‘保盟’原无基本分歧”。但是，随着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在

全国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宋子文也日益担心起来。当然，宋子文的这种担心与蒋介石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忘记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采用种种方式对中共是能消灭一点就消灭一点，能削弱一部分就削弱一部分，待战后再全部消灭之。宋子文则打算在战后把中共融进国民党政府之内。他曾对美国记者摩勒说：“在我们战胜了日本之后，你也许可以见到共产党成为自由政府中间的急进的一翼呢！”如果中共的力量和影响在抗日战争中盖过了国民党，那么战后国民党政府就不好办了，中共将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改变中国。这是宋子文绝对反对的。所以，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以及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力量，宋子文与宋庆龄的分歧也日益明显。

1940年6月，宋子文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要“抗战经费”和军火。宋子文以他独特的能力取得美国朝野上下支持中国抗战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美国政府答应向中国贷款。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加强了诱降活动。蒋介石颇费心机地让亲日派与日方秘密联络谈判，又让朱家骅、桂永清同德国套近乎，还让孙科、冯玉祥对苏联表示友好，再让何应钦、白崇禧出面反共。周恩来生动形象地说蒋介石是在与各方面讨价还价，好便于居中选择。他既想使日本让步，又想敲英美的竹杠，还想讨好苏联求得援助，在他脚踏几只船的同时，却以反共为轴心。震惊中外，以消灭中共力量为目的的“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宋庆龄与“保盟”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坚决支持团结进步、反对一切分裂倒退，指责蒋介石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对中共进行突然袭击的卑劣行为，指出今后决不允许这种破坏团结抗战的事情发生。宋庆龄和“保盟”的抗议电报以及谴责制造“皖南事变”责任者的文章，陆续发表在《保盟通讯》上。使国内外广大读者从这个影响面极广的刊物上了解到“皖南事变”真相。

那么，宋子文对蒋介石以武力攻击新四军是怎么看的呢？当他在美国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又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为蒋介石辩解道：“新四军缴械，是因为不服从，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蒋介石以“箕豆之煎”对付抗日的友党友军，使9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几乎处于灭顶之灾，这完全是蒋介石有预谋、有步骤地“灭共”行为之一部分。在抑制中共的力量和影响方面，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心是相通的。当然，宋子文并不赞成国共两党之间有摩擦，并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要把共产党置于死地，而是把中共看成是一

群爱国、诚挚的人，所以，他才有把中共容纳进国民党政府的打算。

中国共产党再次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同蒋介石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继续领导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宋子文深感欣慰的。从当时美国一般的舆论来看，“皖南事变”可能会引起内战。宋子文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说，坚持认为蒋介石与中共不会发生内战。这点果然言中，他自然高兴。但是宋子文想抑制中共影响和力量的打算并未取消。1941年5月30日，他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英国驻中国大使、宋庆龄邀请的“保盟”发起人之一克拉克，让其把电报转给“保盟”。电报声明退出“保盟”，并辞去该盟会长职务。电报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这类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脱离它，并请你们发表这个电报的全文。”

宋子文的切身利益及其所处地位，使他不容许“保盟”站在公正立场上替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所受到的冤屈鸣不平。正同美国政府打得火热的宋子文，唯恐沾上“亲共”嫌疑而无法跟美国打交道。作为“保盟”会长的宋子文认为，《保盟通讯》上一系列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文章是给他惹了麻烦。宋子文自以为他是最公正的自由民主派，以力主团结抗战的主要代表者而自居，所以他认为“保盟”替中共讲话是助长了中共的力量。为了洗刷自己，让国内外都知道他宋子文与中共无关，所以他让“保盟”公布他要求退出和辞职的电文。

宋庆龄看到宋子文这一电报后，除了深深的遗憾外，更多的是难过。没想到他们姐弟俩重新携手合作刚刚开始，就又要分手了。但是，她并没有把宋子文与蒋介石同等看待，她了解她的弟弟毕竟同蒋介石不一样，所以她仍然以理晓之、以情感之，在接到宋子文电报的第三天，发表了“关于宋子文退出‘保盟’的声明的声明”。“声明”指出：“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只有表示遗憾。由于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统一民主和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宗旨，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保盟”“不应变成国内政党的工具”的指责，宋庆龄指出：“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妥协、投降和屈服。‘保盟’全力拥护第一种政策。

如果这样做，便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她还严正指出：“我们支持中国的统一从不动摇。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统一的事物坚决反对。”

对于“保盟”把国内外人士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宋子文认为“保盟”在救济工作中加进了政治观点。当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代表海外侨胞，把抗战物资送回国内，并提出要亲赴延安，分给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时，首先出来阻拦的就是蒋介石，宋子文则是以另一种方式配合蒋介石罢了。针对此种情况，宋庆龄于6月14日在《救济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中，明确指出“保盟”的工作是有政治立场的，“我们的立场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的救济工作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的，“救济工作脱离政治不可能，正是国民党千方百计阻挠‘保盟’把救济物资运给最需要救济的抗日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才是出于‘政治原因’。”

为了进行伟大的抗战工作，宋庆龄原本不愿把她与宋子文的分歧公开化，但是宋子文坚决要求公布他脱离“保盟”的电报，并在美国讲了一些对团结抗战不利的話，这就使宋庆龄不得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上述分歧导致了姐弟二人由抗战初期的携手合作到抗战中期在抗战救亡工作上分手，这期间，宋子文在美国为抗战寻求美援，一呆就是两年半，他与“保盟”没有了任何关系。宋庆龄则仍在“保盟”默默地、辛劳地做着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做出贡献。今天，宋庆龄已离开人世，而她所创建的组织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力量。

我们不能把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二人在抗日战争中期的分手，同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分手相提并论。因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姐弟俩大目标还是一致的，即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奋斗。所以，宋庆龄对于宋子文努力寻求国际援助还是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中国是个弱国，面对强国的侵略，当然需要外援。每当宋子文取得一项国际援助后，宋庆龄都表示由衷的高兴。但是，她主张这种援助必须是平等的，不附加任何条件。1943年，美国和英国表示愿意放弃在华特权，由宋子文主持与这两个国家分别签订了“新约”。宋子文称“新约”“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国民党政府为此大事张扬，举行大小庆祝会，以示中国外交的胜利。宋庆龄虽对“新约”签订表示高兴，但是，她认为：“不平等条约者，乃指一切的不平等现象而言。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要使政治、军事、政治、文化一切皆归平等”，现在谈不平等条约废除还

本刊重要启事

原本刊发行承包人张勤,从1993年第4期起,未履行任何手续,而单方面终止对本刊的发行。张勤不仅拖欠本刊大量书款,并将1993年全年邮购户书款据为己有,拒发、漏发本刊7000余册(本刊已全部代发、补发),还有一些订户汇寄给本刊的1994年订书款也被他取走。为此,本刊特作如下声明:张勤对外一切债务,本刊概不负责;以本刊发行部名义向各网点所发本刊各期书款,均请与本刊发行部直接结算;张勤用本刊名义所进行的各种经营活动,其责任均由张勤自负。

另外,本刊曾有一枚从未启用的“炎黄春秋出版发行处”作废图章被张勤非法使用,至今拒不交回。本刊特郑重声明,今后凡有用“炎黄春秋出版发行处”图章者即属非法盗用,其一切后果均由使用者承担。

炎黄春秋杂志社

1994年7月20日

为时过早,因为还没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宋庆龄还说,既然欣赏英、美民主精神,那就应该召开国民大会,把民主精神体现于国内。

宋子文完成了在美国的任务回国后,与宋庆龄虽偶尔接触,但他们似乎都感觉到,彼此间的思想鸿沟是无法弥合的了。愈是接近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就愈加明显,那本来就没有消失的分歧不过是被抗日战争掩盖住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旧有的分歧再次突出地显露出来。

1945年8月,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宋庆龄与宋子文迎来了他们共同盼望并为之付出心血的时刻,他们同全中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喜悦之后便是真正分手的时候了。宋子文坚定不移地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要宋庆龄留在重庆,继续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当时,蒋介石准备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为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制造舆论。宋庆龄断然拒绝了宋子文和孙科劝说她务必要参加这次大会的要求。但是,她得知中共领袖毛泽东即将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是”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决定留下来参加欢迎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宋庆龄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上,盼望结束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实现民主

政治。但是实际情况与宋庆龄的期望相反,民主政治的实现遥遥无期,她失望了。

这时,她收到了何香凝给她与宋子文、孙科的信。信中说:“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临终囑言的人,我们不忍看在其国外压迫解除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何香凝信中的字字句句正说到了宋庆龄的心坎上,她毅然离开重庆赴香港。当蒋介石终于不顾国人的反对,于1946年6月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宋庆龄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彻底绝望了,也对宋子文绝望了。她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示脱离蒋介石的国民党。

自此,宋庆龄与宋子文从再度携手走向了再度彻底分手。宋庆龄已经看到了一个崭新天地的曙光,她将为之而奋斗。宋子文则继续挣扎在为蒋介石政权和他自己的事业而效力的道路上。当然,宋子文也没有跟蒋介石走到底,当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行将完结时,宋子文先于蒋介石离开了大陆,去美国当了寓公。

(责任编辑 陈贻林)



从邹韬奋逝世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1998年4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江苏省省长陈焕发的陪同下,参观了靖江县韬奋小学,这实际是一次特殊的追怀革命先烈的活动,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就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请看纪实作品——

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俞润生

1942年11月,寒云密布,一叶扁舟在长江上颠簸向前,缓缓地向北岸靖江岸滩靠近;芦苇滩里传出噓噓的口哨声。小船上摇橹船夫,也相应地“噓噓”吹起来。这是互对暗号。到了,到了,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编辑出版家邹韬奋从上海秘密地来到了苏北。

邹韬奋在苏北的生活时间不长,不到5个月,但这5个月是他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他在经历了“七群君子之狱”后的一次升华。

化装去苏北

邹韬奋从广东梅县畚江头村出发,经过曲江、长

沙、武汉,20多天才到达上海。国民党通缉他的文告,虽然没有贴在上海的街头路口,但是他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在上海,他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东升里陈其襄的家里。

陈其襄是邹韬奋的同事,也可以说是部署。陈其襄是1934年考进《生活》周刊社当练习生的。抗战初期出任生活书店南昌分店经理,负责为生活书店上海总部与后方的运输贸易。为工作方便,他的寓所门口挂着“正泰行”的招牌,他又是这个商行的经理。为了内地贸易进货的方便,他还找一些熟人合伙开了一家“德合企业公司”,他兼这个公司的经理。“德合企业公司”设有百货门市部,是一个完全合法的商店。

邹韬奋在正泰行暨陈其襄的家里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夜就搬到一个“济公坛”的楼上去住了。“济公坛”是陈其襄的叔父和一些信仰佛教的朋友设立的一个弄堂里的小佛坛。陈其襄的叔父是一个退休的邮电工人，和生活书店有着友好关系，为了做好事，积阴德，他愿意帮助别人度过劫难。

沦陷后的上海是一个恐怖的世界。日本侵略者妄图以恐怖政策镇压沦陷区的人民，曾经多次发生在马路上公开杀害进步人士的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统统由日本军队接管，更是恐怖到了极点。邹韬奋在上海的熟人很多，因而他到达上海以后，不能外出走动，只能隐藏在这小小的斗室之内，有时候连窗户也不能打开，更不敢在夜间随便开电灯，生怕引起外人的注意，生怕走漏风声。他憋在小小的斗室里，坐一阵、卧一阵，焦急地等待着苏北方面接应他的消息。

这时，他的右耳又淌水了。他很想找一个医生诊治一下，但他不便外出，直到临近动身的时候，才由陈其襄想方设法，找了一个老专家看了病。医生根据透视的情况诊断为中耳炎。邹韬奋听说是中耳炎，以后不久就会痊愈，就带着病到苏北去了。

日本军队对上海铁路、公路和水上交通戒备很严，不时派一些汉奸特务和谍探，像鹰犬一样在码头搜查、跟踪。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邹韬奋到苏北去，苏北方面和上海地下党不得不极其谨慎，要做好一切防范准备，稍有疏忽，人命关天，会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周恩来给华中局的指示，经过和苏北根据地秘密取得联系，上海的朋友作了如下部署：

一、要邹韬奋装扮成商人，穿上他那件古铜色的呢袍，戴上一顶黑色毛皮筒帽，摘掉眼镜，要装得越像越好，不能有破绽。摘掉眼镜以后的邹韬奋，看不大清楚路面，就由陪同的人搀扶着走路，装成有病的样子。

已经搞到了假证件，假证件上写明持证人职业：商，姓名：李晋卿。

二、找到了绝对安全可靠的船和船夫。

三、选定在僻静的港湾河汉下船。水上行进路线也是经过研究而后确定的。

四、选定护送人和交通员。

与邹韬奋结伴同行的有位20多岁的青年妇女王兰芬，她当时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大众书店工作；另一位护送人是华老太太。她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个女儿被国民党杀害。华老太太从她的女儿身上了解邹韬奋，同情邹韬奋，愿意冒着危险去伴

送邹韬奋。

她们三人装作一家人；邹韬奋和王兰芬是华老太太的“儿女”。

临行前，王兰芬穿着粗布短衫，长裤，手上拎着一一个小包袱。华老太太提着一个烧香的香篮，衣襟上还挂着一串佛珠。他们搀扶着邹韬奋，俨然像一家人。

同行的还有两位青年交通员领路，沿路和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联系，以保安全并照料邹韬奋“一家”。

11月上旬已是初冬季节。萧瑟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他们悄悄地上船，悄悄地离岸，悄悄地行进，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水上封锁线。

“到了，到了！”王兰芬高声地喊着。

邹韬奋踏上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走在靖江的江滩上，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而自由的空气。

他戴上眼镜，笑了，笑得那么舒畅，那么幸福。

他和同志们一一握手。他回过身去和华老太太握手，说：“太感谢您老人家了！”

华老太太说：“弗要紧格！我佢一家人哉！”把大家都逗乐了。

邹韬奋在靖江的大众书店落脚。

去东台三仓

在邹韬奋来到苏北以前，陈毅曾和阿英商量，在盐城成立“湖海艺文社”。由陈毅、彭康、李一氓、范长江、李亚农、王阑西、阿英等为艺文社的发起人。11月20日，陈毅跨上战马，到安徽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部署反“扫荡”的任务去了。临行前，陈毅电告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和陈丕显，要保证邹韬奋的安全，并希望在盐城能见到邹韬奋，共商如何在华东广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文化出版事业。

粟裕和陈丕显当时在东台三仓。三仓距靖江200多里。邹韬奋在新四军一师师部接待员的陪同下北行，到达东台三仓，在一间极其普通的民房里下榻。

据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回忆：他当时住在一个绅士家里，因连日疲劳，这一天他早早睡了，睡得很沉。次日清早起来，发现房里地板上睡着一个人，很诧异。睡在地板上的人已坐起来，微笑着打招呼，并自我介绍：“我姓邹，邹恩润，就是邹韬奋。”

管文蔚赶紧下床和邹韬奋热烈握手，表示欢迎，又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不知道你这样快地来到这里，要知你昨晚来，我再忙也要来接你。”

邹韬奋告诉管文蔚，是四分区吉洛（姬鹏飞）派丁参谋护送到这里来的，一路顺利，大约子夜12点钟左右

住下的。

警卫员在旁插嘴说：“邹先生无论如何不许我叫醒你，叫我悄悄地在地板上打一个铺。”

邹韬奋平易近人，给管文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邹韬奋见到了苏中区党委书记兼一师师长粟裕、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他们热情地握着邹韬奋的手，代表陈毅，代表苏中区党委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邹韬奋在苏中住了一个月左右，从二分区到四分区，看到了部队和群众的斗争生活，还详细询问了苏中的教育工作、文化工作情况。管文蔚都向邹韬奋作了介绍，还请苏中行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和邹韬奋深入详谈。

刘季平为邹韬奋找到一匹马，有战斗时就骑马出发。邹韬奋高兴极了。他同部队战士和党政机关干部共艰苦同欢乐，对于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和中国人民抗日部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战术，有了亲身的体会，他说：“这样的军队，是无法战胜的！”

邹韬奋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以及各阶层人士开始频繁地接触。他参观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的活动，参加过一些干部、群众、中小地主的座谈会。他还接触过革命两面派的乡保长。他为了调查研究根据地的情况，不论碰到什么人就问，并且很认真地把了解的情况记在笔记本上。

邹韬奋到苏中的消息逐渐传开，有不少人专门跑来看他，和他亲切地交谈。一天早晨，一个农民送来一封信。信是敌伪据点里的一个伪营长写的，原来他是邹韬奋著作的读者，想到邹韬奋高尚的革命情操，他为自己当汉奸感到羞愧，特地向邹韬奋表白他的心思。

转移到通西

11月下旬，日本驻安徽定远部队纠集敌伪部队400余人，袭击新四军驻地。徐州、山东敌伪驻军也与之呼应。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即刻进入全线戒备状态。苏北行政公署和一部分部队决定转移到通西地区。

通西地区指南通县西部。骑岸镇在南通——金沙——掘港公路两侧，这里集结着苏中不少抗日实力。邹韬奋就来到了这里。

苏中行署文教处长刘季平、苏中四专署委员季方和通西行署主任顾尔翎等，陪同邹韬奋到温家桥南通县中考察。第一天上午，邹韬奋向师生作了形势报告，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号召师生抗日到底，决不妥协。第二

天下午，邹韬奋和师生们座谈，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邹韬奋还在刘季平的陪同下，考察了如皋县（现如东县）的邱升中学。苏中行署在这里召集了200多人的欢迎会，邹韬奋作了《团结抗日的形势》报告，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会后，邱升中学学生马家齐和几个同学请邹韬奋在笔记本上题词留念。他为马家齐的题词是：“从实践中体验过的知识是最可宝贵的知识 家齐同学 韬奋 1942. 12. 26”。马家齐一直把这页题词珍藏到现在。

邹韬奋还访问了“联抗”地区的军民，在紫石中学（现海安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会由“联抗”副司令员李俊民主持。邹韬奋应邀讲了国内外形势，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会后，他为紫石中学学生干部题词：“继续努力，不断进步！”

1943年元旦，苏中四分区在南通县十总店小学（即现韬奋小学）举行学联会，有教师、学生参加，欢迎邹韬奋。会议由刘季平主持，粟裕、管文蔚、季方参加会议，并讲话。邹韬奋在掌声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后来，邹韬奋还在管文蔚、季方的陪同下，考察了如皋县掘马南区童甸小学。他在全区教师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应有民族气节，坚持抗战到底，做汉奸、当亡国奴是没有活路的。

邹韬奋在通西住了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里，他了解到许多情况。

当他得知华中局的机关报《江淮日报》（社长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兼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王阆西；1940年12月2日创刊），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配合进行军事进犯，办报条件极端困难，不得不于1941年7月22日停刊时，联想到自己主编的《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全民抗战》和《大众生活》陆续被迫停刊，情不自禁地叹惜道：“可惜，可惜！”

新四军军部办有《抗敌报》；新四军第四师办有《拂晓报》，后为淮北区党委机关报；盐阜地区党委还办有《盐阜大众》；新四军军部还办有《前锋》杂志。邹韬奋对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这样异乎寻常地办报办刊，表示由衷的敬意，并表示要向这些同仁学习。

他从报刊上和朋友们的交谈中，知道苏北抗战军民非常崇敬陈毅将军。陈毅将军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还能诗文，报刊上就刊登过陈毅将军的诗词。邹韬奋虽未与陈毅将军见面，但陈毅将军的东进事迹和他的诗词已经给邹韬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为刘谷风录陈毅《卫岗初战》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韬
 奋到南通县通西地区参观考察。
 当时任苏中四分区专员公署文教
 科督学的刘谷风曾参与接待。应
 谷风先生之请，韬奋书陈毅将军
 《卫岗初战》诗相赠，以志纪念。

故國旌旗引江南
 夜半驚呼
 敵胆寒
 鎮江城下
 初意
 顯
 脫手新得小橋南

录陈毅将军诗一首

谷风先生雅属

韬奋
 辛酉年十二月

故國旌旗引江南
 夜半驚呼
 敵胆寒
 鎮江城下
 初意
 顯
 脫手新得小橋南
 1942.12.30.

为马家齐题词

一九四二年十月，韬奋历尽艰险，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十二月二十六日韬奋由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等陪同，来到南通县四分区温家桥县立中学，参加为他召开的盛大的欢迎会。韬奋在会上作了《团结抗日的形势》的报告。报告结束，几位青年学生请韬奋在他们的笔记本上题词留念，其中马家齐同学（现如东县离休干部）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题词。

邹韬奋和刘季平朝夕相处，每天都有所议论。

邹韬奋说，国民党一心对付共产党，他们同日本侵略者相互默契，指使伪军投降，为敌效劳，镇压和杀害群众，他们搞的是投降、分裂、倒退。共产党团结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实行民主，干的是抗战、团结、进步。

邹韬奋一再强调，“中国是不会亡的”。

邹韬奋在苏中地区考察之后，原拟去苏北盐阜区新四军军部。那时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由盐阜迁至洪泽湖以南近安徽的盱眙县境内。苏中区党委接到华中局指示，仍然让邹韬奋去盐阜区继续考察；可以看情况从苏北经由海道去山东，再路过晋冀鲁豫，前往延安。

在他离开通西地区之前，苏中行署文教科督学刘谷风请求邹韬奋赐墨宝留念。邹立即挥毫书写陈毅七绝一首：

故国旌旗到江南，夜半惊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录陈毅将军诗，书应

谷风先生雅属 韬奋 三十一年十二月

邹韬奋还应姜孝如的请求，为他书写一幅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相赠。

临别前一天，邹韬奋向刘季平郑重表示：“我曾经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回答说，‘你现在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斗争，比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同意我入党。”邹韬奋的真诚和恳切的请求，使刘季平深为感动，刘季平答应立即向苏中区党委汇报，并向华中局报告。

骑马到盐阜

大约1月上旬，一师师部派了一个连的战士护送邹韬奋去盐阜区。

他骑着马，迎着朔风，沿着海滩，在稀疏的苇滩里向北行进。

当他们走在大丰县北面时，远远地看到一群新四军将士在海滨走动。走到近前一看，有一名干部的面孔好像很熟悉，再走近看，哦，原来是戴伯韬。邹韬奋急忙下马，和戴伯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邹韬奋仔细端详着戴伯韬的装束，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又向其他战士看了看，天真地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又到家了！到根据地了！自由了！”

戴伯韬把邹韬奋带领到连部休息，立即电告三师师长黄克诚：“韬奋先生已经到达盐阜。韬奋先生急于到师部，希望按他的预想即速奔赴延安。”黄克诚师长表示：首先向邹韬奋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同时指示戴伯韬暂时负责接待，因为军情紧急，日寇正纠集数万伪军准备向苏北扑来；邹韬奋什么时候可以到军部，必须等待军部通知。

三师师部回电到了：尊重邹韬奋的意见，并命令戴伯韬调集一部分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护送邹韬奋到三师师部。

邹韬奋在三师师部见到了刚满40岁的黄克诚和其他负责同志。黄克诚操着湖南口音和邹韬奋谈心，他向邹韬奋介绍了部队近况，要邹韬奋“走一走，看一看，莫着急，啥子时候开拔，还要看军情再决定。先住下吵！”

邹韬奋在这里看到了部队练兵，看到了精兵简政，看到了生产运动，看到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看到了这里没有饥饿，没有恐怖、没有尔虞我诈。紧张地准备着粉碎日伪猖狂。

邹韬奋列席参加了盐阜参议会。参议会代表有工农兵，也有开明绅士和工商业人士；有共产党员，但多数是非党人士和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共商国家大事和地方上的重大问题。邹韬奋对此感慨颇深，自己奔波呼号多年，在这里才真正看到了政治的民主，他衷心赞扬说：“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这时已是隆冬季节了。远在安徽境内的新四军军长陈毅特地叫人缝制了一件崭新的羊皮袍送给邹韬奋。邹韬奋和陈毅未能谋面，却受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感到无限的温暖，也深切感谢陈毅将军。

这半个月里，尽管他极其兴奋而紧张地在阜宁地区考察了解情况，然而他的耳疾又严重起来，右耳、右颊感到刺痛难忍。三师师部请了当地有名的祝医生给他诊治，医生根据病情分析，认为不是中耳炎，很可能是不治之症，建议迅速转地治疗，不能耽误。三师师部负责人研究决定：对邹韬奋的病情严加保密，不得有任何泄漏；同时劝说邹韬奋回上海治疗，待痊愈后再来苏北，并转往延安。

耳疾使邹韬奋不得不停止考察工作，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决定先回上海治病。

这时，日寇和伪军结集了5万人，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扫荡”。

三师师部派了一个班，由警卫营一连副连长杨绪昌带领，护送邹韬奋先到阜宁东北杨庄去隐蔽。他们

找到了一顶轿子让邹韬奋坐。为了保密,不能请民夫,只得由战士轮流着抬。由于道路已被破坏,战士们抬轿又没有经验,怕邹韬奋从轿里摔出来,又让两个战士在前后把着轿杆,稳定轿座。经过了80多里的行程,走了两天才到达杨庄。他们把邹韬奋送到有名的开明绅士杨芷江的家中住下。

在杨庄和射阳

有一天,有一个姓徐的伪军官带领一个团进占杨庄,并且一直闯到杨芷江的家里。

这位姓徐的伪军官对杨芷江说:“你过去在复旦大学教书,我是你的学生。今天我特地来看望你,并且给你带来礼物!”

杨芷江很生气地说:“我不需要你的礼物!”

姓徐的又说:“我已得到情报,邹韬奋先生现在在你家,我想看看他。请把他请出来吧!”

杨芷江一听,更加恼火,又更加紧张。他说:“邹韬奋没有来我家里!”

姓徐的又说:“杨老师,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邹韬奋先生的。现在,我把我的手枪交给你,如果我伤害邹先生,你就把我打死。”说着,他真的取下手枪递给杨芷江。

杨芷江从来未经过这样的事情。他不敢接枪,仍然否认邹韬奋在他家里。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客厅的旁门开了。邹韬奋挺身而出。他对姓徐的伪军官说:“我就是邹韬奋,就是你要找的人。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要为难杨先生!”

伪军官急忙插起手枪,整理好军装,向邹韬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说:“我叫徐××,受国民党指使,要我‘曲线救国’,我并不是真心要当汉奸。希望邹先生写文章时,不要骂我是汉奸!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保护你的。”

邹韬奋严肃地对他说:“既然如此,希望你今后能为祖国立功赎罪,不要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同胞。”

伪军官听了邹韬奋的话,内心钦佩,并对邹韬奋说:“邹先生,让你受惊了!”他又鞠躬,随后转身外出,告诉随他来的伪军士兵说:“这里是我的亲戚家,没有事!”把伪军全部遣走了。

杨芷江看了这一情景,他的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他对邹韬奋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概,由衷地表示钦

佩!

两天以后,邹韬奋转移到阜宁东南、盐城东北的合德,即射阳县。他在射阳县度过了1943年农历春节。

战争和病情使得邹韬奋不能自己。三师派人护送邹韬奋到大丰县斗龙港附近戴伯韬所在连队。邹韬奋对戴伯韬说:“在师部,首长对我很优待,很照顾。就是我的耳病加重了,痛得难以忍受。”邹韬奋比以前消瘦多了。前次耳部疼痛,只呻吟几声还能强忍过去,这一回疼痛难支,他在铺上打滚,有时还要痛叫几声。在战争动乱中医药条件极端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找到一点鸦片,给他吞服下去,能起一点镇痛作用,使他可以睡一会儿。

苏北人民反“扫荡”胜利的消息传来了。邹韬奋是多么兴奋啊!

他会见新华社记者并发表谈话,说:“我到根据地来是我平生最兴奋的事情。在这里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忠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根据地内的人民普遍参与政治生活,热烈拥护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他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希望病体复原后到延安去,参加整风学习,迫切需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改造自己。

在射阳,他还抱病参加了地方绅士和工商界头面人物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地点在华成公司。席间,这些绅士和工商界人士向邹韬奋讲述了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怎样为支援新四军反击敌人的“扫荡”而出力的。邹韬奋看到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的显著成效,深深为之感动。

他曾经向朋友谈起,他要把在苏北根据地所见所闻全部写出来,特别要把苏北人民反“扫荡”的业绩写出来。1943年3月19日阿英《敌后日记》有记:“闻韬奋同志将以五十万字,记此番扫荡。”可惜的是病魔夺去了他从事写作的机会,人们无法再看到他的作品了。

告别斗龙港

1943年3月19日阿英《敌后日记》还写道:“据杨帆同志言,盐东已在扫荡,韬奋同志已由彼以5000元代价,为雇一专船,往三分区去。”

邹韬奋通过三分区返回上海。

三师戴伯韬连队队部在斗龙港畔斗龙渡以北沟子

头。戴伯韬对邹韬奋从海道返回上海作了精心的安排。一位姓胡的女同志考虑到轮船行驶的振动很大,可能会增加病人的痛苦,特地为邹韬奋悬挂了一张吊床。

在告别斗龙港之前,邹韬奋抓紧时间,再次致函新四军军长陈毅,他在长信中赞扬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说:“今天我真正的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了生死之交,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用这样强大的兵力‘扫荡’,可是共产党新四军和所有的地主资本家团结一致,互相保证,坚持不屈,最后取得胜利,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功。”他向陈毅表示,返沪治愈耳疾以后,再重返苏北去延安,以实现自己的宿愿。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邹韬奋就要启航了。他握着戴伯韬的手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我所憧憬着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根据地啊!我本来想到延安好好地学习,哪知事与愿违,……”说到这里,他眼眶里满蓄泪水,他停顿一会儿,继续说:“……因病受到阻碍!我希望病快快好,好了我立刻就回来!”

邹韬奋和新四军三师的护送人员上了船。机轮离港了。邹韬奋虽躺在床上,还支撑双臂,抬起身子,目视着正在消逝的村庄,很久很久,他才躺下来,闭上含泪的双眼。

航程中途,到了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邹韬奋还特地拜会了粟裕司令员。粟裕劝慰邹韬奋安心治病,病愈再来。

海浪使机轮颠簸不停,邹韬奋的头部疼痛更加厉害,但他都强忍着。

大约3月中下旬,他到达上海。

难忘的印象

从1942年11月上旬到1943年3月中旬,邹韬奋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经历了4个多月不平凡的时光,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在1943年10月23日《对国事的呼吁》的绝笔之作中,还谈到这一点,他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对于邹韬奋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43年7月,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有一节专门提到邹韬奋,称他的意见是“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这是我们研究和学习邹韬奋的重要历史文献材料,特摘录如下:

……在军民联合打击之下,“清乡怕不清,扫荡白费心。”此为敌占区人民之民谣,实为对敌寇扫荡之正确结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此为华中人民要求参军前线之歌谣。盐阜区士绅慰军大会,其传单有云:“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国民党书记某君云:“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淮海士绅见农抗会领导之民兵活动,使敌不敢下乡滋扰,盐阜区士绅见民兵作战得力,土匪乘机窃发,为民兵削平,交口称誉“党政方面有远见”,并谓“始知减租减息扶助工农政策为抗战建国之大端。共产党能担负艰巨,又能让人民同享其成,乃知我等以前之不满,属于浅见”云云。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适来华中,亲见反扫荡军民合作情况,指出“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谰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古人云,止谤莫如不辟,止毁莫如自修。本军素以此义自励。但上述人民之言论,固系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

陈毅的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苏北人民反“扫荡”斗争和认识邹韬奋的思想变化,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邹韬奋不幸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

徐伯昕带着邹韬奋的《遗嘱》专程到苏北报丧,并向华中局汇报善后工作情况。噩耗传来,军民震惊。8月18日在新四军军部召开追悼会,张云逸代军长致悼词,范长江、钱俊瑞、于毅夫、徐雪寒等含泪演讲。邹韬奋的长子邹嘉骅代表家属致答辞。他泣不成声,悲痛地说:“我一定要继续走我父亲的道路,和敌人及一切恶势力战斗到底!”

9月28日,党中央接受邹韬奋临终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0月30日,江苏泰兴县各中学师生在倪浒庄联合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11月1日,盐阜区文化界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苏北军民缅怀邹韬奋!

陈毅同志说:“韬奋先生是由民主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的业绩,对于每个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很好的教育。”

(责任编辑 王恂)

忆周扬同志二三事

○露菲



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刘澜涛同志与周扬同志(右)交谈。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年7月31日，周扬同志逝世已经5周年了。这5年，祖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经济繁荣，文艺新人新作倍增。如果周扬同志还在，他该有多么高兴。

想起5年前，周扬同志去世的那些日子，历历在目。那天，我们接到周扬同志病危通知后，赶到北京医院，他虽然静卧在病床上，但是，他被白床单蒙盖着，已经远去了。我们悲从心来，在他床前默立良久。

不一会儿，李瑞环、温家宝、丁关根同志来了，他们默哀后，问家属有什么要求。当时周扬夫人苏灵扬重病住在友谊医院，只有周扬的女儿周密在场。周密怀着巨大的悲痛，什么要求也没提，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周扬同志带走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也给人们留下了绵长的深思。

周扬同志一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两袖清风。他的贡献和他的历史作用不是我这篇小文章所能概括的。我只能记二、三事来表达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怀念。

讲到周扬，免不了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迫害和折磨。“文革”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周扬的灾难。他最早被揪出来批判，并戴上了“文艺黑帮头目”、“三十年代祖师爷”、“反对鲁迅”等大帽子，说他是“牛鬼蛇神的大黑伞”，“阎王殿里的活阎王”。口诛笔伐的“罪状”，是集中在他反对鲁迅方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多少也夹杂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周扬进行批判斗争，口号喊得震天响，全国各报刊、广播的大批判文章和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攻来。当时周扬因刚动过大手术，在天津养病。国家主席刘少奇要他好好养病，病好了再作检讨。这一充满了党性原则的指示，

后来竟成了刘少奇包庇周扬的一大“罪状”。不久，周扬被押回北京批斗，一个“喷气式”，使他虚弱的身体在隆冬也大汗淋漓。好在当时的中宣部是陶铸兼任部长，他主持的斗争会，也比较文明，没有武斗发生。当然，批斗的“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鲁迅”。

周扬在批斗会上说，他从来没有反对过鲁迅，也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三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海，由于作党的地下工作的缘故，接近鲁迅不够，对他的一些意见尊重不够。为此，他在巡回的批斗会上，在专案组的审问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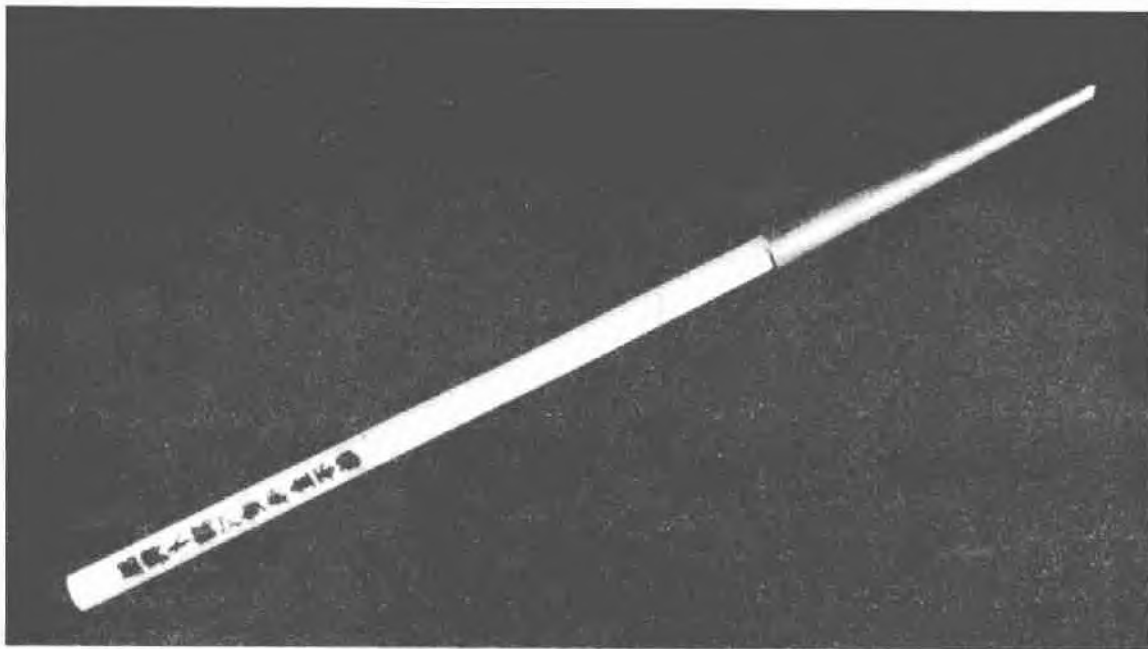
周扬九死一生度过了“文革”时期。当他复出工作后，专程去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那是1979年12月。当时周扬已过古稀之年，从杭州出发，乘车到了绍兴，不顾休息，马上参观。在鲁迅的故居里，他扶着狭窄的楼梯走上走下，观看了鲁迅的卧室、书房，又参观了鲁迅母亲的起居间和鲁迅家的厨房。他在鲁迅描写的“百草园”里，驻步在残留的矮墙前，听着讲解员的讲解。最后他到了三味书屋，深情地抚摸着童年鲁迅在书桌上刻下的“早”字……。他走过每个地方，不像是参观，而是在阅读一本巨著。每个场所，每件物品，都引起他极大兴味。有时，他也讲一两句话，说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与鲁迅晤面的情形。话不多，但看出，他是如何怀念和崇敬这位文化伟人的。

周扬参观故居后，又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参观完后，博物馆的负责人要求周扬与博物馆的人合影



鲁迅先生像(摄于1930年)

鲁迅用过的毛笔“全不换”。他说：“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



留念，并请他讲话。周扬在大厅里坐在大家之中，说：“林彪、‘四人帮’把什么都搞颠倒了，他们搞了十年的颠倒宣传，不可低估他们的影响。三十年代，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人，只晓得革命，有热情有勇气，但不懂革命策略。鲁迅先生对旧社会了解很深，对敌人了解也透，他思考周密、正确。当时我们对他的一些意见听取不够，尊重不够，这是我们的缺点。我们是他的一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年轻战友。我们一直是在鲁迅的旗帜下战斗的。”

这时桌子上已经铺好了纸，研好了墨，要周扬题词。周扬说他的字写得不好，但他没有推辞，提笔写下了四句：

横眉俯首，
百代宗师，
高山仰之，
心向往之。

周扬写完，放下笔讲解道：“横眉、俯首，这是鲁迅先生的两大特点。对反动统治、对敌人横眉冷对，对人民、对同志团结友爱，爱憎分明。百代宗师，就是说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老师，他的战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高山仰之，我虽然达不到他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心向往之。”周扬的话里渗透着谦虚和对鲁迅先生的高度敬仰。

周扬一向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解剖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鲁迅无愧是文化新军的主将。”周扬多次讲过：“我不因为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自己年轻而原谅自己的过错。”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到北京居住。一次周扬去看望她。她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路面坑坑洼洼。周扬想，许先生年纪较大，小胡同窄，汽车开不进，路又这么不平，万一摔一跤怎么办？后来他向在国务院担任秘书长的齐燕铭说起这件事，并建议改善许广平的居住条件，后来许广平先生搬到了环境幽美的护城河畔。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周扬和许广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后来因“文革”中断。粉碎“四人帮”后，虽然许广平已经逝世，然而，鲁迅之子周海婴和周扬的来往又延续下来。从这件事情上，不也可以窥见一斑吗？

“文革”中，江青一伙捏造周扬等“反对鲁迅”，是为了打倒周扬夺取文权，从而树立江青“旗手”形象，进而篡夺党政大权。现在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周扬冤案也得到了平反。

新中国成立时，周扬是文化部第一任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他也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就在百忙的工作中，周扬仍然关心作家们的创作，从不拒绝他们的合理要求。有位年轻作家，拿着稿子到周扬的办公室念给他听，为的是听取他的意见。有的电影导演，一大早就堵着门来汇报在拍摄影片中的有争议的问题。也有不知名的年轻人，为了工作、为了学习请求帮助的。周扬都尽可能地抽出时间亲自接谈。他常说，这些人都是鼓了很大勇气才来的，不能让他们失望。外省有个小女学生寄来了一张她自己的照片，她希望毛主席在她的照片上签个名，要求周扬帮助。就连这件事，周扬也帮助作了。

五十年代初期，上下级关系融洽、平等、民主。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温暖。但是后来一次运动接着一次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使得上下之间、同志之间有了戒心，加大了距离。这些运动，都不是周扬的“发明”，但处在他的位置是非执行不可的。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也反思了“文革”前十七年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对于在运动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他都诚恳检讨自己，并向对方道歉。他说过，不能因为自己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就原谅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他也不是消极地接受“文革”的教训，而是依然如故地关心作家创作，为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而呕心沥血地工作着。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出现，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文革”前，他因支持小说《刘志丹》曾受过批评，并向毛主席作过检讨。那时《刘志丹》样书刚出，他就读了，读完后觉得小说写得好。书中写的是刘志丹等革命前辈，开创陕北根据地并坚持斗争的一些事迹，不可避免地就牵扯到高岗，高岗当时也是国家领导者之一（后来高岗犯了错误，自杀）。周扬在与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是历史嘛！其实小说中并没有出现高岗的名字，只有一两个党的领导形象。谁知在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最高指示——“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这样一个批示犹如晴天霹雳。周扬为了使小说作者李建彤有思想准备，忙约她谈话，说中央、毛主席批评了，要正确对待。

李建彤说，她是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不是反党。刘志丹是烈士，他牺牲在战场上。

为了这部小说，李建彤大姐受到批判，被“四人帮”关在地下室达数年之久。周扬虽在当时就向毛主席作了检讨，但在“文革”中又为此多次被揪斗，吃尽了苦头。直到“文革”结束，李建彤大姐冤案得到平反，这部

小说的上半部才得以出版。后来有人说,这个“最高指示”是出自康生之手,究竟出自谁手?还有待查证。

周扬并不因为支持好的作品而受到批判就从此消极。在他复出后,他特别关注年轻作家的成长。他读过不少作家的作品,他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沙汀用通信方式作了评论。他称赞王蒙的《布礼》、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湛容的《人到中年》、茹志娟的《草原上的小路》等小说写得好,《东流水》人物的描写,使他笑了好大一阵。在拨乱反正的那些日子里,上海沙叶新写了《假若我是真的》一剧上演后,在戏剧界乃至文艺界掀起了一阵波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扬看了录相,他怕挫伤了作者的创作热情,提出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作品。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召开了戏剧创作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这是个成功的会。为了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周扬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听取年轻作家的意见。有一次,他们的交谈时间,从吃过晚饭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结束。地点是在崇文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大家挤在一起,有坐有站,每位同志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们抨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痛斥官僚主义的恶习,也讲创作中的喜悦和烦恼。他们敞开心扉无所不谈,这种讨论问题的热烈场面过去是很少看到的。

周扬用心听着,不时插一两句话。他鼓励作家敢于创新,他说年轻人思想敏锐,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有切肤之痛,不置身事外,也不冷眼旁观,而要揭露它克服它,这是好的,也是对的。如果作家没有了这种责任感和热情,就创作不出受欢迎的作品。但是,只有热情还不够,他希望作家站在人民之中来看待这些现象,并和人民一道来克服它。他说,对有争议的作品要正确对待,经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这才是个好办法。他提出“至于作家是否采纳,则完全有自由。对文艺创作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作者自己也不能强制自己。”作品不是打补丁,应该是天衣无缝才好。因为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贯串着整个的思想感情,整个的心血。”

周扬懂得创作规律,了解作者创作中的甘苦。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对年轻作家们的循循善诱,平等的朋友般的交谈,不能不令人感动。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年轻作家的创作,培育年轻人的成长。他多次讲过,艺术家要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他提出“科学无禁区”的口号,也是鼓励艺术家敢于探索,敢于创新。而他自己虽然年老,也仍在探索不息……

有人曾问过周扬,在“文革”前你那么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而在“文革”中,你却受到那么大的迫

周扬同志(左)与苏奥扬同志在长城留影。



害,批斗、关押、挨打致残,可是你出来后,还是这么积极地工作,你是怎么想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怨恨吗?

周扬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夺权,自然要对真正的革命者进行迫害,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说,毛主席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他仍然是个伟大的人物。他所以能在“文革”中支撑过来,也是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些话,给了他力量。他说那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和他谈到一个人受委屈时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毛主席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末真理在你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觉到有什么委屈。

周扬说,他就是用这些话来鼓励自己,使自己度过了十年浩劫。

周扬同志去世5年了。他的五卷本文集,历时十几年,今年才出齐。他虽然没有看到他的文集出版,但他毕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丰厚的著述。现在读着他的文章,就觉得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并正在娓娓地向我们讲述着他的所思所想……

(责任编辑 方实)

中国何以并存两个

“世界第八奇迹”

○刘永国

常读报的人可能已经发现，现在的中国竟有两个“世界第八奇迹”：一个是出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编钟，一个是出土于陕西临潼的秦兵马俑。

有人问，这两个“第八奇迹”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非？我看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弄清这两个“第八”的缘起。

曾侯乙编钟出土于1978年春夏。此前，人们只是见到过古人作为观赏品的小型编钟，最多的一套也不过是长不盈尺的5件。而曾侯乙编钟一套就达65件，其中最大的钟体有大半个人高，65件排列有序，宏伟壮观，总重5吨多。而且曾侯乙编钟除1件镈钟外，每件都能发出2个乐音，64件组成一个系列，具有完整的7声音阶和12个半音，达到5个8度，埋藏地下2400余年，至今仍可演奏中外乐曲。

曾侯乙编钟的出现，使得世界音乐史、冶炼史和铸造史的某些章节，都需忙不迭地改写。因为在这以前，西方总以为中国音乐7声音阶的出现比希腊晚，并由此武断地认为中国的7声音阶为西方的“舶来品”。现在，曾侯乙编钟的旋宫转调把西方对华夏古老音乐的藐视一扫而光了。

曾侯乙编钟在音乐史、冶炼史、铸造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它在文物殿堂的地位及其在海内外的影响。曾侯乙编钟出土后，海内外传媒争相报道。纽约大学E·G麦克伦教授在美国有影响的《社会生物

工程》上撰文称：“曾侯乙编钟是古代世界第八奇迹”，此说一出，国内外传媒提到曾侯乙编钟，常冠以“世界第八奇迹”的称誉，包括颇具权威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早于曾侯乙编钟问世的大批秦兵马俑，也曾引起中外舆论的轰动。秦兵马俑造型之生动，规模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秦兵马俑无论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方面看，还是从军事和政治方面看‘充分反映了秦社会的风貌，不愧为秦文化史的“活教科书”。无独有偶，首先把秦兵马俑称之为“第八奇迹”的恰恰也是外国人。1978年9月，法国当时的总理希拉克参观临潼兵马俑后留言称：“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奇迹了。”

把曾侯乙编钟和秦兵马俑称为“第八奇迹”，国内传播媒介也都“认帐”，甚至同一传播媒介既说过这个是“第八奇迹”，也说过那个是“第八奇迹”。看似自相矛盾，实则并非如此。我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中华文明史上特定文物“座次”的并列现象。它是特定文物自身价值的反映，是舆论评价的结果，不是官方的裁定（官方似也难以裁定）。既然已经“两个第八”并存，我看就不必在二者之间作艰难的选择，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它们的并列。这大约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一种结果。

（责任编辑 洛松）

○吴晓梅



电视片《毛泽东》诞生记

1993年岁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百岁诞辰时，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武警总队政治部等单位合拍的12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正式播出。人们说，这个片子感人，每看一遍就想掉泪。专家说，片子跳出了以往编年史的框框，把历史的真实与时代的真实很好地契合起来，用电视艺术手段展示了表现历史、表现人物的新天地。

那么，这部电视片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毛家湾 文献研究室“触电”

1992年岁末的一天，两位来自沈阳的客人下了火车，便直奔位于北京前毛家湾胡同一号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商谈合作拍摄一部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电视片。毛泽东研究组负责人因本身任务繁重，有些踌躇，报文献室领导商量后，决定尝试着干一回直接面向亿万群众的“触电”事业。组内陈晋、张民和我被指派参加撰稿。

1993年新年刚过就投入工作。一个星期过后，10集创作提纲先后交出。

我们没有走编年史的老路，采用了“橘瓣”式结构——从不同侧面表现毛泽东最辉煌、最独特、最动人之处，勾勒毛泽东的整个一生。我们以为，直到今天还吸引老百姓的，首先是毛泽东身上那种非凡的人格魅力，而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编辑研究工作中时时强烈感受到的：他历经坎坷斗志弥坚的顽强意志；他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的求真务实品格；他登高而呼挥手之间便改变历史走向的博大气魄；他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更为人民服务的拳拳之心；他吟诗赋词之中的浪漫洒脱与浮想联翩的情怀；还有他晚年拖着老病之身，在摄影机前推开扶他的护士，非要自己与外宾握手告别不可的独立傲骨；他甚至时常流露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真的笑容……有了这些，他便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伟人，老百姓才能爱戴、怀念和传诵他。

4月上旬，脚本初稿几经修改，基本完成。但是我

们心里并不轻松，特别是怎么表现老人家的晚年岁月？怎么反映“文革”这段独特的历史？使它既合乎党的决议精神，又符合电视特性，同时又能让老百姓理解、接受？

我们商定，把“文革”十年的历史推到背景上，突出毛泽东在英雄暮年的岁月里对中国前途和接班人的忧虑，突出他与疾病、衰老的抗争，以及在这种抗争中所表现的乐观、自信，表现他对生命的本质认识。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些细节：

——1971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平生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摄影记者只抓拍到了唯一一张他与林彪同时在座的照片。因为林彪当时只坐了几分钟便突然不辞而别。3个月后，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林彪叛逃死在温都尔汗……这使毛

泽东急剧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他对西哈努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十大”会上，一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也是在“十大”时，毛泽东抱病坐在闭幕式的主席台上，最后竟站不起来了，是请代表们退场后他才离席的。

——毛泽东后来对“四人帮”产生了不满，把目光转向了曾经被打倒的人，特别是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难得人才邓小平。1973年12月，他又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办事果断，柔里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就在这年4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晚会上突然重新出现。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这些安排，对他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左三为陈毅夫人张茜。



后的未来中国,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1974年的一天,毛泽东就一个既属于科学领域,也可以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问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对称何以那么重要?并感慨地说:非常遗憾,没有时间去研究科学了……

这个脚本,是与最初提议这一创作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和沈阳军区政治部影视艺术中心的同志合作完成的。合拍单位也物色好了编导人员,准备进入拍摄阶段。

就在1993年4月12日,中央广播影视部第238号函放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的办公桌上。里面说,电视片《毛泽东》是一个重大题材,必将引起全社会和 international 人士的关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确保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和艺术质量,此片应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完成。

聚香山 电视“国家队”开锣

逢先知主任收到广电部来函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军事部主任、新成立的《毛泽东》摄制组总编导刘效礼、执行总编导汪恒等七位编导和武警总队政治部、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合拍单位有关人员,还请来了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身边一些工作人员,

我们被通知去听会。据通报,国内外已有多家在筹拍毛泽东影视作品。国外,有日本的NHK,英国的BBC早已在年初开机。国内,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区电视台也纷纷上马。在这个开始崇尚竞争的年代,出奇才能制胜。该怎么去拍《毛泽东》呢?我们已进行的工作及脚本初稿,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央电视台这个会,从4月26日一直开到“五一”节后,会开得很热烈,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台决定合作。征得了辽宁方面的同意,我们拿出了与他们合作的10集脚本。各位编导当即研究了脚本,提出增加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一集,增加反映毛泽东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一集。这样,由此定下了这部电视片的12集的框架。

5月2日一早,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赶到香山来听取汇报。会上的热烈气氛感染着他,他说,毛泽东一百周年的宣传是一个世界性主题,是今年全台的一个重要宣传计划,不仅中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的时机非常重要,创作难度大,但有这么一些权威单位参加,如同一支国家队,应该取得政治上和艺术上的成功。他表示,台里已经决定把这个片子安排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间里播出。

被杨伟光台长称作“国家队”的《毛泽东》摄制组,就这样在香山会议上正式成立了。这立即引起外界关注,港澳台报纸也纷纷披露这一重要信息。这时,主创人员



都已到位,开始进入实质性工作状态。

这时,离播出时间仅仅只有8个月了。要完成这部总长度约600分钟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各项工作:修改脚本并写出拍摄提纲;大量的采访和外地实景拍摄;后期剪辑、合成及解说词的写作,直到通过审查,真是任重道远又“军”情紧迫。

飞神笔 外国政要论伟人

香山会议后,摄制组住进北京空军466医院闲置的病房着手工作。

这时,忽得信息,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定于5月12日在上海开幕,将有许多外国前政界要人和名人到会。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毛泽东在世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当政,有的还不只一次见过毛泽东。他们如何看待中国这位领袖人物呢?如果能完成对他们的采访,无疑会使我们这部片子站得更高,视野更开阔。不花一个美元,就能采访到外国要人,难怪编导们连呼此乃“天

意”。

这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前后只开了4天,日程很满,记者采访只限于中央级新闻单位几个名额。摄制组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份这次国际会议的参会人员名单,根据这份名单,我们分头翻阅了从1950年到1976年的有关档案,找出背景资料。比如:这些外国前领导人见过几次毛泽东?哪一年见的?主要谈过些什么?有什么人在场?会面时有哪些重要细节?再据此拟出采访提纲。

这里不妨引出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一段访谈录:

记者:我们注意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其中说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请问您今天还是这样认识吗?

特鲁多:是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泽东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记者:1973年您与毛泽东会见时,曾送给他一枚银制白求恩像章,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礼物呢?



1973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加拿大总理皮尔逊时,曾送给他一枚银制白求恩像章。



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摄制组按矿里要求，穿好工作服，准备从总平巷口下到300米深的作业面拍摄。当年，毛泽东就是从这个巷口下井的。

特鲁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视作一个献身于一种事业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典范，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成了忠诚于自己正义事业的楷模。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论述白求恩的文章，连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求恩医生这个人。所以，可以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联接两国人民的桥梁。

记者：1973年的那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毛泽东当时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特鲁多：毛泽东很健谈，谈话的口气很庄重。当时他谈了很多中国和世界的的问题。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我们一起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必要性，我对他说我正是为此访华的。我们还谈到近东问题，那时这一地区和现在一样存在着潜在的战争，毛则谈了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些看法。他是一个很庄重、审慎，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在上海，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采访也有收获。这位先后5次见过毛泽东的外交老手，用“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这样的话来评价毛泽东。

根据我们的提示，基辛格还回忆、证实了一个有趣的细节：1976年基辛格偕夫人访华，毛泽东一见基辛格他们就发现基辛格夫人比基辛格几乎高出一头！他诙谐地问基辛格：你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然后，毛泽东习惯地用手那么一比划，道：压倒她！在影片

资料中，这段对话虽然没有声音，动作表情却鲜明生动。它出色地反映了一个伟人的幽默、睿智的性格，也给观众留下了难忘印象。

小分队在上海用不到4天的时间，采访了17位外国要人，近参加会议者的半数。

除了采访提纲上开列的人名，摄制小分队还见缝插针，访问了计划外的要人。5月15日晚，有个不起眼的瘦小老头正心神不定地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溜达，翻译小分队得知他是匈牙利前总理福克·耶诺，才知他正为没赶上游览黄浦江的汽车而懊丧。摄制小组抓住这个机会访问了他，他尽兴地大谈了一通毛泽东：

“在1957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我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在一起度过了几分钟。他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对他的印象更深了。他说，匈牙利1956年发生的事是好事。我对他的说法当时感到很诧异，我问毛泽东，您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好事？他解释得很好，很英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之所以是好事，因为你们肯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错误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全世界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吸取了教训，这不是变成了好事吗？一个小国发生的事，别的国家就不要再发生了。这是令人惊讶的见解。他还说：你们咒骂斯大林，咒骂他的罪行，全盘否定

斯大林。不要骂嘛！因为他有坏的建议，但也有好的建议。而你们的领导人什么都听，唯命是从，像奴仆一样，斯大林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斯大林提的是建议，而你们则当作圣旨接受。斯大林给中国，给我个人也提了许多建议。我们告诉他，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与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商量以后再定。斯大林好的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摒弃了。我理解毛泽东讲的话。”

在摄制小分队出击上海期间，留京人员写出了脚本第二稿，对原有素材进行了重新组合排列。12集拍摄提纲虽只有数千字，却是在20多万字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

洒热汗 红土地觅迹寻踪

6月18日起，各摄制小组先后出发。

第一摄制小组到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到过的江西兴国。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兴国县城，住在濂江书院文昌宫。他调查了兴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和历史情况，据此制定出兴国县《土地法》；为贯彻《土地法》，又在濂江书院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从这里走出去的泥腿子们把兴国大地闹得轰轰烈烈。怎样通过今天的兴国来反映历史，进而通过历史凸现毛泽东求真务实的精神？摄制组找到了切入点，通过画面展现毛泽东旧居濂江书院正在举办的兴国籍将军生平事迹展览，从而告诉人们：兴国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将军县，所以能在1929年到1934年竟有58000多人当红军，不就是土地斗争的成果吗？当老人们讲起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当红军时；当谢培兰大娘讲起妇女送老公参加红军，唱起“当兵就要当红军”的兴国民歌时；当兴国烈士陵园墙上23179名烈士人数赫然在目时，人们感受到的，不正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吗？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深刻了解，使他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脉搏，使土地革命结出了胜利的硕果。兴国的内容在拍摄提纲中只一带而过，而经过实地拍摄，后来通过剪辑，却成了《艰难的探索》一集中前半部分的重头段落。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样令人折服。他是中国文化的扬弃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千年学府、文人荟萃的岳麓书院一段，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1917年和1919年毛泽东曾住在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和院训学规等的介绍，以及延安中央党校门口“实事求是”题额的影片资料，生动而深刻地体现

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

外拍时正值盛夏。3个月的时间，摄制组追随着毛泽东的足迹，翻山越岭，走遍大半个中国。平均三五天就走完一个地方，拍完一个题材。每到一处，卸下摄影器材和行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当地党史办有关人员座谈，了解本地情况及有关毛泽东的事迹，丰富深化拍摄提纲，寻找最佳切入点，沟通现实与历史，挖掘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寻觅至今犹存的旧地旧貌。毛泽东在福建上杭苏家坡养病的山洞，《寻乌调查》里提到的胡东林的木工房，金牛大山下的牛牯扑村，宁都县小源村宁都会议旧地……几乎都原样首次出现在荧屏上，使观众真切感受了历史的轨迹和毛泽东的道路。

这样偏僻的地方，大多不通车。江西省永新县塘边村，1928年毛泽东同新婚妻子贺子珍下井冈山时曾经住过，在此也搞过调查。摄制组前往塘边村拍摄时，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就没法走了。据说距塘边村还有七八里路。摄制组人员只得扛上摄影器材，弃车步行。时值盛夏中午，烈日当头，红色的土地热得烫脚。翻过几道山还不见塘边村。问一位老表，他说不远了，也就七八里路！可我们觉得已走了七八公里都不止了。

进塘边村已是下午3点多钟。摄制组的到来让村民们兴奋不已。村支书徐五娇带我们穿行在基本还是二十年代老样子的村里，神情激动地走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住过的那间老屋前。老屋深匿在狭窄的巷道里，和普通南方的农舍别无二致。青砖砌墙，刷上的白灰剥落殆尽，门框上方挂着早已脱漆的匾额，上书“毛泽东旧居”。屋子里外三间，已无任何家具。绕过屋后有一眼井，像一米见方的水塘，蹲下就能掬到甘甜的泉水。这井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帮老表挖的。半个世纪的风雨过去，它依旧清澈如初。直到今天，塘边村村民还在用这口井。担水的人来来往往，井边的树荫下坐着聊天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老表们很热情地舀了水让我们喝，那水真是格外的清凉甜爽。

拍完塘边村，出村已是下午6点多钟。只是塘边村这些珍贵镜头没有编进完成片里。像这样千辛万苦拍到却没用上的素材很多。摄制组的前期拍摄时间虽短，收获甚丰，仅第一摄制组外拍3个月就拍了6000多分钟资料，而这一组四集播出带总长度才200分钟，也就是说，播出片的每一分钟后面，都付出了数十倍的努力与辛苦。

献巨片 薄一波一锤定音

9月23日，摄制组在延安完成最后一场外拍，返京后

开始后制作。已决定片子在12月13日晚20:10分播出。在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摄制组要完成播出前的全部工作。分别设在中央电视台和梅地亚新闻中心的三个机房已无法满足需要,杨伟光台长特批增加一个。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面包饼干和盒饭是每日伙食。晚上加班,累了就合衣倒在堆满素材的行军床上,醒来就赶紧上机。编导们个个衣冠不整,胡子拉茬,头发又乱又长。大家见面,互相戏说要把对方送到疯人院去。

11月中旬开始送审样片。总编导们悬着心,前往中南海薄一波同志住处,请这位本片的总顾问审看并向他汇报情况。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以及毛泽东研究组的四位负责同志,也都投入了全片的审查把关和修改定稿工作。经常是那边在审一集,这边编辑机上改一集,改完直送审片室。审片人员从每集的史实、结构到字幕上的错别字,都认真校正。

11月底,薄一波同志亲自到中央电视台,指名只看表现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集,看后他给予了肯定。这使

大家十分高兴。逢先知主任也说,他最担心的这一集可以放心了。

有几集最后修改并通过审查时,已是1993年12月10日,距开播只剩了几十个小时。按照规定,播出带应在播出前24小时入库校检。但这一次非同寻常。往往晚上就要播出了,下午还在机上润色加工,直到傍晚才送往播出线。哪个小组的片子顺利播出了,播完了,哪个小组的人才踏实地去睡上一觉。

片子一经播出,就交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专家们去评说了。不管我们是否为它激动过、争论过、自豪过,还是遗憾过。

只是我们会经常想到2093年。那时,摄制组所有人员都已作古,但毛泽东的名字不会湮没。那时,将会有人再去拍一部毛泽东。我们今天无法知道未来的编导和摄制人员是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现在拍的这部《毛泽东》以及数百盘未用上的素材带,特别是我们力求如实反映的这位伟人的思想及其业绩,会是当代人留给后代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历史财富。

(责任编辑 卢弘)



中国是她感情寄托的所在

——记著名英籍作家 韩素音

○叶君健



韩素音是一位英语作家。她的作品最初都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然后通过英文被转译为许多其他文字的版本。这些版本现在很难统计。我曾多次在原南斯拉夫一个比较小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作客——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山村》在那里出版。它的人口只有两百万,但已经出版了多种韩素音作品的译本。那里的作家无不知道她的名字,也知道她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她的几部传记,如《凋残的树》、《没有鸟的夏天》等,写的都是有关中国的事;她在中国所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以及中国在解放以前的变乱。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国家,距中国那么遥远,居然有不少人喜爱读她写的有关中国的书,这也说明她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除了欣赏她的文笔外,还喜爱她这个人——直率、诚恳、热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真挚的爱。

她的第一部作品名叫《终点:重庆》,写的是抗战时期的事和她个人在那个时期的生活经历。这部作品是四十年代初在英国出版的。它立刻得到了好评,英国书会还特别把它列为“推荐书”。它的内容虽属“纪实”性质,但文艺性强,具有欣赏价值。“书会”的主要评议员之一、英国著名老作家普利斯特莱有一次对我说:“她(韩素音)是那么可爱和迷人,但她的生活却充满了坎坷!”她的坎坷要从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说起。

她是四川郫县人,因为她的父亲在那里出生——她现在每次来中国时,总要找机会到那里去看望她的家族。这说明她的乡土观念很深,也意味着她是在中国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她的父亲是早期赴欧洲的留学生之一。他留学的国家是比利时,学习铁路工程。就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比利时女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排除了宗教、习俗和种族的偏见,毅然结了婚,而且后来一同回到中国。这个青年归国留学生,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中国铁路上任工程师,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离开人世。韩素音在中国出生,在中国成长,也在中国受教育,一直升到燕京大学。后来她得到比利时一个大学的公费。她步父亲的后尘,在她母亲的祖国成为一名中国留学生。

可以想象,她在那里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外祖父母及其家属都对她很亲热。她的同学也把她当自己人看待。她交了许多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比利时青年与她发生了爱情。美好的未来在向她招手。但是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而且步步进逼,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国内的学生已经无法安心读书,纷纷起来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消息传到比利时,韩素音也安心不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虽然是句古话,但韩素音的内心也开始产生了类似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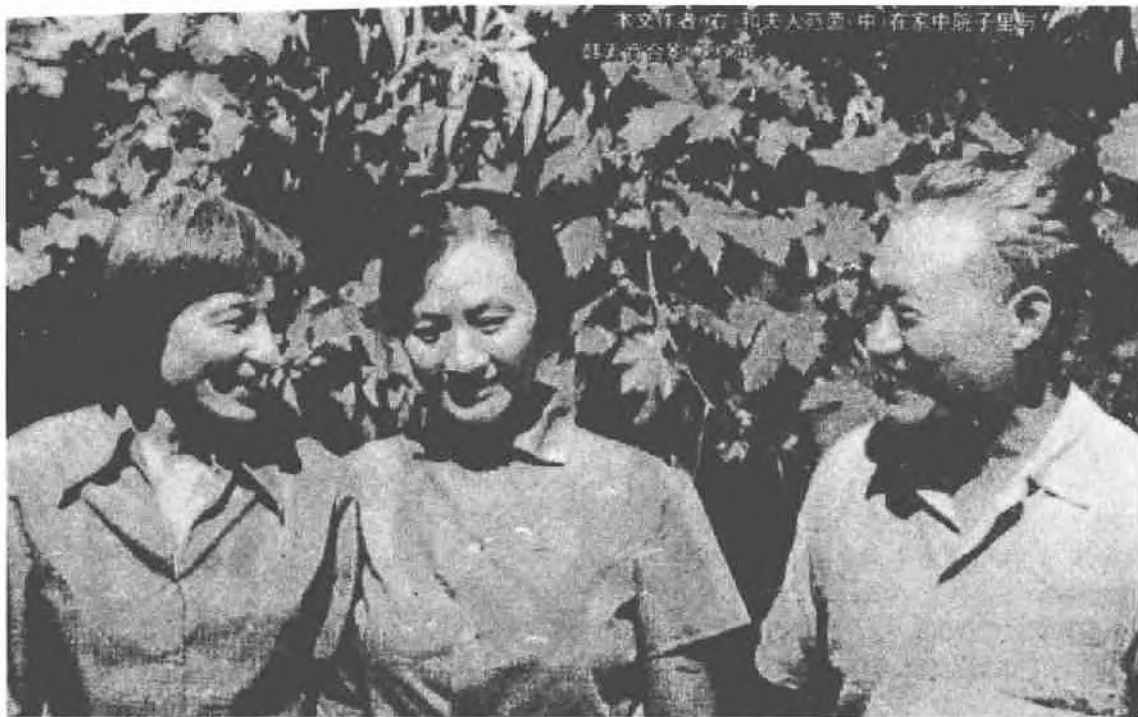
她怎能在和平安静的比利时读书,忘记了国内同胞的灾难和国家的命运?她待不下去了。她要回国报效。

她骤然离开比利时,这本来是对她心灵的一个严重挑战,特别是因为她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喜爱的男朋友——据说还订了婚。但是归国的热望压倒了她一切个人的考虑。她最后下了决心,毅然回到苦难的中国。她生活的坎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是她做梦也料想不到的事!

在回国的海船上,她遇见了一个“英俊”的中国青年军官——他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他也正准备回国报效。中国正需要有为的年轻军人。他的学历和他满腔的“爱国”言词,迷惑住了这个同样回国报效的女留学生。他的形象和他的谈吐逐渐占据了她的整个的心。他成了她崇拜的英雄——一个将参加祖国抗战的年轻军人!这种崇拜,使她排除了一切其他的感情牵挂。这次海上缓慢航行的结果,是船达到目的地后,她与他结了婚。

这位年轻军人姓黄,是蒋介石特别培养的未来嫡系军官。这是韩素音所不知道的——即使知道,她当时天真的心灵大概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这位未来的“民族英雄”自然投入了抗战工作,韩素音也投入了抗战工作——在医院里当护理员。这时她与丈夫的矛盾开始出现了。黄作为“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蒋介石的信徒,极力要为自己树立“民族英雄”的形象,但夫人却是一个混合种,洋气太重!此外,夫人没有生出为他传宗接代的孩子,这又违背了他具有的封建宗法观念。可是另一方面,夫人的英、法文都讲得漂亮,他的“领袖”靠英、美撑腰,又重视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丢弃这个与西方还有某种血缘关系的人,似乎又可惜。这种矛盾的交织就使韩素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但在这种困境中,她也逐步认识到这位“民族英雄”的品质和她在感情上作出的错误判断,以致陷入苦恼的深渊。而这种苦恼也促使她进一步思考黄所为之卖力的蒋介石政权的实质:贪污腐化,发国难财,鱼肉百姓,迫害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的前途何在?这种考虑进而使她的苦恼升级,也更复杂化。

在韩素音还未能找到走出苦恼的途径之前,黄升了官,被派到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当武官。他自然也要求夫人同去。韩素音怀着疑惧的心理到了伦敦。这时黄的那种封建大男子主义对她的统治,使她更感到难以忍受。此外,英国也正在抗击德国法西斯。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快就受到英国全民抗战和英国式民主气氛的感染,在此同时黄加紧了对她的控制。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就像易卜生的《傀儡之家》里的诺拉一样,毅然私奔出走。她接触到一些英国民主和女权运动的知识界人



士。他们同情她的处境，并且为她打抱不平。他们留她在家里作客，反对黄干涉她的自由。她再也没有回到使馆，也就由此得到了解脱。后来黄被调回国任“要职”，成为在东北与解放军作战的一个指挥官，最后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丧生。韩素音则由英国朋友的帮助，得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助学金，进伦敦大学医学院学医。

韩素音在医学院毕业后，又在伦敦一个医院实习了两年，已经是被正式承认的一个合格医生了。她本可以在英国医院工作或独立开业，但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及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开扩了她的视野，也开始启发了她的思考。她思念中国，想为中国做些事。但“冷战”开始了。西方政治家以及他们的新闻媒体创造出“铁幕”和“竹幕”两个新名词：“铁幕”把苏联和东欧与西方世界隔开，“竹幕”也把中国孤立起来。他们所传播的消息和所制造的舆论又使韩素音迷惑起来。回中国，还是不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不愿在英国工作或居留。最后她作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先回到东方，回到中国人中间。她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新加坡。她在那里开业，履行医生的职务，同时在南洋大学讲课。

但中国解放后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新加坡毕竟还是太远了。于是她迁移到香港来，因为这个城市就在中国大陆的门口，她可以直接听到有关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还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去的人。但在这里另

一件她所未能料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的感情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位知识分子爱上了她，导致她第二次结婚。生活的新变化也激起了她许多对生活的新想象。这些想象，禁锢在她脑海中，总要找机会脱颖而出。文学创作便成了她表露感情的渠道。她开始写小说——这也成了她人生道路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她终于放弃了医学而成为一个作家。她在这个时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美不胜收》(Many Splendoured Thing)。它在英国出版后，立即轰动了读书界，得到了高度好评。好莱坞也把它拍成电影，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这是个爱情故事，里面可能有她自己的身影，但男主角是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采访，最后牺牲。故事结尾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也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控诉；战争摧毁了人间多少美好的事物，而这场战争却是西方强加给朝鲜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积极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她知道得比以前更多了，因此也更怀念中国和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着的亲友。终于她无法约束她对中国的渴望。她要到大陆来亲自体验中国的变化。她不顾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种种歪曲报道和某些朋友的劝阻，毅然穿过“竹幕”，回到她一直渴望见到的大陆来。时间是1956年夏天。解放前在燕京大学任教授的郑振铎，把她作为校友特地在家里设宴接见，由夏衍和我作陪。她又回返到她在中国度过的学生时代。我们天南海北地

魂系故土的旅法画家吕霞光

1993年12月中旬，旅法爱国华侨、著名画家吕霞光先生回国，我在北京欢迎他；20天后，又去首都国际机场欢送他。他敏捷的才思，虚怀若谷的谈吐，温文尔雅、情真意切的为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殷翔云

不料，1994年2月13日，他竟仙逝于巴黎。

吕老生前说过，我一生被分成两大半——一半是在中国，另一半则在法国。然而不管我走到



本文作者和吕霞光先生(右)在一起

聊了许多往事，直到子夜。她不仅恢复了对苦难旧中国的记忆，也获得了有关新中国的知识和灵感。不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对她来说，这是她一生中另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她在她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序言中写道：

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周恩来)受到他周围所有的人真心诚意的爱戴。这并不是因为他总是正确，他像其他人一样也犯过错误。但他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代人受过。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我只说就人格品质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背项。

从此她每年都来中国，有时甚至两次、三次。周恩来的人格感召了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正在建设的新中国感召了她。她暂停了文学创作，而用主要的精力来报道新中国人民的奋斗及其精神面貌。她真心诚意地写中国、中国人民以及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

感受，因而她的这些作品充满了感情和由感情所产生的生动的描述和动人的情节。她的这些纪实性的作品，也成了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随着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国际声誉的提高和中国人民对她的感情的加深，流言蜚语也从各方面接踵而来，说她是新中国的“宣传家”和“传声筒”。好像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中国通”所描绘、或某些逃离中国的“作家”所编造的歪曲中国共产党丑化中国人民的“作品”才是真实的。她毫不动摇，坚持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连续发表了好几部回忆性的传记。这也是与她写新中国分不开的。旧时代的记忆可以帮助她更好地理解今天，珍视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韩素音作为一个英语作家，是西方文学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她在灵魂深处是一个中国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中国也是她感情寄托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她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孙申)

哪里,也不管我在国外住了多久,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

吕霞光先生,1906年6月17日生于安徽省阜阳县吕大寨。

吕先生少年时即酷爱美术,曾考入南京市立美专。1925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做徐悲鸿先生的研究生学习油画,并参加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社团——南国社。1930年24岁,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和吴作人先生首次远渡重洋到巴黎,他一边做工一边学习,竟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奖学金。其间还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在比利时4年,吕霞光的绘画艺术渐趋成熟。1937年吕先生应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邀请,回国任教。1938年出于爱国救亡宏愿,应郭沫若邀请,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三厅美术科科长,美术科的主要任务是画宣传画和写标语,配合抗日宣传。当时,吕霞光与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交情甚笃,还向郭沫若学得对古玩文物的鉴赏学识。1940年,吕先生执教于国立艺专,任西画教授,吕先生的绘画造诣、为人处事都受到师生们的敬仰。1948年吕霞光42岁时,应法国政府文化部邀请,与法籍夫人马德兰女士赴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并几度巡回展出,后留居法国致力于中法文化艺术交流。

1948年11月,吕霞光先生出巨资在巴黎国际艺术城,首次以中国人命名,建立“吕霞光·马德兰画室”,以供中国画家赴法考察、进修和举办个人画展。这是吕霞光先生在法国漫长生活道路上培植的一棵“心花”。谈起“画室”,吕老祥和地说:“这是我为祖国多出有用人才,贡献了一份力量。”1989年9月,吕霞光先生应邀回国,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巴黎吕霞光夫妇画室访问艺术家作品展”的开幕式,这次展览犹如吕霞光先生亲手栽种、辛勤浇灌的法中文化艺术交流之花,正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情,吐蕊开放。

1993年2月,87岁高龄的吕老,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要将收藏的珍贵字画文物及自己的美术作品,捐赠给祖国,并建议在杭州建立一个艺术馆,永久收藏、陈列,以供研究。吕先生真诚地说,我国年事已高,我的捐赠盼望在有生之年尽快办妥。吕先生的爱国之心,受到江主席的高度赞扬。

吕先生捐赠的艺术精品,总计177件。我国首次在



自画像·木板·油画·1931

吕霞光

京展出时,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欢迎。人们从展出中,深切地感受到吕先生对艺术特别是对中华故土的拳拳之心,他的行动及其艺术作品,定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吕霞光先生在北京期间,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曾接见、看望了他,盛赞他的爱国精神,并向他表示亲切慰问。国务委员李铁映出席了吕霞光珍藏艺术品捐赠仪式,并接受了这批捐赠。

吕老先生回法以后,身体状况甚差,一直住院治疗,不幸于2月13日下午4时半病逝于巴黎医院,终年88岁。一生爱国的吕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我国的艺术事业,仍然无比关切并作出竭诚贡献。他的精神和业绩将为国人尤其是艺术界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 吴乃)



法国少女像·素描淡彩·1993 吕霞光

更正

△本刊今年第4期刊登的《省委书记——叛徒——烈士——？》一文，作者署名意乃元，是甘乃伟、邵景元二人的笔名。甘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邵是淮安市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特此更正。

△本刊今年第5期苏渊雷教授的诗，读《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有感，应为七绝。

本刊编辑部 1994·7·10

邮 购 启 事

《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月刊。她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进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为宗旨，歌颂中华历代英杰，展示炎黄文化业绩，回顾民族发展历程，讴歌改革开放大潮，选题广阔深远，内容求真求实，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和收藏价值，创刊两年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本刊现有1993年合订本（总10—21期，精装），每本定价42元，邮费2元，款到发书。欲购者可向杂志社或读者服务部汇款邮购。杂志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802，联系人：朗瑜，电话：6016633转227。读者服务部地址：北京朝外金台西路机械工业学院分部《炎黄春秋》读者服务部，邮编：100026，电话：5071631转514。联系人：李洁清。

本刊1991—1992年合订本已售完，已寄款者，如欲购1993年合订本，可按定价加寄书款。

毛泽东反批『失街亭』

○陈雄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失街亭一节时，写了一段非同凡响的旁批：“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亮初战，宜亲居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毛泽东对街亭之战作出独到的评论，一反历史学家的看法。

魏蜀两军街亭之战并非大战，但在历史上其知名度却很高。这恐怕是由于不论史书、小说、剧本，都刻意着笔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情节，都认为街亭失守全在马谡之过，法当问斩，并且极力赞赏诸葛亮治军严谨。历来史学界，也沿袭这一习惯看法，认为诸葛亮用人不当，不该选派马谡去守街亭。

毛泽东从战争全局着眼，却认为街亭失守，诸葛亮首先应负主要责任，而不应过份归罪下属部将。因为据史载，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兼军师，是第一次率部西征伐魏，其作战目标是夺取魏国西京长安。当时，蜀军占据优势，魏军在长安一线则处于劣势。这可惊动了魏国朝野，魏主曹睿当即从东京洛阳赶赴西京长安，下诏重新起用贬将司马懿，共商抵抗蜀军之计。诸葛亮料定司马懿“必取街亭”，断蜀军“咽喉之路”。于是，立即指派马谡和副手王平率领二万五千精兵，先敌赶到街亭设防，还派几员大将率兵在街亭左右屯驻作为支援。诸葛亮作此判断和部署，无疑是对的。错就错在他没有“亲居街亭”。而且，诸葛亮的指挥部竟然也不设在街亭附近，而设在很远的祁连山中。因而，诸葛亮纵有良谋妙计，也解救不了街亭燃眉之危，终陷入敌人之

手，并导致全局皆输。“慎重初战”，“指挥靠前”，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普遍倚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在街亭之战中，诸葛亮却在作战指导上犯了重大的失误。

与此相反，司马懿在这一点上则比诸葛亮高明得多。他作为魏军防守西京长安主帅，当断定街亭为长安的战略屏障和要冲，就毅然亲自率领大军开赴街亭前线，亲自带“百余骑兵”趁黑夜到前沿察看地形和蜀军布防情况，还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魏军作战，从而一举击败了守城蜀军。

由此看来，街亭失守，并非像前人所云是马谡一人之过，诸葛亮也负有不可推诿的失误。相比之下，马谡是下属部将，诸葛亮则是军师主帅，对街亭失守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其实，诸葛亮斩马谡后，向后主奏表中也承认：“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而后主也的确贬了诸葛亮三级。此后，诸葛亮吸取街亭惨败的教训，每出征都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直到最后病死军中。因而，毛泽东有“后战亮必在军中”之说。可见，他在分析街亭失守的问题时，着重指出诸葛亮犯的严重过失，是符合实际的、客观的、公正的。

其次，毛泽东从大节观人，认为马谡尽管有过，但不须斩头示众。马谡做为战地指挥官，看来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兵力部署不当。他不听从王平的正确意见，把兵力部署在要道之处，而自作主张“屯兵于山上”，以为“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可把魏

兵杀得“片甲不回”。却不知，司马懿率领大军一过要道，就把整个山头包围，对蜀军构成断水断粮之势。结果，蜀军不战自乱，兵败如山倒。二是麻痹轻敌。诸葛亮战前一再告诫马谡，司马懿“非等闲之辈”。马谡却口出狂言，“休道司马懿，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到了街亭，他不细看地形，不侦察敌情，不做应急准备。“骄兵必败”，马谡终于败在老谋深算的司马手下。

不过，从受命防守街亭的全过程来看，马谡虽有两点过失，但他一是主动领命出战，丝毫不讲价钱；二是不畏强敌，不临阵逃脱；三是忠于蜀国，兵败不降魏，收集残部继续杀敌；四是回到汉中，负荆请罪，“自缚跪于帐前”，坦诚承担失街亭的全部责任。这四点宜应视为马谡在街亭防御作战中的“大节”，而上述两点过失当是“小节”、“小故”。

因此，毛泽东明言：“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纵观马谡在街亭之战中的全部表现，很显然他大节尚好，理应“略小节，略小故”，莫须简单地斩头了之。以此看来，诸葛亮斩马谡倒有“丢车保帅”之嫌。毛泽东多次说过，常胜将军是没有的。马谡虽吃了街亭这一场败仗，尚可总结教训，重新起用。何况，马谡还是蜀国名将，立过赫赫战功，怎凭一城一地之失斩头呢？对人的处理宜应慎重，不分大节小节，一概问罪斩头，当是下策。毛泽东从大节着眼，主张刀下留情，不斩马谡。这评断颇有道理，从而纠正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存有的偏见。

（责任编辑 吴乃）



下“海”弄潮的科学骄子

——记年轻机译专家陈肇雄

○王初阳

1991年12月4日至6日,在“91香港电脑软件展览会”上,中国展团带去的“IMT/EC-863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引起了轰动。用键盘输入一个英文句子,三五秒钟内,便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相应的汉语句,正确率高达80%以上,被公认为当前国际上同类系统中水平最高的。一时间,该系统的研制者——陈肇雄,成为一些使用英语国家和地区电子行业巨商大贾们追逐的对象。

来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的30多家外商,对陈肇雄的这一系统表示了极高的兴趣,不少人希望高价买下这一成果,面对竞相增长的诱人出价,陈肇雄根本不为所动,他告诉外商们,他的系统不出售,只是要寻找合作者,或按时间出卖使用权,让使用者在一年内,获利上亿美元。

“这个年轻人太过于自信了吧?”“他是不是在为抬高自己成果的价格故弄玄虚?”懂行的外商们对系统研制者的自信不无疑虑。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为自己的知识产品索要应得的高价,在他们还真不多见。

陈肇雄便向这些巨商大贾们展开了说服攻势。他侃侃而谈,大到信息产业发展趋向,机器翻译的广阔市场,自己的系统的开发远景和巨大潜力;小到自己的系统商品开发的每一个细节,成本核算,开发周期,销售市场及产品价格。推理分析,有根有据,数据确切,令人信服,不由吸引了更多的参观者。这位轻声细语的文弱书生,此时俨然一位驰骋商海的行业“老板”。

陈肇雄面前一下涌出10家愿意出资上百万美元的合作者,而名列“92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工业家”排行榜的权智公司董事长谭伟豪,以其特有的经济慧眼和满足各项条件的真诚,购得了陈肇雄成果的一年使用权。被科研经费不足困扰多年的陈肇雄,一下子成为74万美元的支配者,并在追踪世界高科技的“863”计划计算机主题中,破了项目创汇的纪录。他成功了,这一年,他30岁,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转轨”时,他并不自觉

14年前,刚从福建莆田走出山乡的陈肇雄,并未想到,自己的一生,会同21世纪的尖端技术——机器翻译联系在一起。

计算机问世后,人们马上想到,既然人类可以乘坐火车、轮船、飞机,跨越高山大海这些自然屏障,为何不能利用计算机,穿透语言的隔阂呢?计算机翻译研究的序幕,从此拉开,那是20世纪40年代。

但是,世界机器翻译研究的历程一波三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机器不可能代替人进行翻译的理论占了上

风,其根本原因,是当时计算机技术正处于“初级阶段”,远不足以负载语言翻译这类尖端技术研究。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光电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或许就在事情发生的同时,我们即可获取有关的信息,了解其过程。地球被缩得更小了,语言障碍便显得突出了!

据说中国许多进口的成套设备,当随设备而来的技术资料翻译完毕时,设备已经生锈了。我国目前每年直接投入技术引进的翻译费用,多达数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正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正是在这种被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机器翻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迫切,并且要求翻译的速度更快,翻译系统要智能化,能够对人类的自然语言,进行准确和高质量的理解、转换和生成。

于是,这门涉及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被视为高技术研究难题之一的机器翻译技术,引起了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人工智能型的高性能机器翻译,甚至被视为世界上即将形成的庞大语言信息处理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被国际权威机构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高科技产业之首。

各国的研究人员在该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欧共体七国联合投资3850万欧洲货币单位;美国投资1600万美元;日本也投资120亿日元,与亚洲五国联合攻关。

这一发展趋向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专家、陈肇雄博士生导师高庆狮的关注。他对科学发展的动向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80年代中期的出国交流,使他对人类交往中的巨大障碍感受颇深,外国人耗资巨大的智能型机器翻译研究,正是有效地跨越这一障碍的桥梁,而汉语与西文的机器对译,显然应该由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完成。高庆狮向他的得意门生下了一道死命令:给我搞出机器翻译系统,否则,别想拿到博士学位。善于给学生压担子的导师这一突然举动,使陈肇雄颇觉意外。

陈肇雄1982年从华东工程学院计算机系毕业后,先在高庆狮门下攻硕士学位。当时陈肇雄已提前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而且已获成果,形成效益,完全可以轻车熟路地拿到博士学位。而现在,他面临差异很大的转轨,这对完成学业是很不利的。更何况在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的同行们中,机器翻译被形象地称为“无底洞”。

当陈肇雄介入机器翻译时,这项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跨越了词对词翻译,以语法分析为基础的翻译,以语义分析为基础的翻译,人工智能型翻译几代。而中国推出的几个机器翻译模型,几乎都属于实验性的,与实际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即便是在国际上,这项研究也还没有露出在近期能有重大突破的迹象。前景固然是瑰丽

无比,可它还在虚无缥缈之间。关心他的人都劝他说:这是个担风险的课题,周期长,工程量大,更无资金保障,也许一辈子搭进去,都搞不出成果。

陈肇雄没有从个人的得失考虑这个问题,长年的逻辑程序编制,培养了他合理化的思维和追求;计算机技术将人类昔日幻想变为现实的大量实例,不断向他展示着全新的世界;驰骋在尖端技术领域与家乡父老耕织生活的巨大差异,使他悟出了历史赋予他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虽然,他没有自觉地选择他这只具有零星感知的课题,但当这一课题选择了他时,他头脑中从未闪现推辞的意念,研制出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立即成为他此生的使命。

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地

时间紧,难度大,在别人,也许会刻不容缓地钻进具体的技术研究之中,而陈肇雄却先在大量的调查和翻阅资料的基础上,提交了一份《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研究发展战略》,把机器翻译在高技术领域中的地位,它的开发前景,它与国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决策的关系,国际国内机译研究的现状,近期目标,有关种种理论和方法的利弊,机译产品的经济效益,直至对人类整个文明的推进作用,都论述得头头是道。

着眼宏观,面向未来,把握全局,思维求新,有强烈的使命感,这就是陈肇雄的性格特征。他不按常规从大规模工程化研究入手,而从机译理论方面进行突破。

高庆狮要求陈肇雄,要想得到准确而高质的译文,需赋予计算机丰富的语言应用的知识背景;非语言学和文化、常识等知识背景;使它具有综合上下文,排除歧意,进行选择,转换、生成正确无误的对应文字的功能。这样的机译系统,就是智能型的。

一切利用计算机成果的非专业人员,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即计算机真聪明,能帮助人脑做许多工作,效率又非常之高。而专门研究计算机的学者感觉却恰恰相反,从他们嘴里只能听到这样的话:计算机最愚蠢,你教给它什么,它才会什么。你一点没教到,它就什么也做不出。

因此,要制出智能型的机译系统,你就得先将人类理解语言的各种机制,包括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的各种规则,各类知识背景等等,研究一番,把这些机制形式化,赋予计算机一整套能懂得的算法。一点不完备,它就无法给你尽善尽美的译文。

但人类理解语言,究竟调动了多少种机制,这些机制是依照何种程序运作的,至今也没搞清楚,更不用说将其

设计成计算机懂得的算法。这就是高性能机译系统的研制,至今仍是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难题的根本原因。而汉语的难度就更大了。

汉语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匮乏,以及传统研究范围、程式的束缚局限,使中国大量像陈肇雄一样的计算机学者,不得不插足非其所长的语言学领域。

陈肇雄硬着头皮,钻研起汉语的特征、汉语的结构、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比较来。他把汉语研究,同语言信息的计算机处理、西文与汉语的对译直接挂钩,久而久之,竟趟出一条与传统汉语研究不尽相同的路子。

他和同行请教了一些造诣高深的语文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方法。

他们的观点,在多数现代汉语研究者看来,似乎有些怪诞,但从汉语信息的分析处理角度看,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见解。以此为基础,将有助于汉语信息计算机处理的进展。

正是这类层出不穷的新思路、新构想,使陈肇雄在涉入一个新领域之后,却不断有新的突破,捷足先登,打破了机译研究长年徘徊的局面。

六年辛苦不寻常

机器翻译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语言分析层次的深度,和各种相关信息的灵活运用、变换、调整。陈肇雄针对这些难点,匠心独运地设计了一套新体系,使语法、语义、语用及常识的分析一体化,实现了分析过程中的层次跨越和转换,不仅解决了传统分析的弊病,同时大大提高了速度。

在陈肇雄以前的机器翻译系统中,语言的分析与转换,一般是通过形成内部结构树来传递信息。在生成过程中,需反复对树中的结点进行测试,找出相应的生成码,组成译文。这不光耗时过多,而且由于生成码的内容和数量均不容易确定,人为地丢失许多信息,译文可读性差,还需投入人工进行整理。而陈肇雄独创的集成化处理方法,则能根据转换体的要求,直接生成译文的结构,既简化了分析和转换机制的操作过程,也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

1988年,陈肇雄在国际会议上连续发表三篇论文,阐述他的这些新鲜的构思。特别是在匈牙利召开的第12届国际计算机语言大会上,他宣读的《智能机器翻译系统》一文,引起了与会同行的高度重视,大会主席连称他“指出了雄心勃勃的新的研究方向”。美国的伊利诺斯大学不失时机地发出邀请,请他赴美合作研究。行业国



陈肇雄在他的工作室里

际权威杂志《机器翻译》主编，亲自向他约稿。

他的成就也赢得了祖国的褒奖，博士未读完，已被破格提升为计算所的副研究员。如果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科研工作者，他在此时也许要沿着理论研究的路走下去，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理论的纵深，毕竟是科研的更高品位。然而，陈肇雄就是陈肇雄，他并不满足于只在象牙塔中构想辉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的完善与发展，也并不只在理念的演绎之中。

恰在此时，他的导师高庆狮、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计划专家组领导汪成为向他提出忠告：不要让关键技术流失，应该尽快让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这与陈肇雄实用系统开发的想法不谋而合，而理论与工程的完美结合，则正是他的一贯思路。

早在他读大学本科的时候，他参加的一个计算机软件兴趣小组，就曾用所学的理论，为一家工厂设计出“实时控制系统”，工厂用于生产后，一个月就赚了15万元。从此，他感觉到理论突破加产品效益的无穷魅力。

但是没有经费，产品的开发就无从谈起，只有将课题列入国家“863”计划，才能得到必不可少的经费。陈肇雄充分施展公关攻势，要求立项和争取经费。可有人认为：诱人的理论，或许预示着成功的希望，却并不一定能转化出实用的产品。陈肇雄的课题能否纳入“863”计划，一时悬而不决。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并非空中楼阁，陈肇雄首先争取到中科院科健公司的协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拿出一个智能型机译模型。他立即带上模型，向“863”计划专家组演示汇报，赢得了专家们的充分肯定，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终于被列入“863”计划，陈肇雄被任命为该项目的总体设计师和主持人，智能计算机主题的120万元经费中，有44万归他支配。

与发达国家对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研制的投入相比，44万是零头的零头。靠着这微不足道的经费，陈肇雄在一台借来的相当于SUN3型机的国产华胜工作站上，展开了开发工作。

除了技术难度大，资金匮乏，设备简陋之外，陈肇雄此时又感到人力的严重不足。他要求领导为他配备一些人员，但在中国，为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配备助手，是前所未有的。有人提出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也不过能有一个助手。陈肇雄不得不拿出外国大学的邀请书，说明自己也可以到国外去拿学位，但一个很有前途的智能机译系统的研制，就要因此而搁置。计算所的领导，再次破格为他配了助手。

理论的突破，关键在思维；而系统的开发，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庞大工程。为此，陈肇雄招募起一支“杂牌军”，一起攻关。构成这支杂牌军的，有来自合作单位的，有大学毕业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的，有正在等待出国

签证临时找点活干的,有想通过打短工来熟悉计算机操作的。说起来不免酸楚,这些学位不低的杂牌军,几乎没有一个有从事过机器翻译工作的历史。

酷暑盛夏,简陋的计算机房没有空调,为了让计算机正常运转,仅有的几台电扇都对准了机子。终端不够,他们就轮班上机。为了全力以赴,减轻往返劳顿和避免时间空耗,他们就在附近租住农民的房子,几个人挤在一起。

简陋的设备,艰苦的环境,紧张的工作,微薄的酬劳,可研究骨干们没有一个中途退步抽身,相反,有的已经预交了GRE考试费,却又没有去赴考;有的已拿到了签证,却推迟甚至放弃了出国。没有人命令,没有人监督,大家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为了保护大家的视力,陈肇雄不得不强行规定,一天上机的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并非陈肇雄真有什么超凡的组织天才,他的魅力在于他提出的理论的新颖性,整体构想的可行性,开发前景的诱惑力,以及陈肇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感染力。和他在一起干,觉得充满了希望。

陈肇雄交代工作,从不面面俱到地布置每一个细节,而只是谈思路,谈目标,具体如何实现,课题承担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种良好的合作气氛,大概很适合当今一代科技新人。

他说:“我并没有什么秘密的凝聚剂,机器翻译的研究本身就是具有吸引力的,我们都清楚它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而我们的理论和设计既富于独创,又合理可行,因此我们坚信一流的机器翻译系统,一定能在我们手中诞生。我们看准了,认为值得干,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一种自觉,一种献身科学、为国争光、造福人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的自觉。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冠冕堂皇,但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动机和原因,来对大家的行为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六度寒暑,陈肇雄领导的小组,终于推出了“IMT/EC—863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的雏型,它拥有45000条英文基本词汇,25万条中文对应词语,1500条语言通用规则,15万条特殊规则和成语规则。

商海弄潮

当人们还沉浸在雏型的喜悦中,陈肇雄已揣着雏型的成果飞往香港,参加“91香港电脑软件展览会”。

在是否参加展览的问题上,曾产生过意见分歧。有的人认为成果仅是雏型,有待完善;有人认为,科研经费本来拮据,参展开销太大,得不偿失。

但陈肇雄坚持认为:在理论有所突破后,迅速展开实用系统的开发,目的就是要将理论转化为产品,实现效益。当初,“863”计划专家组领导,从整个智能应用项目经费中,拨出三分之一以上的钱,给机器翻译研究,是狠心加咬牙才定下的。44万元,对系统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根本不足以应付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开发。现在,我们手中已经有了一个雏型的成果,等、靠、要经费的日子就应该结束了!

迅速把成果推向市场,让它创造效益,是唯一而且最可靠的出路。我们带着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市场回报我们资金;有了资金,才能加快我们出成果的速度,以更多的成果从市场换回更多的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陈肇雄的这一思路被大家接受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一段描述,有了陈肇雄课题组与香港权智公司的一年合作。

曾经有一家大报,在报道此事时这样写道:“陈肇雄几乎是在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做起了生意,而且获得成功。”仿佛今日的成就,是陈肇雄幸运地撞上的。但如果我们把陈肇雄在理论攻关前,首先进行了机译发展战略的思考;在理论突破后,立即转向实用系统的开发;成果刚具雏型,便马不停蹄地拿到香港去展示……这一系列事实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就会发现,在不断变幻的时代风云中,陈肇雄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今天的成就,是他孜孜不懈追求、不断主动出击得来的,这正是中国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特征。

与香港权智公司的合作,是一个稳妥的选择。陈肇雄虽然雄心勃勃,但他认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效益的第一步,必须迈得小心翼翼。否则,尝试的大门说不会永远关闭。

作为合作者的权智公司已有现成的产品“快译通”,但这种快译通只是一部袖珍电子词典,键入一个英文词汇,它能在几秒钟内显示出相应的中文词汇。如果将陈肇雄的成果压缩到这个袖珍词典之中,就立即能使它跃上一个新的档次,完成句子翻译,使小词典变成小翻译机。这种合作,成功率高,而且可在短期见效。

陈肇雄粗算了一下工作量,一年内完成是比较有把握的,而对方却只给两个月时间。为了同最初的合作者建立信任感,陈肇雄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他把自己项目组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从事智能型机译系统的提高与完善;另抽出8个人,到北京西山的一个工人疗养院,租了2间平房,专门突击香港合同任务。他们没日没夜地干,一连几个星期都不休息。陈肇雄更是废寝忘食,白天给系统完善组安排工作;晚上又到合同组出谋划策。

针对技术难点,陈肇雄提出了一套适用于袖珍机的知识编码和压缩技术,设计出基于合一运算的有确定性推理算法,使得他的智能型机译系统的诸多功能,能够在100K的动态存贮器内运行。

只用了40天,他们便完成了合同任务,并通过了港方的验收。他们的高效,令港方惊异,连称“想不到中国内地有如此高的效率”。倘若他们能到陈肇雄小组生活工作的场所参观一下的话,或许感慨会更多。

权智公司的快译通加入了陈肇雄的新技术之后,顿时成为抢手的产品。它能在键入英文句子几秒钟内,显示出相应的中文句子,并可以分别用英语、汉语读出声音。

有这个小翻译器做助手,使用英语的人到中国旅游、购物、做生意,就方便多了。因此,第一批产品在香港上市后,几天内就销售一空。据估算,一年内可在香港、台湾售出30万台,以每台2900港币计算,一年销售额将超过8亿港币,这说明陈肇雄创1亿美元产值的预计是相当精确的。于是,权智公司未等第一个合同期满,就提出长期购买该项技术使用权的要求。

经中国科学院领导同意,陈肇雄以独立法人资格,与权智公司在深圳建立合资公司,已是计算所研究员的陈肇雄,又增加了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他可以大展鸿图了。

依旧是轻声细语的他告诉笔者:“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一个语言信息产业。在工业社会里,钢铁、机器制造业

是主要产业;在将来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语言信息产业就是主要产业。”而语言信息产业的特点,就是科研部分与生产实体联为一体。

在发达国家的信息行业里,一个新理论,一个新构想,一两年后就可能转化为产品。在这个行业里,领先只是瞬息之间的事,如果一个新设想在两三年后仍不能实现,就可能被更新的构想取代。陈肇雄之所以不怕可能因琐事缠身,不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科研,毅然担任总经理之职,就是为了适应这一行业的特点。

“传统的先一级一级论证课题的意义和必要性,再立项,等科研人员做出成果,再寻找生产实体,再把成果转化为产品,这种程式,太不适应我们这个行业了。按部就班地沿着这条老路蹒跚,中国的信息处理产业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我国走一条自己立项搞科研,并在自己内部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的新路。”陈肇雄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憧憬和自信。

从陈肇雄的办公室走出,对新一代掌握了科技奥秘的骄子的艳羡油然而生,没有什么不可能和固有的程式能羁绊他们,他们敢于、并且最终能够驾驭科学之海与市场之海的惊涛骇浪,未来是他们的。

(责任编辑 吴乃)



驯服命运的强者

一个『知青』的奋斗历程

○高岩



别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就是几个朋友闲聊天，你也很难一眼就认出谁是白亚南。

与他的名声和业绩相比，白亚南长得太普通了：微胖的中等身材，写满沧桑的面孔，不刻意修饰的发式和穿着。唯有直视对方的真诚目光里，含着几许机智和狡黠。

就是这个白亚南，从一文不名的返城知青，14年间亲手创出了价值两亿资产的集体企业。现在，他担任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和中德合资北京特力冷冻设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白亚南是这两家公司的创立者和决策者，是几百名中外职工的领路人。这一切，并非来自命运对他的垂青。相反，他敢于面对命运提出挑战，及时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成为驯服命运的

强者。

其实，白亚南对命运的抗争，从他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 贪婪地吸取着其中的养分

1964年初冬，15岁的白亚南中断了中学学业，随着一列满载北京知青的火车到宁夏军区，成为全师年龄最小的兵团战士。其时，比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早了三年。白亚南超前的“革命行动”并不是由于他有远见，而是家境窘迫所致。白亚南全家11口人，全靠父亲每月70元工资维持生活。为了少一张嘴吃饭，他过早地踏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同去兵团的北京青年多数是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与大学无缘。这些人聪颖好学，各有所长，成为白亚南难得的良师益友，使他大开眼界，汲取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文革”开始后，全师查抄了一万多册图书，被当作“四旧”堆放在一个房间里。白亚南正住在隔壁，从此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贪婪地吸收着其中的养分。书看得多了，从杂乱无章到渐入佳境。他喜欢读文学、历史和哲学书籍，读得最深的是毛泽东著作。

他学毛著，不求“立竿见影”，而是究其深邃的内含。比如他读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论述，为了弄清“开源节流”的意思，他反复对照原文及注释，根据注释的提示，又去逐项核查边区的土特产品种类，终于懂得了边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知识无用论”肆虐的荒诞岁月里，白亚南却每天从傍晚读到深夜，几年坚持不懈。

农垦农场的活计很杂，从种地、修田到烧砖、盖房。最难干的是冬天挖渠，一镐下去，冰封的土地只见一点白痕。白亚南是拖拉机手，他调动学过的知识，决定试制一种挖沟机械。得到团里允许后，他四处奔波，找样本，画草图，加工零件，在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帮助下，终于造出了和拖拉机配套使用的犁地挖沟两用机械。这是他第一次和工程技术打交道，学会了看图、制图和机械加工常识，开辟了新的知识领域。

1979年，白亚南接到返回北京的通知。农垦15年，他将青春和汗水播洒在西北高原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的是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执著的人生追求。回忆这段岁月，白亚南没有埋怨命运的不公，没有悲叹生活的艰辛。他深深感谢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们，他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展开了飞翔的翅膀。

一旦成千上万的财源滚滚而来 金钱却对他失去了诱惑力

而立之年回到北京的白亚南，除户口之外一无所有。按照当时的观念，抱一个国营工厂的“铁饭碗”，是知青最光彩的出路。白亚南不甘于此。他想，与其当个30岁的老徒工，不饥不饱地混日子，不如凭力气和本事干一番事业。他自小穷怕了，不愿听从命运安排一条父辈那样的生活道路。何况这时白亚南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从兵团带回的妻子和儿子等他挣钱抚养。

不久，北京西城一条街道旁，搭起了一间简陋的工棚，白亚南和6个知青七拼八凑到三千多元，干起黑白铁加工的营生。对顾客需要的服务项目，他们不挑不拣，从修锅焊壶到打烟筒通下水道，卖的是力气，挣的是血汗钱。

一次，白亚南从北郊一个机关大院里承揽了给楼房装配暖气的工程。6天后，白亚南告诉机关行政科负责人，暖气装完了，请他验收。负责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信半疑地来到现场，果真崭新的暖气装得妥妥贴贴。他奇怪了：“机关的水暖工干了一年，也没装完一座楼的暖气，你们这么神？”

白亚南告诉他，水暖工是测量一根下楼加工一根，时间全耽误在楼梯上。白亚南的办法是全楼一次测量完毕，集中加工后分别安装，速度当然快。结果，这个机关的暖气安装任务，全部包给了白亚南。

白亚南是个爱动脑筋的人，这件事让他悟出了三点道理：第一，铁饭碗养懒，泥饭碗养勤。第二，干工程技术，智力投入比舍得卖力气更重要。第三，工程安装的社会需要量大，这行当大有前途。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个体经济取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白亚南越干越顺手，包揽的工程项目由

水暖工程扩大到冷冻工程。

第一年,白亚南他们挣了17万,第二年34万,第三年70多万,家业以每年一番的速度递增。创业之始,挣钱是白亚南的首要目标,一旦成千上万的财源滚滚而来,金钱却对他失去了诱惑力。他知道,他的成功不在于白亚南多么高明,而在于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机遇。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他也承担了社会赋予的责任。他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要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一试身手。

世界排名第一的空调生产厂家 在中国多方寻访,最后看 中了同力

了解白亚南的人,都说他有一种“超前意识”。

如果说,当初他超前“上山下乡”是为生活所迫,超前埋头读书是事出偶然的话,那么回城之后的白亚南,他的超前意识已经来自他敏锐的判断能力和理性的深思熟虑。

他所以投身陌生的经济领域,是基于这种分析:政治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文革”已经把政治推向颠峰,如果再不启动经济车轮,社会发展就会拐进死胡同。

他在赚了几十万、上百万以后,没有分光花净,而是把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再生产,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社会为企业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前景。

1985年,北京同力冷冻工程公司正式成立。总经理白亚南看准了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随着先进设备的引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冷冻设备会成为新的热点。果不其然,公司成立后客户蜂拥而至,生意非常红火。

1987年,通县果品公司从德国引进4000平米全套冷库设备,要求同力公司施工安装。这套设备水平先进,施工质量要求极严。接受这项工程要冒一定风险,弄得不好会砸掉同力的牌子。白亚南断然拍板,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施工队三九严寒开进现场,如期完成了安装任务,得到德方专家高度评价。同力人通过施工,看到了我国冷冻设备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激发了他

们走向世界的决心。

80年代,随着工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北京市水资源频频告急。冷冻机的冷凝器是用水大户,仅全市中小型冷库设备,一年就要耗水2.5亿吨。白亚南审时度势,预计空气冷却代替水冷却是大势所趋。当时,全国有十几家厂家在研制风冷冷凝器,可是它的关键部件——翅片却必须依靠进口。白亚南从1985年开始,用了四年时间攻克了这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建国40周年前夕,首都各报争相报道了这项成果。在北京推广后,每年可节水亿吨。

进入90年代,中国人的钱包鼓了起来。家用电器消费悄然兴起,迅速升温。家用空调器顿时成了受人青睐的热门货。同力公司有生产大中型制冷设备的经验和技能,上家用空调可谓驾轻就熟。再一调查市场,大陆120个厂家,年产空调器240万台,只相当台湾产量的三分之二,市场大有潜力。白亚南迅速决断:上同力家用空调,而且要大上、快上,创出一流名牌产品。1992年,同力公司投资5000万元,在北郊立水桥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空调器生产厂。1993年,第一批1万台同力牌空调上市,没出西城区就销售一空。产品荣获中国科技之光成果等两项金奖,被评为“受消费者欢迎的空调产品”。

在立足国内、争创一流产品的同时,白亚南的目光又转向了国际市场。1989年,同力公司与德国根特公司合资创办了特力冷冻设备有限公司,搭起了通向世界的桥梁。199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空调生产厂家——德国克伯尔公司,到中国大陆寻求合作伙伴。他们在中国进行了三个月的调研,最后看中了同力公司,主动提出合资要求。德国同行知道同力厂的实力,如不联手,必成对手。目前,合资事宜仍在谈判中。

白亚南有超前意识,但他不是“超人”。他的成功,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求贤若渴,在于他慧眼识才。

在白亚南手下干,“同力”人有三个感觉:归宿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白亚南(右)接受记者采访

也许由于白亚南自学成才(他通过自学拿到大专学历)的缘故,他深知成才的艰难和人才的可贵。他认为,只要有一技之长,能干实事的就是人才,不必太拘泥于学历、年龄、资格等外在条件。

早在白亚南刚撑起摊子干安装的时候,他结识了白溪瀛。老白大他十几岁,当时任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长。两个人经过深谈,在发展民营企业问题上取得共识。老白作为基层官员,积极支持亚南的事业,并为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亚南觉得老白观念新,平等待人,像位老大哥。在多次接触中,白溪瀛对亚南由爱护变为佩服,后来毅然放弃“铁饭碗”,成为白亚南的有力臂膀。现在,白溪瀛是同力公司的副总经理,人们戏称“巡回大使”。凡是白亚南分身无术时,就让白溪瀛代他出马,保准放心。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老白虽是同姓,却是萍水相逢,无任何亲缘关系。

说到白亚南爱才、惜才,人们常常提起程工的经历。那年,白亚南接待了一位找上门来的老知识分子。老人头发花白,神情沮丧。他是某厂的技术人员,领着十几个小青年搞冷凝翅片的研制工作。最近,因为扩建厂房,这个试制组成了

工厂的“包袱”。厂长声言,不管哪个单位接收,这十多个人连同3台机床可以无偿奉送。程工抱着试试运气的心情慕名来到同力,想找到用武之地。白亚南略一思量,安慰了程工几句,立即赶到那个厂办交涉,次日就把程工等人接进同力厂。同力厂把翅片研制定为重点科研课题,先后投入几十万资金。经过四年的反复试验,程工研制出国内首家高质量翅片产品。用这种翅片组装的风冷冷凝器,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用水,还可每年为同力厂创利2.5亿元。那个厂的“包袱”在同力变成了“宝”,程工成为同力厂贡献最大、最受尊敬的功臣之一。

白亚南常说:“我是挖人的,不是挖沟的。”意思是,具体的力气活不一定要总经理亲自干,可是事关人才大计,总经理一定要亲自出马。同力公司现任副总经理、负责空调生产的朱国宏,就是白亚南亲自“挖”来的。

朱国宏与白亚南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他插队10年,其中有8年是在内蒙沙漠度过的,遍尝酸甜苦辣。他同样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在内蒙发奋自学了大学课程、入了党,回京后也干起空调冷冻这一行。

前年，朱国宏去日本考察，看到一种日本新研制的机组。按规定，这种产品8个月后才能向大陆输出。日本厂家送给朱国宏3台样品，他带回国后，知道白亚南是专家，就找白总商议。

白亚南和朱国宏是我国空调冷冻界两个强人。虽然没直接打过交道，可是我在电视中见过你，你在报纸上见过我，算起来已经“神交”8年了。俩人一见面，从空调界现状谈到发展趋势，从生产设备谈到投资规模，越谈越投机，真是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朱国宏谈了试制新产品的设想，希望白亚南投资自建空调器厂。白亚南早有此意，当即拍板，并表示请朱国宏主持建厂的意向。白亚南趁热打铁，领朱国宏参观全厂，边走边谈工厂的远景规划，挽留之情溢于言表。白亚南说：“你来主持建厂，要钱、要设备找我，其它的事全由你决定。”

朱国宏来同力公司，在别人看来是“吃亏”的事：从合资企业调到集体企业，从一把手降为二把手，工资从4位数降到3位数，他图的什么呢？

“我图的是白总敢放手、敢拍板的领导作风，图的是他尊重人、信任人的真诚态度。我在国营企业、合资企业都干过多年，如今想在民营企业里再试身手。”朱国宏的话实实在在，“到同力厂后，经我手动用的资金上千万，白总越是尊重我，我越要对同力负责。”

同力公司的职工说，企业对他们有特强的凝聚力。在白总手下干，他们有三个感觉：归宿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作为凝聚力之源的白亚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白亚南的爱憎与喜怒哀乐 已经融入了“同力”这个 群体之中

白亚南不善夸夸其谈，他总是用最简捷的语言表达最明了的含义。他并不视此为缺点，反而有些得意地寻找论据。当记者谈到当前办得很“火”的民营企业，如亚都、百龙、同力这些企业家

有什么共同之处时，白亚南不无幽默地说：“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不爱说话。”

也有破例的时候。谈起同力公司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白亚南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但全是确凿的数字和事实，绝无夸张和修饰的成分。

白亚南对功名很淡泊。他曾连续三年获北京市优秀经理称号，从不对人提起。

白亚南的穿着很“土”，最爱中山装，也穿夹克衫，绝少西服革履。尚未染上会见洋人必穿“洋装”的国人通病。

白亚南的眼光却很“洋”。从大方面讲，总是盯着洋人最先进的技术，连新建的厂房也美观考究，颇为洋气；从生活细节看，接待厅他让挂油画而不挂国画，说这样好看。招待客人喜用西方自助餐。

白亚南爱书。每周六下班，必开车去转书摊一趟。每晚两小时读书时间，雷打不动。以前他爱读中国现代史，回京后他爱读清史。他说，清朝康、乾、雍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满族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怎能统治中国，他要研究研究。

白亚南心特灵，喜欢学习新玩艺。他学唱卡拉OK，学跳舞，短时间即熟练掌握。他学这些并非追赶时髦。一次，他陪客人去听卡拉OK，见高歌者唱得特残酷，令听众心惊肉跳。自此痛下决心，购一卡拉OK机于家中。两周后一试身手，水平不凡。

白亚南家庭也有不幸。1979年举家返城时，小儿子才四个月，一路连冻带颠簸，回到北京医治已晚，成了植物人。此后在床上沉睡了10年，在亚运会开幕那天夭折了。10年，每天对白亚南夫妇都是一种感情折磨。他们觉得愧对爱子。这种悔疚心情至今未解。

这就是白亚南的人生历程。他有精明强悍的一面，也存在弱点和不足。他的爱憎、他的喜怒哀乐已经融入同力这个群体之中。他是个敢于向命运挑战、并使之驯服的人，一个取得成功的共和国的同龄人。

(责任编辑 丁末)

掌
上
悬
壶
济
众
生

记掌纹医学专家王晨霞

○王克明



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一条一步就是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路。

当一本《现代掌纹诊病》医学专著摆上书店货架时，当一部《掌纹诊病》专题科教影片拍完关机时，当一所“掌纹医学研究所”在兰州成立时，她算是把这条路踩实了。

用了8年，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专业使用人类手掌纹线诊病的医生。

对于已成为掌纹诊病专家的王晨霞来说，从人类掌纹中追踪人类疾病，通过破译人类掌纹信息，找到一条征服人类疾病的途径，已是今生今世的全部追求。

(一)

做为北京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她在内蒙古乌梁素海的湖边苇荡中劳作了几年，又在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苦读了数载，毕业后，跑到了黄河上游旁边儿的兰州。在医院，她是医生，却离开专业，搞起了行政工作，组织共青团的活动，还读完了“行政管理函授大学”的课程。1986年4月，她重操旧业，被安排到门诊部当副主任。

闲翻杂志时，她看到一篇日本人写的有关掌纹与疾病的文章，很有趣，便默记于心，中医望诊，也有看掌观色一道。坐门诊时，她就时时翻开患者手掌，观察观察。不久，看到一位感冒病人的掌纹与那文章里说的甲状腺肿瘤纹状相同，便顺口说出：“你可能有甲状腺肿瘤。”时过月余，那位病人竟来找她致谢。原来，他听了王晨霞的话后，去认真检查，果有此病，及时做了手术。

王晨霞惊奇了：从掌纹上真能看出病来？直到她被兰州人称为“怪医”，她从掌纹中总结出一些科学性的规律时，她自己才对此确信无疑了。不过那已经是研究了上万只手掌后的事了。

自那病人跑来找她道谢之后，她就开始了对掌纹的研究。她没钱给那些手掌照相，便拿来个油墨滚子，蘸上墨，在病人的双手上一滚，再让病人把手纹印在白纸上，一份资料就有了。她无权把每个病人都搞得双手墨黑，只好委屈熟悉的病人和朋友。她并不知道，他们那一双双染得墨黑的手，正在悄悄地构筑着一门掌纹医学的基础。

夜晚灯下，王晨霞进入了掌纹的世界。眼前满是手纹图和那些病人的病历。单调的墨色，枯燥的纹理，遍查古今中外著述，这方面内容也寥寥无几。从哪儿找掌纹与疾病的对应关系？人类掌心这些密密麻麻的纹理，会不会是和他们的脑共同进化的结果？复杂的掌纹，会不会正是造物主留给人类的、让大脑向人类传达它们自身机理、病理变化的神秘信息？该有人去发现它们了。

终于，一天凌晨，王晨霞从那些白纸黑墨中，发现了可能正是该由她来发现的东西：有一种病，在十多双手的相同部位上，有着极为相似的纹理！

(二)

王晨霞上班给病人看“手相”的事儿传开了。上级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她被批评：党员干部怎么能带头搞封建迷信！如果屡教不改，撤消她门诊部

副主任职务。

1988年4月，兰州五泉山公园的一棵大树下，出现了一个小地摊儿。一个30多岁的女人蹲在地上，不大好意思地小声招呼过往行人：“看看‘手相’吧，只看病不看命。五毛钱一位，看不准倒找钱。”有人向她摊开了手掌，有人围上来看新鲜，也有人摇摇头：“这么年轻就当巫婆骗人？”很是惋惜。

俯视面前的双手时，王晨霞什么也没听见。是不是封建迷信，将来要靠数字说话。她必须在实践中增加积累。不让在医院里用“手相”诊病，就开辟第二职业，下班后和星期日在医院外面摆个体摊儿。开始时拉不下脸来，慢慢也就惯了。她一双手一双手地看。人家说她讲得不对，她就把钱送回人家手里，然后细细地问病情病史，细细地琢磨人家掌纹，记下来。她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摆地摊儿，一天一天地积累，直到治安人员把这个“从事迷信活动”的女人轰走。

王晨霞并不灰心。她到处找书，图书馆，书摊儿上的，别人家的，只要跟研究手有点关系的，都拿来看。她第一次看到的记载着刘邦、项羽掌纹的《麻衣神相》，就是从公安局扫黄的书堆里捡出来的。

古人对掌纹的研究，零零散散，但还是给了王晨霞不少启发。两千年前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就认为，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与全身脏腑、经络、气血密切相关，五官、形体、色脉之类的外在变化，都反映着人体内脏健康状况。这书里就有好多关于手与脏腑相关的论述，像“掌中热者腑中热，掌中寒者腑中寒”之类的。医学上不是一直有用小儿指纹辨别疾病的方法吗？那么用掌纹诊病怎么就不可能？怎么就一定是迷信呢？看手相，确有好多迷信不实之处，然而，几千年的手相研究，毕竟是对一种人体符号认识的结果，毕竟是它们确立了掌纹的分类。手相术源于古印度。大约3000年前古印度婆罗门教徒秘藏在洞窟里的刻在人皮上的三部手相书，就有许多用血画的精巧的手纹图案，成为人类最早的总结自己手掌纹线符号的原始记录资料。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把手相术带回了西方。后来，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了本《亚里士多德手相术》，被人称为“万古不灭之大典”。公元5—15世纪，手相学被基督教会扫荡摧残。但流浪于世界各地、靠看手相和占卜挣饭吃的吉卜赛人把这门知识保留了下来。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手相学，吸取了中国古代手相学、印度手相学、欧洲手相学、日本手相学和吉卜赛人手



王晨霞(左)在看掌纹

相学的精华,结合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已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科学意义。所以,今天书摊儿上那许多有关手相、面相与疾病的关系的书,都使王晨霞觉得不乏参考价值。

而国外在手诊方面的研究,又使王晨霞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她一个人在想入非非。日本东京大学一个医学教授提倡从手相看疾病,引起医学界广泛注意。研究者根据掌丘的显示判断人体几种器官的健康,准确程度达75%。加拿大有个医院针对诊断小儿白痴,研制成了一张肤纹对照表。只要将小儿手掌、脚掌的纹理录下,对照表上的数据,就可知道这孩子会不会患有先天愚型,会不会到四、五岁还叫不出爸爸、妈妈,正确率能达到80%。

王晨霞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对了。

一天,一位病人挤到王晨霞面前,摊开双手说:“给我看看有什么病吧!我找你好多天了!”说是她们单位有三个在王晨霞这儿看过病的女同志都说“那个王大夫神了”。一个是半年前来看感冒时,王晨霞从掌纹诊断她胆上有病。她不信。几个月后的一天,她突然腹痛剧烈,被抬进医院,当即手术,确认为胆囊颈扭曲坏死,切除了胆囊。第二个是王晨霞从掌纹诊断她两乳都有良性增生,她马上去就疹手术,果然两乳都有良性肿瘤。第三位是对王晨霞从掌纹诊断的咽部增生不以为然,几个月后竟咽哑不能言。这才想起王大夫看着她手掌说的话,跑到医院去检查,是甲状腺瘤,一个大瘤带三个小瘤。

一位铁路工人感到胃不舒服,来看看中医。王

晨霞仔细看了他的掌纹、嘴唇、舌头,说:“你得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可能已经有早期恶变,建议你去作西医检查。”这位工人不信自己会得癌症,但又不踏实,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去做了胃镜检查。果然:胃窦部癌症。他及时做了手术。以后,他逢人便说,“那个王大夫有能耐!”

一传十,十传百,患者的口碑使王晨霞出了名。在36岁那年,他终于决定:终生行医。

(三)

1990年10月,王晨霞离开医院,应兰州“福祥药行”经理的邀请,与药行合作,当药行坐堂大夫。在这里,她堂堂正正地挂起了牌子——掌纹诊病。药行给她提供放手干掌纹诊病的条件,还使她能够潜心钻研药物。这正是她最需要的。因为只有诊治结合,才能够“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她要攒钱办一件大事——成立“掌纹医学研究所”。

王晨霞说自己:“职称不要了。落草为寇,从半个体户干起吧。”她后来发现,这成了她投身掌纹研究的一个转折点。

她接触的病种比原来多了,认识的病理掌纹比原来多了,已有的经验得到大范围的验证和提高。1991年,药行抽查1200个病人,结果表明:掌诊可以诊断出132种疾病,其中54种常见病的平均符合率在85%以上,对消化系统、心血管病及妇、儿科疾病,掌纹诊断的准确率则达到90%。而且,这时的王晨霞,



王晨霞(右2)在给读者签名

对辨识癌症也有了一定把握。

甘肃省的一位老干部,曾经由女儿陪同来王晨霞这里看病。掌纹已显示他患了恶性肿瘤。王晨霞悄悄告诉了他女儿。女儿一直没敢告诉父亲,一直陪父亲跑医院检查,但是一直没查出来。父亲看上去却也一直健康。4年后,老人在一次打羽毛球时,突然栽倒,再没有起来。他是胰腺癌。

一位老太太,是伊斯兰教徒。一次,王晨霞看了她的掌纹,知道她冠心病很严重,便告诉她的儿女:“要千万小心。老太太这病,可能会说死就死的。”可惜儿女没把这话当真:“王大夫怎么这样说话?”不久,老人家在做早饭时,心绞痛突发而死。

曾和王晨霞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大夫来探讨医术,让王晨霞看掌纹。他在4年前因胆囊良性肿瘤做过手术。王晨霞告诉他,他患有胆囊癌。他笑了:“错啦!错啦!我肯定是良性的,都切除过了!”没想到,仅仅过了4个多月,他病发而死。医院检查诊断发现:癌细胞是由附着肝旁胆管下面的不易发现处扩散的。

最使王晨霞难以忘却的,是一位从外省到甘肃来做生意的总经理。那人没觉得自己有病,只是见王大夫这里门庭若市,便也来看看“手相”。王晨霞看后对他说:“你的肝上有肿瘤。你要命就别要钱,别当经理了,快去治疗。”他大惊,带上他的副经理,卷起铺盖回家了。1年后,那位副经理出现在王晨霞面前。他说:“我不是出公差来兰州的,是我们总经理留下句话,让我专门来对你说的。”那位总经理在

王晨霞这儿看了“手相”后,便回家去跑各大医院检查,但都说他没病。他却坚信王晨霞,不停地查下去,直到要求住院检查。最后,查出了肝癌。可是已经晚了,7天后,他死了。临死前,他对他的副经理说:“你一定亲自代我去趟兰州,告诉王大夫:我不是不听她的话,不是不听她的话……”

王晨霞久久地凝视着眼前这一大堆浸透了自己血汗的资料。如果人们都能够了解手诊这种一目了然的诊病方法,能够相信它的科学性,人的自诊能力、自我保健能力是不是就会大大提高?好多病是不是就能得到及早治疗?

王晨霞提起笔,写下了一本书的前言:

“当人类以手足分工作为标志,最终完成了自己伟大的进化的时候,便有一个黑色的阴影无时不在追逐着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群体。

“那就是疾病。

“诚然,疾病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不幸的专利。然而,唯有人才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先进诊断技术标准是:无痛苦,无创伤,简便易行。那么,一旦搞清楚掌纹变化同疾病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关系,掌纹诊病便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诊断技术。下一步,是治疗的问题。王晨霞写道:

“我们可以设想:在掌纹与疾病之间有一条我们尚未认识的神秘通道。如果可以在掌上直接治疗,

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多么自由的明天。

“也许，这还仅仅是个设想，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正是那一个个大胆的设想托起了地球村的文明吗？”

这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18万字、300多幅手纹图的医学专著《现代掌纹诊病》。

在这本为人们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掌纹诊病的方法中，王晨霞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一个脏器在手掌上的对应反应区不只是一个，综合观察掌上多个区域的点、纹、色、形，才能准确判断某一病症。

1992年8月，王晨霞用她在药行给一个个病人诊病积攒起来的3万元挂号费，并吸收其它资金，开办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掌纹医学研究所。并正式开办掌纹门诊部。她是所长。

(四)

王晨霞要寻找配合掌纹诊治疾病的渗透力和持久力强的药物。她大量学习和吸收中药验方，在临床治疗中细细把握。她治愈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一次，一位突然每晚尿血不止的高中女学生抱着一线希望求助于王晨霞。她得的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跑了几家医院治不好，先是三天输一回血，后来则要全身大换血了。虽然早听说这位王大夫掌纹诊病“神了”，但不知她究竟神不神。有病乱投医吧。

果然，王晨霞使尽浑身解数，同样不管用。

“谁能治好这孩子的病，我就拜他为师！”她说。

有人对她说，藏医神奇无比，能治百病，但是单脉传承，从不轻易外传。

王晨霞决心一试。她背上行囊，进入藏区，行大礼，献哈达，吃糌粑，切磋医艺，终于把藏医请出山来。藏医用药两次，女学生不用再换血，用药三次，竟基本痊愈了。

王晨霞从此拜藏医为师。原来只知藏医神奇，学进去，才知藏医是一个历史悠久、临床经验丰富、并有系统理论体系的医学宝库。为寻找藏医药源，她三进藏区。但因为不懂藏语，吃了不少苦。一次，她大冬天坐上卡车跑了500公里路，没太听明白人家说什么，就把市面上的一般药材当好药材，自己装

车，买回一车“草”。白花了2500块钱，还累个半死。

她又开始学藏文。她捧着被誉为藏医之本草纲目的藏医医典《晶珠本草》，细细研读，渴望从庞大的藏医学宝库中发掘出实现她设想的药物。她把甘南州藏医研究所附属藏医医院院长、甘南著名的老藏医罗布藏先生请进掌纹门诊，共同开发。

苦煎苦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她终于受藏药启发，研制出了配有藏药、对益智健脑有特效的“益脑丸”，又研制成功了含有藏药成分的“一心觉”按摩膏。这“一心觉”，本是按照疗效型化妆品的思路去做的，但连她也没有想到，这种按摩膏对面部雀斑、粉刺，竟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在临床使用上还发现，“一心觉”的奇效远远不止于美容！

一位48岁的女病人，来掌纹门诊部看病时，说是得过腹膜炎，在别的医院针灸治疗不好。王晨霞从她掌纹上断出她长了子宫肌瘤。她跑到兰州铁路中心医院做“B超”，果然有个45×50毫米的肌瘤。王晨霞让她使用“一心觉”按摩。20多天后，她再去铁路中心医院检查，肌瘤居然缩成20×19毫米大小了！

一个64岁的老汉，排尿困难，偶发剧痛，王晨霞从掌纹诊断他有前列腺肥大等病。他也去做了“B超”，前列腺是47毫米的前后径。外敷“一心觉”、内服中草药20多天，又做“B超”，他前列腺的前后径是29毫米了。

最让王晨霞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是，她发现：把“一心觉”用于掌纹按摩，通过皮肤吸收，能达到特别好的止痛效果！

真有那样一条不同于经络、血脉的“神秘通道”？

王晨霞已经迈上实现设想的路了。就是说，她不但在为人类摸索一个无痛苦、无创伤、简便易行的诊病方法，还要给人类找到一个无痛苦、无损伤、无感染源、无副作用的治病手段。

那要付出多大精力？除非她把自己献给人类。

(五)

1992年秋，权威的英国《皇家医学杂志》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从手纹上可以判断生命的长短和疾病，手诊具有X光机或“B超”的诊断作用。

同年，我国也将“皮肤纹理与人体疾病的关系”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定向资助课题。

“看手相”被剥去了迷信和谬误的外壳,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皮纹学”了。

王晨霞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建立“掌纹医学”。

根据生物全息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局部都类似于其整体,手纹也含有人体的大量信息。手是人体的一扇窗户,记录着人体生命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体内环境的失衡变化、各种疾病的征象、情绪心理变异带来的能量物质代谢变化的征迹,以及遗传因素的作用等等,都可以完整地反映在手上,并留下暂时或长久的纹线。通过观察这些纹线以及它的形态和所在部位,就能用来诊断人体的各种疾病。

一个青年陪着腹痛的母亲来掌纹门诊部看病。王晨霞从掌纹诊断她患有早期子宫肌瘤。那青年忙把母亲送进一家医院要做手术。但“B超”检查没发现异常。临床大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伴炎症,认为没有动手术的必要。青年人又跑来找王晨霞。王晨霞十分肯定地对他说:“你母亲的病是早期,‘B超’不容易发现,必须做活检。”那青年听了她的话,终于确诊母亲长了子宫肌瘤,及时进行了手术治疗。那家医院的几位大夫对此甚为惊讶:“掌纹诊病比‘B超’还准确?”

人的胚胎发育到五个月时,纹理就形成了。其中手指内侧的纹是终身不变的。手掌上的主要三条纹虽有变化,但有高度的稳定性。而手掌上那些细小的纹路,是随着人体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疾病的形成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当人尚未感觉到病痛时,气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掌纹也相应地变化。因此,先进仪器也查不出来的未成型之前的肿瘤病变,从手纹上却可以发现。

一个新生儿,没病,但手掌上有胆囊炎、胆结石的病理性纹。王晨霞在孩子父母的手上没发现这种纹理,却在在外祖母的手上看到了。一个6岁儿童的掌纹里有明显的恶性肿瘤纹,也没有临床症状。他父亲手上也没这种纹。但他爷爷不久前患胃癌去世了。掌纹的遗传,是不是代表了疾病的遗传?有这种病理掌纹遗传的人,会不会在将来外界因素一旦形成发病的适合条件时,就患这种病?如果是这样,能不能早就对环境、饮食等等外界因素加以注意,而延缓乃至预防这种病?

王晨霞意识到:手诊的更高价值在于预测疾病。

她觉得自己对掌纹的了解太少了。她要继续做

的,已不是她一个人和一辈子所能完成的事业了。

由王晨霞出任董事长的兰州掌纹医学发展有限公司,于1993年春天成立。公司下设掌纹医学研究所、藏医药学研究所、掌纹门诊部和—个制药试验工厂。掌纹医学事业已由她的个人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了,看到这些与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掌纹研究的发展辛苦奔波,夜以继日,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凡是为掌纹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我当终生奉敬!”

被称为大陆科学泰斗的钱学森教授在读了《科技日报》上介绍王晨霞的文章后,写信给她,对她的探索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20多家报刊介绍了她的精湛医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30余种语言向全球介绍了她的科学化的掌纹诊病。台湾《时报周刊》也为此作了长篇报道。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掌纹诊病》科教片,今年5月赴西班牙参加国际新技术、新科学、新学科短片影展,并准备赴意大利参加第五届帕玛国际医学科学电影展。香港、台湾有关人士也邀请她今年去诊病和讲学。

再往前走,王晨霞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从去年开始,她走出兰州,到全国各地看掌纹,在不同生活环境的人群中,更大范围地积累资料,认识掌纹。她今年年初南下广东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南方人的手掌上,认出了她在西北多少年没有认出的鼻炎病理纹。今年春她东去上海讲学、诊病,不但引起极大轰动,而且,又在那里人的掌纹中确认了几年来她苦苦寻找的糖尿病特殊纹。

越深入研究,王晨霞就越认定:做为实用医学领域里的这门崭新的掌纹科学,它的建立之意义绝不亚于经络的发现。它必将造福人类。王晨霞期待着这一事业向社会行为发展,企盼着人人都有她的这种本事。为此,她那个掌纹医学研究所和甘肃省科协共同发出一个呼吁:建立掌纹医学基金会。

进入不惑之年时,王晨霞的父母想把这个离别多年的女儿调回北京。女儿将万语千言凝聚在一首词里:“思家之情凭谁诉,念双慈,恩有负。立志成得妙手,又被他乡留住……”

看过8万双手。治好几万人的病。但是她没想停下来。还有一个使命在催促她。世界上不只一个国家有人研究掌纹诊病,她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全世界说:掌纹医学研究的尖端水平在中国!

(责任编辑 焕然)

从奴隶到宰相

——辅佐商代武丁中兴的传说

○徐崇寿



由平陆县人民政府主办,平陆县建设局和山西民间美术研究所承办的传说版筑雕像(作者万绪德),已于1992年12月24日矗立于传说故里圣人漳,像高8米,座高6米,背倚中条山,前眺黄河水。图为传说塑像。 邵转运 摄

一、傅说家世的有关传说

根据我国历史学专家如郭沫若与范文澜等的考古研究,一致肯定我国远古时期距今约为三千余年前的殷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066年)是属于奴隶社会。商王朝的开国者是成汤灭掉夏王朝的最后一个暴君桀的而建国的(因为曾经传到商的后期有个叫盘庚的迁都于殷,所以历史上也称为殷商)。传到商代的高宗武丁号称中兴之主,因为他破格擢拔了一位在当时属于被统治的奴隶阶级中的傅说,充任了辅佐他治国的宰相,称为“上宰”。我们今天看来,这实在是奴隶社会惊天动地的一桩改革行动!

传说中的傅说,证之于历史古籍与山西平陆县历代县志的记载,是实有其人的。傅说是傅岩(亦称“傅险”)人,傅岩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两山之峡,有马跑泉、石嵌泉会流其下的圣人涧村(即今平陆县城区)。他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1326—公元前1237年,是早在孔子之前八个世纪的人。傅说天资聪慧,有过人之才,其“形如植鳍”(《荀子·非相》),有文弱之风。不过他当时只是一名修路的奴隶,所以他的地位是很卑贱的。

二、傅说的创造与发明

傅岩在当时是虞、虢两个方国交界处,是潞盐运销黄河以南的交通要道。由于夏季涧水暴涨,冲毁道路,致使行旅受阻。这里常有一批胥靡(即今管带犯人劳动的小头目)刑人在此负责修路。傅说就在其中“代胥靡筑之以供食”。由于他的智力超人,加上苦役的实践,他总结了经验,便创造了“版筑”技术(即以两块木板相夹,置于两头的各两根木椽中,人以铲土之工具向板中间充湿土,以石杵捣实,然后抽板逐次加高,筑成土墙)。

这就解决了洪水冲塌的难题,护住了道路的畅通。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他的创造发明确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与创造能力!后来的垒城堡、筑长城、起围墙、打土坯等大小工程莫不是从他的“版筑”而来。他的家乡,人们为了纪念他的不朽功绩,把傅岩尊称为圣人涧村是当之无愧的。

三、傅说怎样得到武丁重用

傅说的“版筑”技术一时遐迩传说。当时深人民间访贤,以观国风的国君武丁便如获至宝,由掌管工程建设的

“百工”推荐,亲自召见傅说对话,发现他谈吐不凡,怀有大志,是一位难遇的王佐之才。武丁便以夜梦得圣人的名义(见《史记·殷本纪》),命“百工”按他所说的梦中图像在四处寻访,终于在傅岩修路的“胥靡刑人”中找到。传说傅说原无姓氏,因在傅岩被发现,便以傅为姓。他是今天国内外傅氏家族的老祖宗。武丁的这一托梦访圣的行动,既符合了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家训与民间传统的迷信习俗,更为重要的是排除了王室贵族的群起反对或干涉,打破了阶级的鸿沟,擢拔了一位辅佐他治国的贤相于奴隶群中,所以才有了后代历史上盛传的“武丁中兴”。

四、傅说的政论贡献

傅说以一个卑贱的奴隶跃升显赫地位的宰相,就是萌芽于商汤王朝时的任用伊尹制度。当时的伊尹是商初拥有最大权力的主宰者,起着“师”(教导)与“保”(辅佐)的巨大作用。他以后的保衡、伊陟、臣扈、巫咸、甘盘等一批贤相,都在“保璜(音艺,才德过人之意)有殷”中发挥了杰出的才能。武丁重用傅说,比作“大旱之与霖雨,巨川之与舟楫”,“麴蘖”与“盐梅”,“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便知武丁对傅说如何信任重用了。流传下来的《说命三篇》,既是君臣对话记录,又是突出地反映了傅说的政治卓见与哲学观念,是研究我国殷商奴隶社会武丁中兴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说命三篇》的上篇是叙述高宗武丁得傅说的经过与任命傅说当相的命辞,中篇是记述傅说当相后向武丁的进言;下篇则是记述傅说论学。以下我们可以分别说明傅说在政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是如何辅佐了中兴事业的。

1. 傅说的道德观

如《说命三篇》中的“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慎厥攸居,政事惟醇”等,充分体现了他的道德观。这就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必先奉行的规范。以后形成德操的“正人必先正己”、“谦虚谨慎”、“兼听则明”、“选贤任能”……则均可以说是这一道德观的发展与延伸。

2. 傅说的主要政论

如他提出的君主治理国政要做到“惟口起羞,惟甲冑戎戩,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等箴言,就是说不要轻易发号施令,不随便动用军队,不轻易赏赐不称职的人,不随便授职予不能胜任的将帅,才能政治清明,永葆太平。他最重师古,如说,“学于古训乃有获”,又说:“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但他所谓“师古”,并非泥古,在于能善鉴于古,求适合于历史演进、文明进化的原则。

3. 傅说的任用官吏

如他提出的“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又说：“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这些论点，在三千年后的今天看来，对于选拔任用整饬各级干部作风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傅说的朴素唯物史观

如他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哲理，也不是说知易，而是说求得知后，如不果行，即与不知等。强调即知即行，特别着重力行。能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制度下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是我国远古时代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以上这些论点政见，对武丁影响巨大，故深谢他的教诲，使君臣间更为关系密切。正如周公所说“率惟兹有陈，保禄有殷”，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傅说怎样辅佐武丁中兴成功

传说傅说辅佐武丁在位59年间，大力振兴政治，因之历史上武丁被誉为中兴之主，当时的殷商王朝成为世界上文明最发达、国力最强盛的奴隶制大国之一。

傅说的政治措施如下：

1. 农业上推行“勗田制”

即组织奴隶们集体耕作，生产工具由石、骨、蚌器发展到木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以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促进了当时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

2. 文化上丰富了甲骨文字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的出现，是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的基础上过渡而来的。殷墟中“甲骨文卜辞”的出土，具体说明了武丁时代我国古文字已由象形而趋于定型文字。同时又出现了金文、陶文、简册与帛书等。这是傅说在发展文化上莫大的功绩。

3. 军事上征服了四方外族

傅说当政，辅佐武丁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先后征服了土方、舌方、鬼方、姜方、夷方等外族，使王朝版图以王畿为中心，西达秦陇，东至海滨，北起燕山，南越江汉。于是“天下咸服，殷道复兴”。

六、重建傅相祠的工程

传说傅说辅佐武丁在位59年，享年八十有九，荣归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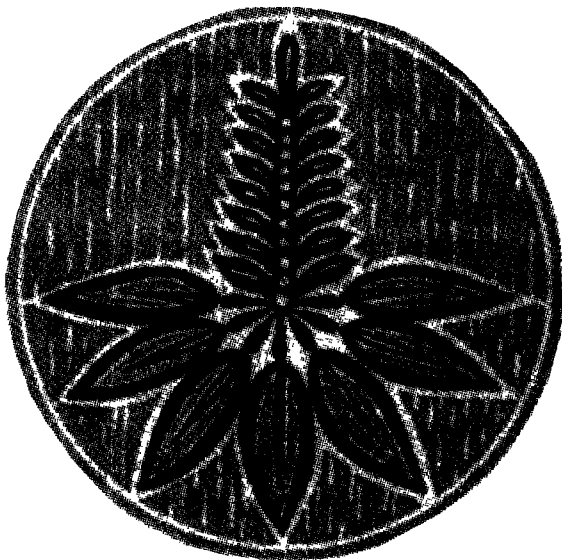
里。他死后葬于马跑泉下，“冢在崇冈，倚中条，其东西两山环拱，前则回岫若屏，幽胜殊绝”。（清康熙《平陆县志》）至于他死后化作星星的说法，散见于《左氏春秋》、《庄子》、《晋书》与《星经》等的记载，则为民间敬仰他的神话。

关于傅相祠的建筑，根据清版《平陆县志》记述是唐代大历年间重建的，民间称为“圣人庙”。每年四月初八为傅说之诞生日，即举行盛大的官祭大典。从四月初一至初十为庙会期间，傅庙香火不绝。说明当地人民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敬仰。但后遭频繁战乱，早已化为一片废墟。傅祠遗址之旁，尚有镌着“傅岩”二字的石刻一方、傅说出生地名大臣村，有傅说墓马跑泉等遗迹。唐代诗人胡曾有《题傅岩》一诗：“岩前版筑不求伸，方寸那希据要津；自是武丁安寝夜，一宵宫里梦神人。”

为重建傅相祠，现在平陆县政府主持下，正以民间集资、民办公助的方式紧张施工。且有散居各地包括台湾之傅氏后裔，闻讯前来圣人洞寻根问祖，均表示要为祖庙傅相祠之重建广为募集资金相助，使工程早日竣工。另一台胞傅氏后裔之代表，曾向平陆县之“重建傅相祠筹备处”赠送《傅氏家谱》。

近据平陆县友人来函称：“傅说之塑像高8米，基座高6米，已在紧张施工的80天内竣工，巍峨地树立在圣人洞。”预计不久的将来，这座崭新的傅相祠即会落成，将会对弘扬中华民族之文化、沟通海峡两岸同胞之认亲访祖以及旅游观光，起莫大作用。

（责任编辑 王恂）



武则天与酷吏政治

○胡戟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和称帝的一个时期里，曾大规模地施用滥刑，她“委政狱吏”，“以刑法理天下”。由于“刑法滥酷”，被时人誉为“淫刑之主”。滥刑或称酷吏政治，是武则天为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而使用的重要手段，施行这种恐怖政策长达14年之久，有其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

文明元年二月唐中宗被废后，武则天看到宗室大臣对自己心怀不满，“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廩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不实者不问。”造成“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的恐怖局面。

武则天通过这个告密制度，物色到一批酷吏。其中臭名昭著的有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等。他们“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来俊臣和朱南山、万国俊还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教其徒

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而“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

他们又“竟为讯囚酷法”。发明了“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失魂胆”、“求破家”等刑具和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使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洛阳皇城丽景门内设制狱，“人是狱者，非死不出”。朝士每人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

武则天初行滥刑的锋芒，是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打击面大而且刑法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真有斩尽杀绝之势。因为宗室王公及历代皇帝的皇子们，是武则天争夺皇权和皇位最有威胁的对手，所以武则天首先要把他们搞掉。经过连续几年的杀戮，到她改唐为周称帝时，几代皇帝的皇子，除了武则天自己所生李显、李旦外，在世的全都被杀。残留的李显流放在外，李旦名为皇帝被软禁在“别殿”，都不能对武则天构成威胁。这样，李唐宗室就全然无力反抗了。

武则天对大臣们打击也很沉重。这些唐家老臣，以匡救社稷为己任，武则天对他们防范甚严。在她临朝时，做过宰相的24人，在6年7个月中被杀掉和贬流罢相的就有17人，寿终的3人，只有4个宰相做到武则天称帝以后，而这4个人中，武承嗣、武攸宁是武则天的本家侄子，另外两个也都好景不长，再一年工夫也先后被杀。这使朝臣中不能形成反武的轴心。武则天靠滥刑打开了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血腥道路。

武则天称帝的前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围绕着武则天要巩固帝位这一中心问题展开，武姓诸王与李氏争夺帝位继承权的斗争也很激烈。由于李唐宗室反对派的势力已被摧毁，这时的滥刑主要用来打击反对派官僚，宰相班子成员的变动尤为激烈。8年里共用38人为相，每人的平均任期不到一年。不过，处罚不那么重了。有的被贬逐过的官员，后来又起用了。

滥刑本身也开始有所收敛。随后虽曾起用来俊臣，那不过是酷吏政治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罢了。武则天得知天下皆恶来俊臣，乃“下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将来俊臣弃市，使人们“争抉目，撻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子余”。滥刑也就此停止。

武则天称帝的后期，其统治地位已经巩固，便不再施用滥刑。她还下令雪免被酷吏陷害得罪的官僚。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前实行恐怖政策时期大不相同的景象。

酷吏丘神勣、周兴、索元礼、来子珣、侯思止、王弘义、来俊臣、万国俊、郭霸等相继被杀、自杀或流放而终。神龙元年3月中宗下诏惩治酷吏时，所列举的27人中，在世的仅刘景阳、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4人，他们在武则天晚年多已配流，不见有什么活动。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等司法监察机构，改用了“用法平允”的徐有功和反对酷吏的魏元忠、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宋璟、韦嗣立、纪履忠等人。

这时也允许议论武则天的权位。如苏安恒两次要武则天退位的上疏，过去会构成死罪，这时不但处罚，反而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即使言辞激烈，武则天也没有加罪于他。

武则天还按群臣的要求，多次发布诏敕，大赦所有自己临朝称制以来的“得罪者”。可以说，她在退出政治舞台前，把自己搞滥刑造成的冤狱基本上平反了。

武则天干政40余年，以一个“妇道人家”在千年封建古国当了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所遭到的非难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几次起兵声讨外，朝内外反对她的言行也很普遍。面对这样经常的大量的敌对活动，武则天

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保证在皇权争夺中稳操胜券，除了诉诸滥刑以外，似乎没有更有力的手段。虽然暂时镇压了反对派，却同时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刻下新的裂痕。那时“满朝侧息不安”，“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以至“人无固志……偷安苟免，聊以卒岁”。因而在她“女主”地位终于被承认之时，便将控制统治集团的手法作了相应的改变，反把来俊臣送上断头台，以结束大规模滥刑，使人们“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以致“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酷吏政治是封建专制政体的看家法宝之一。仅用武则天为人残忍和“事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的说法来讲滥刑的兴废，是不能把这一历史现象说清楚的。我们应将它放在当时社会的矛盾中，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发展变化中，更多地从武则天政治上的需要着眼，对滥刑的兴废作具体的分析。

滥刑结束，来俊臣砍头以后，人们仿佛重见天日，能够安稳地睡觉了，但是滥刑在政治上留下的严重后果并不能一下子消除。它离间了武则天君臣之间的关系，武则天那种“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的无情做法，使群臣无法死心塌地跟随她。连武则天本人也知道，自己在群臣心目中是个“淫刑之主”，失掉了广大官吏的支持。不仅如此，滥刑在消灭反对派力量的同时，也消耗了本来是武则天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他们或者因为被怀疑有谋反异图，或者因为被罗织之徒诬以谋反罪名，或者因为和谋反者亲善，或者因为和权臣武承嗣、酷吏来俊臣等有矛盾而被陷害杀戮。以至武则天始终不能组织起一支自己掌握的比较稳定而且足够强大的政治亲信队伍，这是武则天统治末期政治危机的一个根源。

滥刑和武则天破格用人的“滥选”相辅相成，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更迭。在这个变动中，大量庶族地主涌进政治舞台，不少旧门阀士族被排挤出去，士族门阀世袭的政治特权无从维系，新兴普通地主得到了在政治上大发展的机会。这是武则天历史活动留下的一个很不自觉但却十分重要的后果，致使她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责任编辑 卢弘)

西秦古文化

名 胜 掠 影

○ 郑 国 铨

来到“西秦古城”宝鸡，只觉不少古籍中的有关记述“活”起来了，脑海里油然出现一幅以古文化为特色的风景名胜长卷。这里的山山水水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沉积，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山水文化系统。

宝鸡是姜炎文化的摇篮。天台山麓，姜水之滨，处处是炎帝神农的遗迹，历年发掘出来的文物，印证了古籍的记载。在重新修建的炎帝祠和炎帝公园里，人们用塑像和壁画再现了炎帝当年的形象与业绩。坐落在神农乡常羊山的炎帝陵，雄伟庄严，古朴典雅。站在炎帝陵前，宝鸡全市展现眼前。炎帝陵下有炎帝公园，东有圣母池、圣母宫，西有百草堂、药王洞，近处还有著名的九龙泉。南行进入天台山，奇峰幽林，郁郁葱葱，留下很多遗迹和传说。炎帝常到天台山采药为民治病，最后误食断肠草中毒身亡，遗体曾安放在山顶“寝骨台”。五千多年前，炎帝就在这里开拓出一条步入文明的道路。人们到了这里，自然受到炎帝教民农耕的创业精神和遍尝百草的奉献精神的感召。

周从岐山起，秦以雍城兴。宝鸡又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这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周人就是从这里发迹的。1976年开始的大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遗址，有大量的青铜窖藏，有许多珍贵的甲骨，还发现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制铜作坊等。真是一座地下文物宝库！周原遗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宝鸡东行60里，来到秦岭脚下一个奇峰耸峙、古柏参天的峪口，明澈的磻溪从山间潺潺流出，溪边立着一高约两丈的巨石，这就是有名的姜太公钓鱼

台。钓鱼台西边有太公庙，磻溪入渭处又有文王庙。姜尚，字子牙，世称姜太公，是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周文王渭水访贤，得姜尚协助完成了灭商兴周大业。岐山的周公庙，也是体现周文化的重要景点。周公文治武功垂于后世，他的“礼治”思想为儒家所推崇，在华夏文化史上影响极为深远。

雍城遗址，是宝鸡地区又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秦国早期的都城，春秋战国时期在此建都达300多年。城址总面积为11平方公里，城内布局完整，道路纵横交错，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先秦建筑群遗址。这里出土的大型铜质建筑构件，显示出雍城宫殿建筑的豪华气派。城址西南为秦公陵区，占地21平方公里。最大的秦公大墓，是迄今我国所见最大的木槨墓。墓室出土的各种文物，反映了秦国当年精湛的工艺。秦人在这块土地上开创基业，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发展壮大，东进扩张，终于夺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

宝鸡，雄踞关陇通道，又为秦蜀咽喉，地势极为险要，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许多的文化遗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从汉中北征，就是由此巧妙地夺取关中的，从而建立了显赫的汉王朝。大散关隐匿于秦岭之中，峥嵘的山峰扼守着通道，关隘之下，姜水奔流。三国争雄之际，诸葛亮曾率兵出大散关攻打陈仓。这里不知有多少刀光剑影的战史！登临此处，见到山崖上刻着的“古大散关”四个大字，不禁想起陆游的名句：“铁马秋风大散关”。五丈原，是诸葛亮戎马生涯中最后的一个战场。当年诸葛亮曾在这里建立了城堡，他的中军帐就设在这里。五丈原的西北角有武侯祠，祠内壁画和

石刻等文物很多。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刻于青石之上。表前有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写的八个大字：“纯正不曲，书如其人”。唐代诗人温庭筠的《经五丈原》诗碑中有句云：“天青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这些著名的诗碑，更加强了游人的思古幽情。

宝鸡的宗教文化也令人瞩目。著名的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相传始建于东汉桓灵之世，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佛教祖庭，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誉。唐代为法门寺的鼎盛时期，大唐皇室尊奉法门寺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救命宏建地宫供养，法门寺升格为皇家寺院。从唐太宗开示佛指舍利始，先后有八位皇帝开启地宫，恭迎佛指舍利到皇宫奉祀。宋代以后，法门寺几经兴衰。1987年，重修砖塔，清理塔基，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秘藏了1100多年的瑰宝重现天日，尤其是佛教界视为至宝的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面世，使海内外为之震惊。法门寺又放射出了新的光彩！此外，陇县的吴山是道教名山，有道教建筑群吴岳庙，留下了许多道教传说，还有夕霞洞等胜景。陇县龙门洞，为道教全真宗龙门派祖师丘处机修行的地方，在道教中有重要地位。宝鸡市内的金台观，为著名道士张三丰修道处，也是有名的道观。内有高台一座，登台可俯视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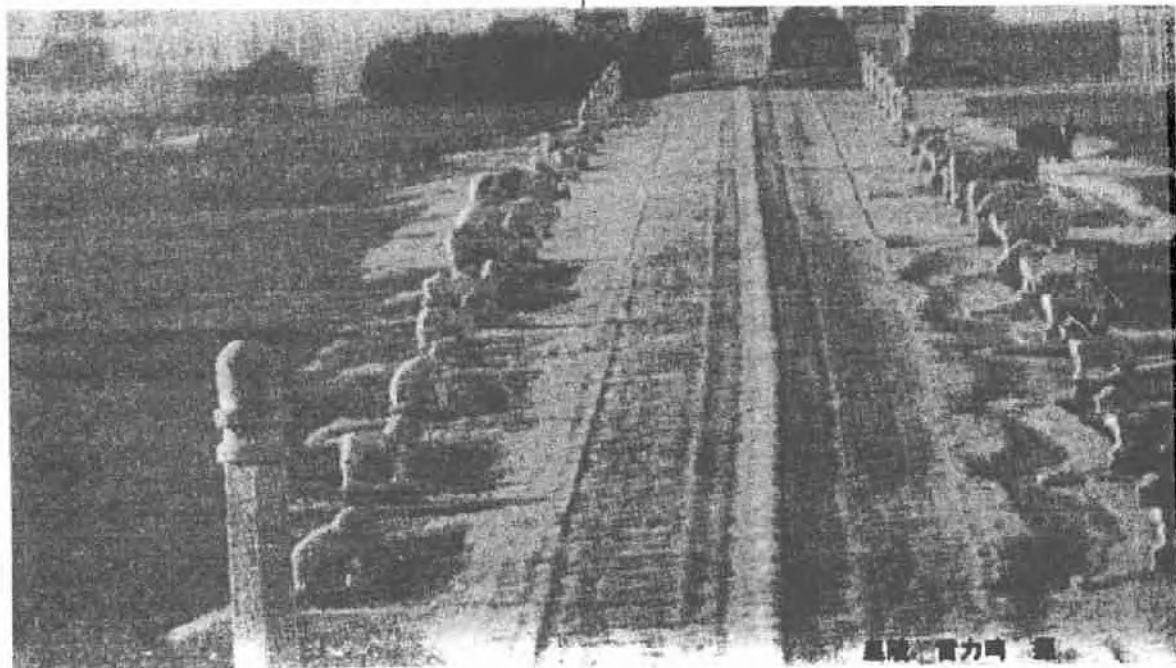
被誉为黄土高原上一颗明珠的风翔东湖，是900多年前宋代大文豪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所建，可

说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公园。苏轼在《东湖》一诗中写道：“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入门便清澳，恍如梦西南”。湖内碧波荡漾，沿堤古柳垂荫。亭台楼轩，玲珑别致，奇树夹道，花香袭人。园内还有苏公祠及名传古今的喜雨亭、凌虚台，还珍藏着苏轼的书画真迹石刻多种。苏轼既是文豪，又是好官，他留给人间多少美好的东西！

宝鸡市区的北首岭遗址，为仰韶文化时期遗存村落，从中可以窥见7000多年前人类的生活，是宝鸡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宝鸡博物馆内，荟萃了周秦时代的青铜器精品和珍品，被人们称为“青铜器之乡”。市南高达3767米的太白山，传说秦穆公在这里打猎，获得一只美丽的锦鸡，锦鸡象征吉祥如意，宝鸡之名就由此而来。这里自古列为“长安八景”之一，李白在《登太白峰》中曾为之歌唱。现已开辟为太白国家森林公园……

游宝鸡就如同读一部形象化的史书。江泽民同志去年题词：开发古陈仓，建设新宝鸡。我以为开发的重点之一，就是将宝鸡建设成一个了解中国古文化的难得的窗口。

（责任编辑 吴乃）





●名人与505●



○魏喜奎

(曲坛常青树
——魏喜奎)

505神功元气袋 虽小作用大

史 鸣

全国文联委员,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魏喜奎女士,13岁进北京,先在庆乐戏院正式登台演出,一上场就“梳帘红”,之后演遍了天桥各大小剧场。她酷爱曲艺这门民间艺术,兼学评剧、京剧、昆曲和地方戏。她不以说唱艺术为满足,创造了以北京语音为特征的剧种——曲剧。京味儿浓,吐字清,行腔圆,声

情交融。群众喜爱,一演不可收。从演老舍先生的《柳树井》开始,在《罗汉钱》、《方珍珠》、《啼笑因缘》、《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剧中,她创造了10几个不同的妇女形象,在舞台上活跃起来。周总理在世时,曾亲临剧场,多次看过她的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现她年已逾六旬,还常在“老舍茶馆”或电视上为群众演出,嗓子不哑,声调不变,神情怡然。曲艺迷们称她是“曲坛常青树”。

毕竟年龄不饶人,她多年排戏、练功“超负荷”,患有腰腿疼痛病,但仍坚持登台演出,她不隐讳地说,“这得益于505神功元气袋这种保健品。”

魏喜奎女士谈起她的切身体会:“505神功元气袋,对于消除病痛有疗效。如今世上还没有‘神仙一把抓’的医药。所以对于近些年来新出的一些药品和化妆品等,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用见效,药到病除上。药物治病,也有因人而异,不过既是针对病痛而生产的药品(假冒除外),如果使用得当,总会有一定的作用,这是必然的。特别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医药瑰宝——中草药,用之无副作用,健身治病疗效好。”

“我们当演员的,在旧社会演出中,长期过度劳累,生活上不得保证,饥一顿饱一顿,不能正常饮食,许多人落下病痛。我当然不例外。近年由于我年高体弱,腰痛、腿关节痛,时有袭来,这与我多年在排练、演出中长时间站立有关。”

“我的腰腿疼痛病,曾经按摩、针灸等法治过,但屡治屡犯,终未能根除,很让人心烦焦急。经热心朋友介绍,使用505神功元气袋和神功药枕,用过一段时间后,感觉对我的病痛大有缓解作用。于是,每当腰腿酸痛时,即将药袋贴在痛处,便有轻松之感,我的病没有再度发展,就是505起了作用。我想,用505需要耐心,不能操之过急,慢性病缠身,需‘慢’治,到一定时间就能治好。再说,按摩和针灸都没根治我的腰腿痛,我当然也不能苛求在短时间内立见‘神功’,但经我使用505之后,觉得它是信得过的良药。”

欢迎邮购505神功系列医药保健品

神功元气袋 (普通型)

功能与主治:健脾益肾,调整气血,通经活络,平衡阴阳,用于脾胃两虚、气血不足、阴阳失调所致的胃脘痛、慢性胃炎、腹胀、腹泻、中老年虚劳、阳痿、腰肌劳损及妇女月经不调、痛经、带下等病症。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改善微循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无毒无副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神功元气袋 (儿童型)

功能与主治:健脾益肾,益气养血,消食化积,平衡阴阳,用于小儿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腹泻、尿频等症。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无毒无副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神功药枕

主要功能: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清肝明目,醒脑开窍,益智安神,芳香避秽,清热解毒,通脉活血等。

保健治疗:神经衰弱、头晕头疼、健忘失眠、胸闷心悸、咳嗽气喘、咽喉肿痛、伤风感冒及高血压病、脑血管病、颈椎病引起的诸症。每个邮购价:82.50元

神功健美纹胸

主要功能: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祛风散寒,舒经通络,活血伸筋,益肾温经,健脾和胃,清热解毒,益气养血,丰乳防萎。

保健预防:乳腺增生、乳腺炎、乳房无肿块、乳房发育不良。并对预防肿瘤癌变、缓解或治疗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等妇科杂病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受厂家委托,北京紫金台经济文化发展公司向广大患者代邮购上述保健品。请大家汇款时注明品名及数量。

汇款地址:北京市天津街7号北图分馆内6号楼

郭玉华(收)

邮编:100802

名胜掠影

西秦古文化

朱建吾
刘国新 编著



宝鸡炎帝园中的炎帝祠

宝鸡炎帝陵的祭祀仪式



凤翔东湖一角



幽美的磻溪峪口



炎黄春秋



毛泽东(右二)一家



福建土楼老守山村，摄制组正在拍摄采访
侯奇洪导演《反对李富文》油印本的村民

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分分合合

电视片《毛泽东》诞生记

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掌纹医学专家王晨霞

武则天与酷吏政治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3.20元